

动乱真相与“精英”的表演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

03

人 民 出 版 社

ISBN 7-01-000705-5/D · 128 定价 2.55 元

动乱真相与“精英”的表演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

人民出版社

动乱真相与“精英”的表演

DONGLUAN ZHENXIANG YU JINGYING DE BIAOYAN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25印张 171,000字

1990年2月第1版 1990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0,100

ISBN 7-01-000705-5/D·128 定价 2.55元

目 录

- 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人民日报社论 (1)
- 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陈希同 (4)
- 接受要求之后的动乱升级
- 4月17日至18日记事任玉清 (37)
- 炮制出来的“4·20新华门血案”
- 4月19日夜至20日凌晨纪实任玉清 (41)
- 精心策划的一场骗局
- 胡耀邦同志追悼会前后纪实任玉清 (45)
- 上海动乱真相施 岩 (53)
- 《导报》导向何方?冯 光 (73)
- 看,社会渣滓在上海动乱中的丑恶表演甄肖逸 任华文 (83)
- 《美国之音》的不光彩行径《北京日报》评论员 (95)
- 《美国之音》的表演与“和平演变”策略吴 戈 (98)
- 方励之言论摘录钟 宝 (105)
- 抓住刘晓波的黑手王 昭 (119)
- 动乱“精英”严家其李建生 (125)
- 万润南搬起“石头”要砸谁叶 光 (133)
- 吾尔开希真面目石 青 (143)
- 动乱“记者”戴晴邝 岩 (149)
- 刘宾雁反动面目的大暴露郭 帆 (160)
- 王若望其人其事栾保俊 (170)

同青年朋友们谈谈认识动乱性质的方法论问题	郑 舍 (180)
大学生的误区与社会的误导	
——风波过后的回顾、反思与启示	程 元 (188)
关于动乱和暴乱的反思	袁 木 (201)

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人民日报社论

在悼念胡耀邦同志逝世的活动中，广大共产党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解放军和青年学生，以各种形式表达自己的哀思，并表示要化悲痛为力量，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贡献力量。

在悼念活动期间，也出现了一些不正常情况。极少数人借机制造谣言，指名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蛊惑群众冲击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新华门；甚至还有人喊出了打倒共产党等反动口号；在西安、长沙发生了一些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的严重事件。

考虑到广大群众的悲痛心情，对于青年学生感情激动时某些不妥当的言行，党和政府采取了容忍和克制态度。在22日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召开前，对于先期到达天安门广场的一些学生并没有按照惯例清场，而是要求他们遵守纪律，共同追悼胡耀邦同志。由于大家的共同努力，保证了追悼大会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顺利进行。

但是，在追悼大会后，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继续利用青年学生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心情，制造种种谣言，蛊惑人心，利用大小字报污蔑、谩骂、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公然违反宪法，鼓动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一部分高等学校中成立非法组织，向学生会“夺权”，有的甚至抢占学校广播室；在有的高等学校中鼓动学生罢课、教师罢教，甚至强行阻止同学上课；盗用工人组织的名义，

散发反动传单，并且四处串联，企图制造更大的事端。

这些事实表明，极少数人不是在进行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不是为了在中国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也不是有些不满发发牢骚。他们打着民主的旗号破坏民主法制，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搞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如果对这场动乱姑息纵容，听之任之，将会出现严重的混乱局面，全国人民，包括广大青年学生所希望的改革开放，治理整顿，建设发展，控制物价，改善生活，反对腐败现象，建设民主与法制，都将化为泡影；甚至十年改革取得的巨大成果都可能丧失殆尽，全民族振兴中华的宏伟愿望也难以实现。一个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国，将变为一个动乱不安的没有前途的中国。

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团结起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坚决维护得来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维护宪法，维护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决不允许成立任何非法组织；对以任何借口侵犯合法学生组织权益的行为要坚决制止；对蓄意造谣进行诬陷者，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禁止非法游行示威，禁止到工厂、农村、学校进行串联；对于搞打、砸、抢、烧的人要依法制裁；要保护学生上课学习的正当权利。广大同学真诚地希望消除腐败，推进民主，这也是党和政府的要求，这些要求只能在党的领导下，加强治理整顿，积极推进改革，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来实现。

全党同志、全国人民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不坚决地制止这场动乱，将国无宁日。这场斗争事关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的成败，事关国家民族的前途。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广大共产党员、共青团

员、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和全国人民要明辨是非，积极行动起来，为坚决、迅速地制止这场动乱而斗争！

（原载1989年4月26日《人民日报》）

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 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

陈 希 同

委员长、各位副委员长和各位委员！

1989年春夏之交，从4月中旬到6月上旬，极少数人利用学潮，掀起了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进而在首都北京发展成了反革命暴乱。他们策动动乱和暴乱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和国内社会基础。正如邓小平同志说的：“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在这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中，赵紫阳同志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严重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极其严峻的形势面前，党中央作出了正确的决策，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得到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为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坚决反对动乱和暴乱，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表现了很高的政治觉悟和主人翁责任感。现在，我受国务院委托，就这次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情况，主要是发生在北京的一些情况，以及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工作，向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汇报。

一、动乱的酝酿和预谋由来已久

西方世界的一些政治势力，总是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包括中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这是他们长期的根本战略。这些年来，他们利用社会主义国家政策上的某些失误和经济上的暂时困难，更加紧了这个战略的实施。在我国，党内党外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和搞政治阴谋的人，同西方国家的这种战略相呼应，内外勾结，上下串通，为在中国制造动乱，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颠覆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进行了长达几年的思想、舆论和组织准备。正因为这样，在动乱的酝酿、预谋和发难的整个过程中，包括制造舆论、歪曲真相、造谣惑众等诸多手段的使用，都显示出了国内外、海内外相互策应、相互配合的鲜明特点。

这里着重讲一讲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情况。去年9月，党中央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广大群众和青年学生对这个决策和采取的各项措施是支持和拥护的。整个社会秩序和政治形势是基本稳定的。今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绝对多数的赞成票（只两票反对、4票弃权），通过了李鹏同志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当然，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对于党和政府在工作中的一些失误，一些国家公职人员中的腐败现象，以及社会上的分配不公等问题，也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同时在推进民主、健全法制、深化改革、克服官僚主义等方面，还提出了不少的要求和建议，这些都是正常现象，也是党和政府正在采取措施加以解决的问题。但是，当时在党内和社会上的确有极少数人紧密勾结，明里暗里进行了大量极不正常

的活动。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赵紫阳同志去年9月19日会见美国一位“极端自由派经济学家”以后，一些据称与赵紫阳“智囊团”有着密切联系的香港报刊，大肆进行宣传，透露出了“北京利用香港传媒倒邓保赵”的政治信息。反动杂志《九十年代》总编辑李怡（化名齐辛）在香港《信报》发表《大家长该退休了》的文章，叫嚣“排除超级老人政治的障碍”，“使赵紫阳有足够的权力”。《九十年代》的另一篇文章则呼吁赵成为“独裁者”。香港《解放》杂志也刊登长篇文章，说北京一些人同香港传播界某些人士有“或明或暗”、“有如鬼火高低明灭”的关系，这种微妙关系“有了一个最新的个案显示，那就是在最近一个月掀起的倒邓保赵风”，还说什么“就中国走资的希望言，他们看准了赵紫阳”。同这种“倒邓保赵”风相配合，北京《经济学周报》发表了同赵紫阳原秘书鲍彤联系密切的严家其（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与另一个人关于时局的对话，攻击“治理整顿”会导致“停滞”，提出中国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不能重蹈赫鲁晓夫、刘少奇那样非程序权力更迭的覆辙”，“中国不再允许像文革那样用非程序化的方式进行权力变动”。这个对话的核心问题，就是为掩盖赵紫阳的错误、保住他的权力地位、以便更加肆无忌惮地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制造舆论。这个对话曾经在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和香港《镜报》等海内外多种报刊全文或摘要刊登。

去年末今年初，内外勾结进一步加紧，陆续出现了一些观点十分错误乃至反动的政治集会、联名上书、大小字报和其他活动。比如，去年12月7日，由《走向未来丛书》副主编金观涛担任顾问的“北京大学未来学会”，举办了“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大型讨论会，金观涛在发言中说：“社会主义的尝试及其失败，是二十世纪人类的两大遗产之一。”《新观察》主编戈扬立即以一个有几十年党龄的“年龄最大”者的身份站出来“作证”说：“金观涛对社会主义的否定

不是太厉害了，而是客气了一点。”今年1月28日，苏绍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研究员）、方励之等人在北京的“都乐书屋”搞了一个所谓“新启蒙沙龙活动”，参加的除中国人之外，还有一些美国、法国、意大利的驻京记者，共100多人。方励之说，这类集会“对当局采取完全批判、彻底批判的态度”，“火药味很浓”，“现在需要行动”，“连开三次就要上街了”。2月初，方励之、陈军（反动组织“中国民联”成员）等人又在友谊宾馆举行了所谓的“名人名家迎春联谊会”，方励之主要就所谓“民主”和“人权”两大问题发表了演讲，陈军把“五四运动”同“西单民主墙”作了类比。方励之说：“希望企业家作为中国的新生力量，同先进的知识分子结合起来，为争民主而斗争。”2月16日，陈军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广为散发方励之致邓小平的信，以及陈军等33人致全国人大常委和中共中央的信，要求实行大赦，释放严重触犯刑律的魏京生等所谓“政治犯”。2月23日，台湾《联合报》发表《大运动的开端，大冲击！》的文章说：“纽约发宣言，北京公开信，神州春雷动，民主浪潮涌。”2月26日，张显扬（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研究员）、李洪林（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包遵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戈扬等42人，联名写信给中共中央，也要求释放所谓的“政治犯”。此后，北京一些大学陆续出现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量大小字报和集会。比如，3月1日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同时出现《讨邓檄文 告全民书》的大字报，胡说什么“共产党的政治就是空谈、强权、独裁、武断”，公然要求“取消党派，解除四项原则”。3月2日北京大学贴出题为《为中国人悲哀》的小字报，叫喊打倒“专制”和“独裁”。3月3日清华大学等院校出现署名“中国民主青年爱国会筹委会”写的《致广大青年学生的一封信》，鼓动“在爱国主义民主战士方励之的领导下，参加到‘民主、自由、人权’的激流中去”。3月29日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广为张贴方励之给香港《明报》写的《中国的失望

和希望》一文，宣称社会主义已经“彻底丧失了吸引力”，要组成政治上的“压力集团”，去实行“政治民主和经济自由的改革”。他所说的“改革”，实际上就是全盘西化的代名词。4月6日北京大学贴出一份题为《时代的召唤》的大字报，以完全否定的态度提出了“社会主义还有没有存在的合理性”以及“马列主义到底还适合不适合我国的国情”的问题。4月13日北京邮电学院等校收到署名“广西大学学生会”写的《告全国大学生书》，号召“高举胡耀邦的画像和‘民主、自由、尊严、法治’的大旗”，来纪念“五四”青年节。与此同时，在北京的一些高等院校，所谓的“民主沙龙”、“自由论坛”以及各式各样的“研究会”、“讨论会”、“演讲会”纷纷出现，仅北大学生王丹主持的“民主沙龙”一年就搞了17场讲座，活动十分频繁。他们曾经把原非法组织“人权同盟”的头头任峻町请去，围绕所谓“新权威主义与民主政治”，散布了许多谬论。他们曾在塞万提斯像前举办讨论会，公开宣称“要废除一党制，让共产党下台，推翻现政权”。他们还把方励之的妻子李淑娴请去，充当他们的“军师”。李淑娴煽动说：“要使民主沙龙合法化”，“要经常在这里集会”，“要取消北京市关于游行的十条规定”。所有这些，都为后来发生的动乱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香港《明报》载文评论说：“中国知识分子精英阶层争取人权而发起的串联与签名运动，已对学生产生极大影响，他们早已在酝酿于‘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纪念日采取大规模的行动表达对当局的不满。胡耀邦的猝然去世，则犹如装满火药的桶里扔了一根火柴。”总之，在极少数人的预谋、组织和策划下，当时已经形成了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形势。

二、学潮从一开始就被动乱的组织者所利用

4月15日胡耀邦同志逝世，使酝酿已久的学潮和动乱提前爆

发。广大群众和青年学生悼念胡耀邦同志，表达了深切的哀思，各高校也为学生的悼念活动提供了条件。但是，极少数人却利用这个时机，以“悼念”为借口，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学潮从一开始就被极少数人所操纵和利用，具有了政治动乱的性质。

这场动乱，首先表现在大量的大小字报、标语、口号、传单和挽联等，对党和政府进行了肆意的攻击和诋毁，公然号召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现政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院校的一些大小字报，有的谩骂共产党是“一代奸党”，“是个即将溃灭之组织”；有的攻击老一辈革命家是“朽翁听政”、“独裁集权”；有的指名道姓地逐个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胡说什么“不该去的去了，该死的却没死”；有的要求“撤换无能政府，推翻专制君主”；有的要求“取消共产党，实行多党制”，“取消各团体、军队、学校、单位的党支部和政工干部”；有的发表《私有制宣言》，号召“早日敲响公有制的丧钟，去迎接共和国新的明天”；有的还提出要“邀请国民党回大陆，建立两党政治”，等等。许多大小字报用不堪入耳的语言，诬蔑邓小平同志，叫嚷“打倒邓小平”。

这场动乱，从一开始就表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尖锐对立。动乱策划者们这个期间提出的纲领性口号，无论是通过非法学生组织的头头王丹在天安门广场首先提出的“九条要求”，还是后来提出的“七条”、“十条”等等，其中最主要的是两条：一是，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过；二是，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反自由化中所谓“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昭雪。这两条的实质，就是要在我国取得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实现资本主义化的绝对自由。同这种要求相配合，一些知识界的所谓“精英”分子，也就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极少数人，在此期间也组织种种座谈会，利用舆论阵地大肆宣传，其中最突出的是

《世界经济导报》和《新观察》杂志社4月19日在北京召开的座谈会。这个座谈会由戈扬主持，参加的有严家其、苏绍智、陈子明（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刘锐绍（香港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等人。他们议论的中心也是两个，一是为胡耀邦“平反”，二是为反自由化“翻案”，并且明确表示支持学生的游行示威，说什么由此“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后来，当上海市委作出整顿《世界经济导报》的正确决定之后，一贯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赵紫阳同志不仅不予支持，反而指责上海市委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动了”。

这场动乱，还表现为在极少数人的挑唆和策划下，许多行为都是极其粗暴的，是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法律和法规的，是严重反民主反法制的。他们不顾宪法对“四大”的废除，不听劝阻，在校园内铺天盖地地张贴大字报；他们不顾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游行的十条规定，不经申请批准，连日不断地举行大游行；他们在4月18日和19日深夜接连冲击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新华门，并且呼喊“打倒共产党”的口号，这是“文化大革命”中都未曾发生过的事情；他们违反天安门广场的管理规定，多次强行占据广场，4月22日那一天几乎造成胡耀邦同志追悼会无法正常进行；他们无视北京市的有关法规，不经登记就成立了“团结学生会”（后改名为“高等院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等非法组织，并且向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合法的学生会和研究生会“夺权”；他们不顾法纪和校纪，抢占办公室，抢占广播站，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在校园里造成了严重的无政府状态。

大量制造谣言，蛊惑人心，煽动群众，是极少数动乱组织者和策划者采用的另一个重要手法。学潮之初，他们就造谣说，“李鹏在政治局会议上大骂胡耀邦，胡是被气死的”，诱导人们把矛头指向李鹏同志。事实上，那次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是教育问题，当政治

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同志正在就有关文件作说明时，胡耀邦同志突然心脏病暴发，立即就地抢救，缓解后被送进医院，根本没有什么生气的事。4月19日夜，一位师大外语系的女学生在参加晚会后回校途中，被无轨电车撞伤，经抢救无效，不幸身亡，有人就造谣说：“共产党的军警开车轧死了学生”，使一些不明真相的学生情绪激动。4月20日凌晨，我公安干警将冲击、围堵新华门的学生强行带离现场，用公共汽车送到北京大学，又有人造出了所谓“4·20血案”的谣言，说什么“警察在新华门打人，不光打学生，还打了工人、女人和小孩”，“一千多名科技工作者倒在血泊中”，搞得一些人的情绪更加激愤。4月22日，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结束，李鹏等中央领导同志离开人民大会堂之后，有的人为了制造攻击李鹏同志的口实，又精心策划了一场骗局。他们先是造谣说，“李鹏总理答应12点45分出来接见广场上的同学”，接着就由3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台阶上跪递“请愿书”，然后又宣称“李鹏临时变卦，拒不接见，欺骗学生”，煽动起广场上数万学生的强烈不满，几乎造成冲击人民大会堂的严重事件。由于这些谣言的蛊惑和挑唆，大大激化了青年学生同政府的对立情绪。极少数人就利用这种情绪，提出了“和平请愿，政府不理，通电全国，统一罢课”的口号，造成北京6万高校学生罢课的严重局面，许多外地高校也相继罢课，使学潮升级，动乱扩大。

这场动乱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已经不局限于高等学校，也不局限于北京地区，而是向着全社会和全国各地扩散。胡耀邦同志追悼会结束后，一些人到中学、工厂、商店、农村串联，上街演讲，散发传单，贴标语，搞募捐，千方百计扩大事态。有的中学出现了“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标语，有的中学出现了“罢课罢考万岁”的大字报，有的工厂贴出了“联合工农，打倒暴政”的传单。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还提出了“南下北上，东来西走”的口号，企图发动全国性

的大串联。南京、武汉、西安、长沙、上海、哈尔滨等地的高校都发现从北京去的学生，天津、河北、安徽、浙江等地的学生也到北京参加游行。在长沙、西安等地，发生了严重打、砸、抢、烧的违法犯罪活动。

这场动乱一开始就有海外、国外各种政治势力插手。国民党豢养的反动组织“中国民主联盟”成员胡平、陈军、刘晓波等人，联名从美国纽约发出了《致中国大学生公开信》，要参加学潮的学生注意“巩固在这次活动中建立起来的组织联系，力求以一个坚强的群体进行有效的活动”，“应把彻底否定1987年反自由化运动作为突破口”，“加强与各种新闻媒介的联系”，“加强与社会其他各界的联系”，“在运动中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参与”。“中国民主联盟”的两个头头王炳章和汤光中还急急忙忙从纽约飞往东京，企图闯回北京，直接插手这场动乱。一些主张在中国实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海外华人知识分子，特邀方励之领衔，从哥伦比亚大学发回了《敦促中国大陆民主政治宣言》，鼓吹“人民必须拥有对执政党的选择权”，煽动人们推翻共产党。一个化名“红岩”的人从美国用传真电话发回“修改宪法的十条意见”，提出全国和各级人大代表以及各级法院的法官，都应“由无党派候选人中选举产生”，企图把共产党从国家权力机关和司法机关中彻底排除出去。一批身居美国的原“中国之春”成员，匆匆忙忙地组成了“中国民主党”，向北京一些大学发出了《告全国同胞书》，煽动学生“要求保守派的官僚们下台”，“促使中共结束其专制统治”。港台、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一些反动政治势力，也通过各种渠道，采用各种手段，纷纷介入。一些西方通讯社表现了异乎寻常的热心，特别是“美国之音”，每天用三种节目，花十多个小时，向中国大陆进行喋喋不休的报道，造谣惑众，煽风点火，为这场动乱推波助澜。

以上大量事实说明，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

学潮，而是抱有明确的政治目的，背离了民主和法制的轨道，运用卑劣的政治手段，煽动大批不明真相的群众和学生，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地挑起的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动乱。如果不是这样从本质上分析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会犯极大的错误，就会在斗争中陷于极大的被动。

三、《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 对动乱的定性是正确的

从4月15日胡耀邦同志逝世到4月22日治丧结束，赵紫阳同志对悼念活动期间出现的日益明显的动乱迹象一直采取容忍和放纵的态度，助长了动乱的形成和发展。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中央和北京市许多同志都感到事情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多次向赵紫阳同志提出，中央应有明确的方针和对策，以便迅速制止事态的发展，但他始终回避对事情的性质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讨论。胡耀邦同志追悼会结束后，中央的同志再次建议在他4月23日出访朝鲜前开一次会，但他不仅拒不接受，反而若无其事地打高尔夫球去了。由于他采取这样的态度，使党和政府丧失了制止动乱的时机。

4月24日下午，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向万里同志作了汇报。在万里同志的建议下，当天晚上由李鹏同志主持，政治局常委对事态的发展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会议一致认为，当时的种种事态表明，在极少数人的操纵和策动下，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会议决定在中央成立制止动乱小组，同时要求北京市委和市人民政府放手发动群众，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力争尽快平息动乱，稳定局势。次日上午，邓小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对中央常委的决定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对

动乱的性质作了深刻分析。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不是一般的学潮，而是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动乱。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大大地提高了广大干部的认识，增强了大家平息动乱、稳定大局的信心和勇气。《人民日报》4月26日的社论，体现了政治局常委的决定和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指明了动乱的性质。同时，明确地把极少数动乱组织者和策划者同广大青年学生区别开来。社论的发表，使绝大多数干部感到心里有了底，行动有了方向，可以旗帜鲜明地开展工作了。

《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之后，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中共北京市委和市人民政府接连召开党内外各种会议，坚持原则，统一认识；运用各种形式澄清谣言，安定人心；支持学校领导、党团员和学生骨干大胆工作，对参加游行示威的学生进行劝阻和疏导；积极开展各种对话活动，努力争取群众。国务院发言人袁木等同志同学生的对话，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同学生的对话，中共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主要领导同志同学生的对话，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同时，认真做好工厂、农村、商店、中小学和街道的工作，稳住大局，防止动乱向社会蔓延。各省、市、自治区也按照社论精神，抓紧做好本地区的工作，防止北京事态的影响向外地扩散。

由于4月26日社论旗帜鲜明，使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被迫在策略上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社论发表前，大量的标语、口号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社论发表后，4月26日，非法组织北京“高自联”就发出了改变策略的“新学联一号令”，要求4月27日“在拥护共产党的旗帜下游行到天安门”，规定的口号包括“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维护宪法”等，并且在方励之的授意下，把“打倒官僚政府”、“打倒腐败政府”、“打倒独裁统治”等颠覆性的口号改成了“反官僚、反腐败、反特权”等各界群众赞同的口号。日本时事社这时从北京发出一则

题为《年轻官员结成支持民主化集团》的报道，把所谓“赵紫阳智囊团”里的一些人物称之为“中共中央和政府的年轻官员”，说他们“频繁地接触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等参加游行的北京市内的各大学的新自治会代表，给学生出主意”，在27日的大游行中，学生们举着“‘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等标语，这也是遵照了这个集团的指示”。学潮的头头们原来打算要“百日游行，无限期罢课”，社论发表后，这个劲头没有了。5月4日同4月27日的游行相比，学生人数由3万多人减少到不足2万人，围观的群众也大为减少。“五四”游行之后，经过各高校党政领导做工作，80%的学生都复了课。全国各地在《人民日报》“4·26”社论发表后，局势也迅速趋向平稳。显然，再做一些工作，这场由极少数人利用学潮引起的动乱就有可能得到平息。大量事实说明，《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是正确的，它的确起到了稳定首都、安定全国的作用。

四、赵紫阳同志“五四”讲话是 动乱升级的转折点

在动乱接近平息的时候，作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赵紫阳同志，却采取了出尔反尔、反复无常的态度。本来，在他出访朝鲜期间，政治局常委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就打回电报，明确表示“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对付当前动乱问题所作出的决策”。4月30日回国之后，他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还再次表示，同意小平同志的讲话和4月26日社论对动乱的定性，认为前段对学潮的处理是好的。但是，没过几天，他却在5月4日下午接见亚洲银行年会代表时，发表了一通同政治局常委决定、邓小平同志讲话和社论精神完全对立的意见。第一，在已经出现明显动乱的情况下，他却说“中国不

会出现大的动乱”；第二，在大量事实已经证明动乱的实质是否定共产党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他还坚持说“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第三，在已经有种种事实说明极少数人利用学潮策动动乱的情况下，他还只是说“难免”“有人企图利用”，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央关于极少数人已经在制造动乱的正确判断。赵紫阳同志的这番讲话，是鲍彤事先为他起草好的。鲍彤还要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当天下午就立即广播，并且要连播3天；又要求《人民日报》次日在头版显著地位发表，同时要大量刊登各方面的正面反映。而对不同的意见不仅扣住不发，甚至不许在内部参考读物上发表。赵紫阳同志的这番讲话，经过《人民日报》及某些报纸的大肆渲染，在广大干部、群众中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给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撑了腰，壮了胆，打了气。

赵紫阳同志的讲话同中央的方针截然不同，这一点不仅在国内引起广泛议论，连国外的舆论都看得清清楚楚。路透社在一篇报道中说，赵的讲话“与一周前对学生们的严厉谴责形成了鲜明对照”，是对“上周的判断的一大修改”。法国《世界报》5月6日也载文指出，“这位党的首脑（指赵紫阳）似乎已出色地使形势的发展变得对他有利了”。这篇讲话抛出之后，各级领导干部、党团员和群众中的骨干，尤其是高校的同志，思想上感到迷惑不解，工作上感到无所适从，许多人都表示反对。有的人说：“中央出了两个声音，谁对谁错，以谁为准？”有的说：“要我们同中央保持一致，同哪个中央保持一致？”有的说：“紫阳在上边当好人，我们在下边当恶人。”学校干部和学生骨干普遍认为“被出卖了”，心情十分沉重，有的伤心得流下了眼泪，学校工作完全陷于被动。当时，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的处境非常困难，明知道中央的意见不一致，对下还要违心地说是是一致的，只不过是“侧重点不同”。许多事情需要向中央请示，

而作为总书记的赵紫阳同志却迟迟不召开会议。在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的强烈要求下，5月8日勉强开了一次会，但根本不听北京市的汇报。会上有的同志反映，赵紫阳同志5月4日的谈话与4月26日的社论精神不一致，他声色俱厉地说：“我讲错了我负责任。”在另一次会上，有的同志反映，第一线工作的同志都说“被出卖了”，赵紫阳同志生气地责问：“谁把你们出卖了？只有文化大革命才有人被出卖。”当时，上上下下有不少人同港台报纸相呼应，一而再再而三地攻击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等在第一线工作的同志，连游行的痞子也高呼口号：“北京市委，谎报军情，欺骗中央，罪责难逃。”大家眼看着事态越来越恶化，有些措施想办也办不了。

同上述情况相反，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却从赵紫阳同志的谈话中受到了鼓舞。严家其、曹思源（四通公司发展研究所所长）等人说：“现在出现了转机，要发动知识界支持赵紫阳。”张显扬说：“不是说要利用学生吗，赵紫阳现在就是要利用一下了。”在赵紫阳同志的鼓动和少数人的策划下，北京大学和师范大学“自治会”的头头当晚就重新宣布罢课，许多学校也相继宣布继续罢课，并且组织了“纠察队”，禁止愿意复课的学生去教室上课。接着，游行示威的浪潮又重新掀起。5月9日，30多家新闻单位的数百名新闻工作者上街游行，递交请愿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师范大学、政法大学等十多所高校的上万名学生又上了街，示威游行，声援记者，散发传单，鼓动罢课绝食。从此，事态骤然逆转，动乱重新走向高潮。在北京的影响下，外地已经平稳下来的局势又重新紧张起来。赵紫阳同志讲话之后不久，5月9日、10日，山西太原就发生了大批游行示威的学生冲击省委、省政府，冲击当时正在举行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洽谈会、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and 民间艺术节的事件，在国内和国际上都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五、以绝食相要挟，使动乱更加扩大

善良的人们提出，学生闹得这么凶，是不是政府对他们理解不够，体谅不够，让步不够？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从动乱一开始，党和政府就充分肯定了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忧国忧民之心，充分肯定了广大青年学生提出的促进民主、深化改革、惩治官倒、消除腐败的要求同党和政府的愿望是一致的，并且希望通过民主和法制的正常程序解决问题。但是，这种良好的愿望并没有得到积极的响应。政府提出，希望通过多渠道、多层次、多种形式的对话，来沟通思想，增进理解，而非法学生组织却对对话条件提出了很高的价码。他们要求，对话的对象“必须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以上的人员”，每次对话“必须出具联合公告，由双方共同签字”，对话要由“政府和学生代表分别指定地点轮流举行”。这哪里是什么对话，完全是摆出一副要同党和政府进行政治谈判的架势。特别是赵紫阳同志的“五四”讲话以后，极少数人更是利用这一时机，把党和政府的克制视为软弱可欺，要价更高，条件更苛刻，使动乱不断加温，步步升级。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党和政府仍然采取了十分容忍和克制的态度，希望继续保持对话的渠道，以利于教育群众和争取多数。5月13日凌晨2时，“高自联”的头头提出了对话的要求，凌晨4时，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就答复同意，但天明之后，他们又自食其言，取消了这次对话。5月13日上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的信访局再次通知他们，决定于15日同学生进行对话。他们一方面表示同意，一方面又在参加人数上大作文章，先是提出了一个20人的名单，政府同意后，又要求增至200人，还没有等到充分商量，就指责“政府对话毫无诚意”，在接到对话通

知仅4小时之后,就急急忙忙抛出早已准备好的《绝食宣言》,发动了一场历时7天、前后有3000多人参加的大绝食,从此长期占据了天安门广场。“高自联”的头头王丹说,选在13日开始绝食,“正好可以借戈尔巴乔夫访华压他们”。极少数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把绝食学生当“人质”,以他们的生命为赌注,采取极其恶劣的手段要挟政府,使动乱更加严重。

在学生绝食过程中,党和政府继续保持了极其克制的态度,竭尽全力,在各方面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首先是学校工作人员、各级领导干部直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对他们进行思想疏导。其次是协助红十字会,先后调配了100多辆救护车,抽调了数百名医护人员,昼夜守护在绝食现场,并动员52家医院腾出近2000张病床,保证因绝食休克或致病的学生及时得到救护和治疗。三是提供各种物资,尽可能减少绝食学生的痛苦和保障他们的安全。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抽调干部、工人和车辆,通过红十字会,昼夜为绝食学生运送饮水,提供食盐和食糖;环卫局调出了洒水车,配备了脸盆、毛巾,供绝食学生洗漱;医药公司调来充足的防中暑、防感冒、防腹泻药剂,交由红十字会分发;食品部门运来大量饮料、面包等,以备紧急抢救学生时使用;商业部门调运了6000顶草帽,北京军区应北京市要求送来1000条棉被,供绝食学生白天避暑,晚上御寒;为保持绝食现场的卫生,搭起了临时冲洗厕所,环卫工人还趁深夜进行了绝食现场的大清扫;18日大雨前,又从公共交通总公司抽调78辆大客车,从物资局调来400多块厚木板,供绝食学生避雨、隔潮。在长达7天的绝食期间,没有发生一起学生因绝食而死亡的事件。但是,所有这些都未得到任何积极的反响。事实一再教育人们,极少数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是执意同我们作对到底的,容忍一千遍,退让一万步,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事态急剧恶化的情况下，赵紫阳同志不仅没有做他应当做的工作，反而煽动新闻界，进行错误的舆论导向，把已经恶化的局面搞得更加难以收拾。5月6日，赵紫阳同志对当时中央主管宣传和思想工作的胡启立、芮杏文同志说，对学潮的报道“放开了一点，游行作了报道，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甚至还说：“面对国内人心所向，面对国际进步潮流，我们只能因势利导”。在这里，他竟把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逆流称之为“国内人心所向”和“国际进步潮流”。他的这番指示，当天就向首都主要新闻单位作了传达，随后又作了多次部署。这样，《人民日报》等许多中央报刊便对游行、静坐、绝食等采取了充分肯定、积极支持的态度，进行了连篇累牍甚至言过其实的报道，连香港报纸也对这种奇特的现象表示惊讶。

在舆论的错误引导下，从5月15日开始，上街游行声援学生的群众一天比一天多，声势一天比一天大，从几万人、十几万人发展到几十万人，全国各地还有20多万学生赶来声援。一时间，似乎不参加游行就是“不爱国”，不表示声援就是“不关心学生的死活”。在这种情况下，绝食的学生骑虎难下，欲罢不能。许多教师和学生家长给领导机关和新闻单位写信、打电话，要求报社、电台、电视台不要把绝食的学生逼上死路，要求发发善心，救救孩子，停止这种“杀人舆论”，但没有得到什么效果。由于学生绝食和市民游行，首都北京的社会秩序陷于一片混乱，举世瞩目的中苏高级会晤受到严重干扰，一些活动日程被变更，有的被取消。与此同时，全国各大城市乃至所有省会城市游行的人数急剧增加，一些中小城市也出现了游行，波及面如此之广，骚扰如此之严重，是建国以来没有过的。

为了给学生撑腰打气，给动乱火上浇油，一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所谓“精英”，纷纷赤膊上阵，走上前台。5月13日

晚，严家其、苏绍智、包遵信等人在北京大学贴出《我们再也不能沉默了》的大字报，动员知识分子参加他们发起的声援学生绝食的大游行。5月14日，严家其、包遵信、李洪林、戴晴（《光明日报》记者）、于浩成（原群众出版社社长）、李泽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苏晓康（北京广播学院讲师）、温元凯（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刘再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等12人又发出《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要求宣布这次动乱是“爱国民主运动”，要求宣布非法的学生组织为合法，说如果不能实现要求，他们也将参加绝食。这个呼吁，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在中央电视台公开播出。这些人还多次到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说，进行煽动，诬蔑我们的政府是“无能的政府”，说什么由学生绝食“看到了中国的光辉前程”。接着，又组成了非法的“首都知识界联合会”，发表了《5·16声明》，倒打一耙地威胁说，政府如果不接受极少数人的政治要求，“将极可能把一个很有希望的中国引向真正动乱的深渊”。

在事态一天比一天严重的情况下，赵紫阳同志利用5月16日会见戈尔巴乔夫的机会，有意识地把斗争矛头引向邓小平同志，更使局势进一步恶化。他在会见时，一开头就说：“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他还说，这是他“第一次”公开透露了中国党的这个“决定”。第二天，严家其、包遵信等人就发表了极其猖狂恶毒的《5·17宣言》。他们咒骂说：“由于独裁者掌握了无限权力，政府丧失了自己的责任，丧失了人性”，“清王朝已经死亡76年了，但是，中国还有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他们毫无掩饰地说，“昨天下午，赵紫阳总书记公开宣布，中国的一切决策，都必须经过这位老朽的独裁者”。他们声嘶力竭地叫嚷：“老人政治必须结束！独裁者必须辞职！”对于这种极其反动的叫嚣，港台的一些报刊也遥相呼应。香

港的《快报》于5月18日发表《倒邓倒李不倒赵》的文章，说什么“赵紫阳的讲话充满暗示，现时国内的乌烟瘴气，全因邓小平掌舵而起”，“现今群情汹涌要倒邓倒李，而赵紫阳所扮演的角色，可以说是呼之欲出了”。还说，“倘若倒邓成功，而中国的改革确能走上开明法治之途和实现民主，对香港来说，是一则喜讯”。在这一派呼啸声中，咒骂邓小平同志、攻击李鹏同志的标语、口号铺天盖地，有的要求“邓小平滚下台”，有的提出“李鹏下台，谢国安民”。在这同时，“拥护赵紫阳”、“赵紫阳万岁”、“赵紫阳荣升军委主席”等标语口号充斥于游行队伍和天安门广场。动乱策划者们企图借混乱之机，乱中夺权。他们散发传单，宣称成立“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筹委会”，要取代市人民代表大会，并鼓吹成立“北京区政府”，取代合法的北京市人民政府。他们攻击依法选举产生的国务院是“伪政府”，造谣说已有外交部等十几个部“宣布独立”，脱离国务院，世界上已有30多个国家同我国断交。他们还造谣说，“邓小平已下台”，于是就有人抬着棺材游行，烧毁邓小平同志的模拟像，在天安门广场燃放鞭炮庆祝他们的“胜利”。

首都的局势越来越严重，无政府主义恶性泛滥，许多地方已陷入一片混乱和白色恐怖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党和政府如果还不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那么，就会再度严重贻误时机，进一步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这是广大人民群众绝对不会允许的。

六、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正确措施

为了保证北京市的社会安宁，保障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障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政府正常执行公务，在北京市警力严重不足，已无法维持正常的生产、工作和生活秩序的情况下，根据《中华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89 条第 16 项授予的权力，国务院决定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这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也是果断的、正确的决策。

5 月 19 日，中央召开首都党政军机关干部大会，宣布了进一步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动乱的决策。赵紫阳同志顽固坚持同中央正确决策相对立的错误立场，既不同意和李鹏同志一道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也不同意主持大会，甚至连出席一下大会都不同意，把他同党闹分裂的态度公开暴露于全党全国和全世界面前。

在这之前，5 月 17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了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问题，极少数掌握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人，出于反革命的政治需要，当天就泄漏了戒严的机密。一名在赵紫阳同志身边工作的人对非法学生组织的头头说，现在军队要“镇压”你们，别人都同意，就是赵紫阳反对，你们要做好准备。17 日晚，鲍彤召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部分人员，在泄漏了即将戒严的机密之后，发表了“告别演说”，警告与会者不得把会上密谋策划的情况透露给别人，否则就是“叛徒”，就是“犹大”。5 月 19 日，就是这个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副局长高山，赶到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向正在开会的人传达了所谓“上边”的指示。随后由陈一浴（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主持，用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等 4 家的名义，起草了《关于时局的 6 点声明》，在天安门广场进行了广播，并广为散发。《声明》要求，“公开高层领导的决策内幕和分歧”，要求“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召开中国共产党特别代表大会”，并且授意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要尽快结束绝食”，暗示政府将“采取极端举动（军管）”。接着，自称来自“体改委”的一些人窜到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讲，说什么“怀着极为悲痛极为愤慨的心情，公布一个绝对真实的消息，赵紫阳总书记已经被罢免”，

呼吁全国罢工、罢课、罢市，煽动群众“立即行动起来，进行决死的斗争”。这个演讲，很快就被印成《人民日报号外》广为散发。当晚，在北京站广场等公共场所还发现题为《关于学运策略的几点建议》的传单，指示“目前绝食对话已不是我们的手段和要求，应当改为和平静坐，并旗帜鲜明地提出新的政治要求和口号，即：（一）紫阳同志不能走；（二）立即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特别会议；（三）立即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还说“对军队的到来不应采取惶惶不安、如惊弓之鸟的态度”，“这种对待军队的态度及方式，要在他们到来之前反复向同学们解释宣传”。最近一些已经被逮捕归案的“高自联”和“工自联”的头头也交待，5月19日下午4时许，有人自称中央某机关工作人员，拿着条子到“天安门广场指挥部”，透露了即将实行戒严的消息。正是极少数掌握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人同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紧密结合，使他们得以及时调整策略，在当天晚上抢在中央召开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之前45分钟宣布把绝食变成静坐，造成既然学生已经停止绝食政府就没有必要戒严的假象，以迷惑群众；得以及时组织力量，裹胁不明真相的人，在各主要路口设置路障，堵截军车；得以继续组织舆论，混淆视听，扰乱人心。他们一面恶毒咒骂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说什么“我们不要邓小平的智慧和经验”，一方面大肆吹捧赵紫阳同志，说什么“党无紫阳，国无指望”，呼唤“还我紫阳”。他们还阴谋集结力量，搞更大的动乱，宣称要动员20万人占领天安门，要在5月20日组织全市性的总罢工，并且同19日赵紫阳同志称病请假3天相配合，扬言3天之后就要成立“新政府”。

在极端紧急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国务院断然决定于20日上午10时起在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以防止事态更加恶化，掌握制止动乱的主动权，给广大反对动乱、渴求安定的人民群众撑腰。但是，由于我们的决策事先被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所掌握，部队进

城仍然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和阻挠。戒严的前夕和戒严后的头两天,所有的主要交通路口都被堵塞,220多辆公共汽车被劫持,当作路障,交通陷于瘫痪,各路戒严部队不能及时按计划进入指定地点。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驻地继续被围堵,街头煽动的演讲随处可见,制造谣言的传单比比皆是,数万人的游行示威接连不断,首都北京处于一片混乱和恐怖之中。随后几天,戒严部队采取不同的方式陆续进入城内,广大武警、公安干警排除万难坚持执勤,各城区和近郊区把工人、市民、机关干部组织起来,建立了约12万人的首都群众维持秩序工作队,各远郊县也出动了民兵,依靠军、警、民的协同努力,使首都交通运输和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有所好转,人心逐渐趋于安定。但是,极少数人制造动乱的活动一天也没有停止,推翻共产党领导的目标丝毫也没有改变,事态正在一天一天地向着反革命暴乱的方向发展。

戒严之后,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继续占据天安门广场不走。他们要把广场作为所谓“学运乃至全民族的一个中枢”,一旦政府做出什么决定,就准备在广场上“作出强烈的反应”,“组成一个反政府的统一战线”。他们早就策划在广场挑起流血事件,认为“只要不撤离广场,政府就会进行镇压”,“鲜血可以促使人民觉醒,使政府分化瓦解”。为了支撑广场的局面,他们依靠海内外反动势力提供的资金,不断改善设施,装备先进的通讯工具,每日耗资10万余元,而且开始非法采购武器。他们依靠香港声援团提供的帐篷,在广场建立了所谓“自由村”,开办了所谓“民主大学”,声称要使它成为“新时代的黄埔军校”。他们还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树立了一个什么女神像,原来叫“自由女神”,后来又改名为“民主之神”,把美国的民主、自由作为他们的精神支柱。刘晓波等幕后策划者担心静坐请愿的学生难以坚持,就亲自走到前台,搞了一个4人参加的48小时至72小时的绝食闹剧,为青年学生加

油打气。他们说：“只要广场的旗子不倒，就可以坚持斗争，辐射全国，直到政府垮台。”

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利用政府和部队在戒严之后仍然采取的克制态度，继续组织各种非法活动。他们继“高自联”、“工自联”、“绝食团”、“天安门广场指挥部”、“首都知识界联合会”等非法组织之后，又相继建立了“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北京市民自治联合会”等非法组织。他们用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的名义，明目张胆地打电报给一些部队，挑拨离间，进行策反。他们组织专门的舆论班子，筹办地下报纸，从事颠覆政府的地下活动。他们结成死党，集体进行地下宣誓，声称“绝不出卖自己的良知，绝不向专制屈服，绝不向八十年代中国的皇帝称臣”。四通公司总经理万润南在国际饭店召集“高自联”的部分头头开会，提出了退出天安门广场的6个条件，即“军队回去，戒严取消，李鹏下台，邓小平、杨尚昆退休，赵紫阳复出”，并且准备组织所谓“凯旋在子夜的大进军”。特别严重的是，他们认为赵紫阳同志请病假离开总书记的岗位之后，从党内解决问题的希望已经渺茫，转而寄希望于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紧急会议。严家其、包遵信等致电人大常委会领导人，说什么“目前宪法受到少数人的粗暴践踏，我们紧急建议，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解决当前面临的严重问题”。在某位人大常委委员的支持和授意下，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发出《提议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的征询意见函，征集了部分人大常委的签名，并且向外地部分人大常委发了加急电报。他们采取阴谋手段，向一些人大常委发函、发电时，只讲建议开会，而不讲他们真正的主张，企图欺骗一些不明真相的同志，甚至盗用他们的名义，强加于人，以售其奸。在办了这些事情之后，严家其、包遵信就在香港的《明报》上，发表了《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当前中国的问题——兼告李鹏

书》，呼吁“每一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每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投下神圣的一票，废除戒严令，罢免李鹏总理职务”。

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还肆无忌惮地挑动和组织暴力行动。他们纠集本地的流氓地痞、外地的流窜犯以及未改造好的刑满释放分子，网罗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刻骨仇恨的人，拼凑所谓“敢死队”、“飞虎队”、“义勇军”等恐怖组织，扬言要软禁、绑架党和国家领导人，要用“攻打巴士底狱”的方式夺取政权。他们散发煽动反革命武装暴乱的传单，鼓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号召组织“可能被称为人民军的武装力量”，“团结包括台湾国民党在内的各种力量”，“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旗帜鲜明地反对共产党和它的政府”。他们扬言，“秋后算账，非算不可”，要算党的账，算政府的账，并且准备了要镇压的干部名单。香港《明报》还刊登了动乱组织者和策划者之一的刘晓波6月2日同一个所谓“大陆民运领袖”的“对话”，公然叫嚷“期望赵紫阳复出，我们就必须在人民中组织武装部队”。

动乱策动者的种种活动，都有雄厚的财力作后盾。除四通公司等单位给予几十万元的物质支援外，还得到海外敌对势力和一些组织与个人的财力物力支援。美国、英国和香港的一些人，给了上百万美元和数千万港币。这笔钱中的一部分，被用于破坏戒严活动，每一个参加设路障、堵军车的人，每天都可以得到30元的报酬。同时，他们还许下高价，收买暴徒，去烧军车和打解放军，许诺烧一辆军车给3000元，抓住或打死一个军人也给几千元。台湾一位军政要员发起了“送爱心到天安门”的运动，带头捐款10万元台币。国民党一个中委发起募捐1亿元台币，设立所谓“支援大陆民主运动基金”。台湾艺术文化界一些人发起“血脉相连声援大陆民主运动”。北京“高自联”致函“台湾艺文界朋友”，说什么“在此关键时刻，得悉台湾艺文界挺身而出”，“给予我们急需的物资和精神支

持，我们对此表示由衷的感谢和敬意”。

所有这些说明，极少数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制造的动乱，绝不像善良的人们想象的那样，只要政府做点让步就可以平息，或者只发布一个戒严令就可以解决问题。他们是横下一条心，要和海外、国外敌对势力联合起来，同我们死战到底的。一切一厢情愿的善良愿望，只会使他们更加放肆地向我们发动进攻。时间拖得越久，付出的代价越大。

七、极少数人是怎样挑起反革命暴乱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担负着“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的神圣职责，而且担负着“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努力为人民服务”的崇高义务，这是《宪法》第29条明文规定的。部队进城维护社会治安，正是执行《宪法》赋予的任务。

5月20日宣布在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之后，尽管遇到重重阻拦，部队仍然按照既定计划，采取不同的方式，陆续进入城内，到达一部分警戒部位。极少数暴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深知，如果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全部按计划到位，那么，他们正在从事的种种非法活动和反革命活动就无法再进行下去，他们的全部阴谋就将很快以失败而告终。于是，他们窥测时机，蓄意挑起事端，竭力使动乱加剧，最终发展成为一场反革命暴乱。6月1日，我公安机关收审了非法组织“工自联”的几个头头，他们就借机煽动一些人，包围和冲击了北京市公安局、市委、市政府机关和公安部。6月2日晚，中央电视台借用了10个月的武警部队的一辆吉普车，在返回原单位途中，由于车速过快，路面有水打滑，造成翻车事故，撞死了人，但没有一个是学生。这本来是一起交通事故，有关部门正在处理，而极少数人却有意把它同戒严部队按计划进城的行动联系起

米，大造谣言，说是戒严部队的开道车故意轧死学生，鼓动不明真相的人，要抢夺尸体，举行抬棺大游行。一时间，人心浮动，气氛紧张。经过这样的煽动和鼓噪，暴乱的火就被他们点了起来。

6月3日凌晨，当部分戒严部队按计划进入警戒目标的过程中，就有人有组织地煽动一些人在建国门、南河沿、西单、木樨地等路口阻拦大小车辆，设置路障，拦截军车，殴打战士，抢夺军用物资。曹各庄附近12辆军车被拦。从燕京饭店门前经过的战士被强行搜身。电报大楼前的军车轮胎被扎穿，并被隔离墩围住。

拂晓前后，永定门桥头的军车被推翻。木樨地军车车胎被扎穿。朝阳门的400多名进城战士被歹徒用石块乱砸。六部口、横二条一带军车被拦截，战士被围困。

早上7时左右，在六部口，有的歹徒钻进被围困的军车内，抢夺装有子弹的机枪。从建国门到东单，以及天桥附近，进城部队被零星隔断，遭到围攻、殴打。在建国门立交桥上，有些战士的衣服被扒光，有的战士被打得遍体鳞伤。

上午，虎坊桥一带的进城部队被冲，战士遭痛打，有的被打瞎了眼睛。一些被打伤的战士在送往医院途中遭拦截，急救车车胎被放气，伤员被绑架。虎坊路至陶然亭21辆军车被围，在战士转移弹药时，前往护卫的民警被打伤。

中午，被拦阻在府右街南口、正义路北口、宣武门、虎坊桥、木樨地、东四等路口的解放军战士，有的被打伤，有的钢盔、军帽、雨衣、水壶、挎包被抢。六部口一伙人截了一辆载有枪支弹药的军车，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多次解围均未成功。车上的枪支弹药如被抢走或发生爆炸，后果不堪设想。为了保护首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武警部队施放了催泪弹，驱散了人群，抢回了弹药车。

在拦截、砸抢军车的同时，一伙暴徒围堵和冲击国家机关和重

要部门。他们冲人民大会堂、冲中宣部、冲广播电视部、冲中南海的西门和南门。保卫这些机关的武警战士和公安干警数十人负伤。

随着事态的急剧恶化，暴乱的挑动者更加猖狂。下午5时许，非法组织“高自联”和“工自联”的头头，在天安门广场分发了菜刀、匕首、铁棍、铁链子和带尖的竹竿，声言“抓住军警就要往死里打”。“工自联”在广播中大肆叫嚣，要“拿起武器推翻政府”。还有一伙暴徒纠集了上千人，推倒西单附近一个建筑工地的围墙，抢走大批施工工具和钢筋、砖块等，准备打巷战。他们的广播站不断播放如何制造和使用燃烧瓶、如何堵烧军车之类的“知识”，进行教唆和挑动。他们策划利用第二天是星期天的时机，煽动更多的人上街，发动更大规模的打、砸、抢、烧，造成一个群众暴动的态势，一举推翻政府，夺取政权。

正是在这万分紧急的关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不得不下定决心，命令驻守在首都周围的戒严部队，强行开进，平息反革命暴乱。

八、反革命暴徒是怎样残害解放军的

自戒严以来，陆续进城的戒严部队根据中央的指示，始终保持高度克制的态度，尽量避免发生冲突。6月3日暴乱发生后，在部队进城前，为了避免伤害群众，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于晚6时半发出《紧急通告》，要求“全体市民要提高警惕，从现在起，请你们不要上街去，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广大职工要坚守岗位，市民要留在家里，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这个《通告》，通过电台、电视台和各种广播器，进行了反复广播。

6月3日晚10时前后，奉命向城内开进的各路戒严部队先后

进入市区。但在各主要路口，都受到严重阻拦。即便在这种情况下，部队仍然采取了极其克制的态度。而反革命暴徒怀着对解放军的刻骨仇恨，却利用这种克制，发动了骇人听闻的打、砸、抢、烧、杀。

22点至23点，从翠微路、公主坟、木樨地到西单一线，有12辆军车被烧。有些人用卡车运来砖头，向战士猛砸。一些暴徒把无轨电车推到路口，放火焚烧，阻断了道路。有的消防车赶去灭火，也被砸烂、烧毁。

23点前后，虎坊桥3辆军车被砸，1辆吉普车被推翻。安定门立交桥军车被围堵。崇文门大街一个团的战士被围堵。建国门立交桥30辆军车被围堵。北京煤炭工业学校以西300多辆军车被围堵。为保证军车前进，有的战士和指挥员下车做疏导工作，被围攻殴打，有些被强行绑架，不知去向。被打伤的，有尉官、校官和将军。在南苑三营门受阻的军车，为避免冲突，往东绕行，至天坛南门再次被堵，许多军车被砸、被烧。珠市口一辆军车被堵后，一帮人爬到车上，下边有个干部模样的人劝他们下来，当即被痛打，生死不明。

6月4日凌晨以后，焚烧军车的暴行愈演愈烈。在天坛东侧路、天坛北门、前门地铁西口、前门东路、府右街、六部口、西单、复兴门、南礼士路、木樨地、莲花池、车公庄、东华门、东直门，以及朝阳区的大北窑、呼家楼、北豆各庄，大兴县旧宫乡等地，数十个路口的数百辆军车，被暴徒用汽油、燃烧瓶和土制喷火器引燃，火光冲天，有的战士在车内被活活烧死，有的跳下车后被活活打死。有的地方，几辆、十几辆，甚至二三十辆军车同时被烧，一片火海。在双井路口，有70余辆装甲车被围，其中20余辆车上的机枪被暴徒拆掉。京原路口至老山骨灰堂以西，30多辆军车被暴徒付之一炬，现场浓烟冲天。有的暴徒手持铁棍，推着汽油桶，在路口堵截，见车

就烧。多辆部队运粮车、被服车被暴徒抢劫，不知去向。有几名暴徒在复兴门立交桥一带，开着抢来的装甲车，边行边进边开枪。非法组织“工自联”还在广播上宣称，他们缴获了一部军用电台和密码本。

在砸毁、焚烧军车的同时，一些暴徒对民用设施和公共建筑物发动了攻击。西城区的燕山等商店的橱窗被砸。天安门前和毛主席纪念堂西侧的松树墙被点燃。一些公共电汽车、消防车、救护车、出租汽车被砸毁和烧毁。特别恶毒的是，一伙人驾驶一辆装满汽油的公共汽车驶向天安门城楼，企图放火烧毁城楼，在金水桥南被戒严部队及时截获。

尤其不能令人容忍的是，暴徒们不仅疯狂攻击军车，大搞打砸抢烧，而且，对解放军战士发动了灭绝人性的残杀，手段极其凶暴野蛮。

6月4日凌晨，东单路口一伙暴徒用酒瓶、砖头、自行车砸伤战士，许多战士血流满面。复兴门一辆军车被截，车上的某部管理科长、管理员、炊事员等12人被拉下车来，强行搜身，然后痛打，多人受重伤。六部口4名战士被围攻殴打，有的当场死亡。广渠门附近3名战士被痛打，只有一名被群众救出，两名下落不明。在西城区西兴盛胡同，有20余名武警战士被一伙歹徒毒打，有的被打成重伤，有的下落不明。护国寺一辆军车被截，战士被拉下来痛打后当作人质，一批冲锋枪被抢走。一辆装满砖头的汽车，由东交民巷开往天安门广场，车上的人高喊：“是中国人的上来，砸解放军去。”

拂晓之后，残害解放军战士的暴行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武警一支队的一辆救护车，拉了8名受伤的战士送往附近医院时，被一伙暴徒拦住，当场就打死一名，还叫嚷要把其余的7名一齐打死。在前门大街的一家自行车店门前，有3名解放军战士被打成重伤，暴徒们围住狂叫：“谁敢救他们就打死谁。”在长安街上，一辆

军车熄火，一二百名暴徒一拥而上，猛砸驾驶室，将司机活活砸死。西单十字路口以东30米处，一名战士被打死，又在尸体上浇汽油焚烧，在阜成门，一名战士被暴徒残害后，尸体被悬挂在立交桥的栏杆上。在崇文门，一名战士被一伙暴徒从过街天桥上扔下，浇上汽油，活活烧死，暴徒们狂叫，这是“点天灯”。在西长安街首都电影院附近，一名解放军军官被暴徒打死后，剖腹挖眼，把尸体挂在一辆正在燃烧的公共汽车上。

在几天的暴乱中，被暴徒砸毁、烧毁、损坏的军车、警车和公共电汽车等车辆达1280多辆，其中军用汽车1000多辆，装甲车60多辆，警车30多辆，公共电汽车120多辆，其它机动车70多辆。一批武器、弹药被抢。戒严部队战士、武警战士、公安干警负伤6000多人，死亡数十人。他们为保卫祖国，保卫宪法，保卫人民，付出了鲜血甚至宝贵的生命。对他们的功绩，人民将永远铭记。

如此惨重的代价，最有力地说明了戒严部队所采取的极大的容忍和克制态度。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军队。这支军队对敌人狠，对人民和，历来如此，他们在战争年代能够打败美帝国主义武装起来的国民党800万军队，打败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能够有效地保卫我们国家的神圣领土、领海和领空，为什么在平息反革命暴乱中却造成这么大的伤亡呢？为什么他们手中有武器，反而挨了打，甚至被打死呢？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是因为好人和坏人混杂在一起，使我们有些应该采取的断然措施难于出手”。这也正说明了人民解放军是热爱人民的，是不愿意误伤群众的。他们忍辱负重，从容赴死，正是人民军队本质的充分体现。否则，怎么可能造成这么大的伤亡和损失呢？这不正说明我们的军队为了保护人民而不惜牺牲自己吗？而最终为了平息反革命暴乱，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戒严部队在伤亡严重、忍无可忍、让无可让而又很难前进的情况下，经过一再警告，迫不

得已奉命对空鸣枪开道，进行反击，击毙了一些肆虐的暴徒。由于围观的人很多，有的被车撞、人挤，有的被流弹误伤，有的被持枪歹徒击伤击毙。据现在掌握的情况，暴乱中有3000多名非军人受伤，200余人死亡，包括36名大学生。这当中，有罪有应得的暴徒，有被误伤的群众，还有正在现场执行任务的医护人员、联防人员和维护秩序工作队员等。对于被误伤的群众和执行任务中受伤害的人员，政府要认真地做好善后工作。

由于“美国之音”造谣和一些人有意传谣，社会上一度盛传，戒严部队进城之后，“血洗天安门广场”，“有数千人甚至上万人倒在血泊之中”。真实情况是，戒严部队进入广场之后，凌晨1时半，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出紧急通告：“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凡在天安门广场的公民和学生，应该立即离开，以保证戒严部队执行任务”。这个紧急通告用高音喇叭，进行了反复播放，时间长达3个多钟头。这时，停留在广场上静坐的青年学生集中在广场南端人民英雄纪念碑一带。3时左右，他们经过内部磋商，派出代表向戒严部队表示，愿意自动撤出广场，戒严部队当即表示同意。凌晨4时半，广场上广播了戒严部队指挥部的通知：“现在开始清场，同意同学们撤离广场的呼吁。”同时，广播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关于迅速恢复天安门广场正常秩序的通告。停留在广场上的数千名青年学生听到通告后，打着各自的旗子和横幅等，两边布置了手拉手的纠察队，于5时左右离开广场。为了保证学生们的安全撤离，戒严部队在广场东侧南口开出了一条宽阔的通道，保证学生顺利、平安地离开。这时，还有一些坚持不走的学生，戒严部队按照“通告”要求，强制他们离开了广场。到5时半，清场任务全部完成。广场静坐的学生，包括最后被强制离开的，没有死一个人。有人造谣说，广场“血流成河”，自己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完全是胡说八道。

以天安门广场重新回到人民手中和戒严部队全部到位为标志，首都反革命暴乱被一举粉碎。在平息反革命暴乱的过程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不怕牺牲，英勇战斗，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人民群众救护伤员、解救被围困的战士、积极配合和支援戒严部队，涌现出许多动人心弦的好人好事。由于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北京市的经济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其他方面的损失更难以用金钱来计算。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正在为挽回遭受的损失，进行艰苦的劳动。现在，首都各项秩序基本恢复正常，全国局势也较快地趋于平稳，这反映了中央的正确决策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拥护。但是，动乱和暴乱尚未彻底平息，极少数反革命暴乱分子不甘心灭亡，仍在进行种种破坏活动，甚至梦想卷土重来。

为了取得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彻底胜利，我们要放手发动群众，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清查反革命暴乱分子的工作进行到底。要彻底揭露动乱和暴乱的阴谋，依法惩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即那些长期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和搞政治阴谋的人，同海外、国外敌对势力相勾结的人，向非法组织提供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人，以及制造打、砸、抢、烧、杀等种种暴行的刑事犯罪分子。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通过坚决果断、艰苦细致的工作，集中打击极少数首恶分子和拒不改悔的顽固分子，尽力扩大教育面和团结面。在此基础上，依靠广大群众，努力增产，厉行节约，艰苦奋斗，尽快把动乱和反革命暴乱造成的损失全部夺回来。

委员长、各位副委员长和委员！

我国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正义斗争，得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政府和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但是，在国际上也有一些国家，主要是美国和西欧某些国家，歪曲事实真相，进行造谣中伤，甚至对我实行种种的所谓谴责和制裁，

掀起反华浪潮，粗暴干涉我国内政。对此，我们深表遗憾。对于一切外来压力，我国政府和人民过去没有屈服过，现在不会屈服，永远也不会屈服。谣言必将破产，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我国将毫不动摇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我国将一如既往地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世界发展继续作出自己的贡献。

（原载1989年7月7日《人民日报》）

接受要求之后的动乱升级

——4月17日至18日记事

任 玉 清

一些善良的人至今还认为，政府如果早点接受学生的请愿，早点与学生对话，早点对学生让步，就不至于发生动乱和暴乱。

但是，事实告诉我们，无论政府怎样克制和容忍，极少数人总要将动乱升级。

4月18日，王丹等人首次要求同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对话，继而煽动学生首次冲击中南海的行动就说明了这一点。

4月15日，胡耀邦同志逝世。广大群众和学生沉痛悼念胡耀邦同志。但是悼念活动也出现了明显的异常现象。4月16日香港《明报》的一篇报道说：“挽联和大字报的性质已经渐渐从个人哀悼转为政治化，要求民主、批评当权者的政治改革。口号越来越多，哀悼之思，一夜之间转化为气愤之情。”

4月17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刊登一幅群众在纪念碑前围着花圈的照片。日本共同社记者称，《人民日报》这一行动“表示党承认这种做法。”许多学生也正是这样认为。

这天，第一支进入天安门广场的是中国政法大学近500人的队伍，学生们说，他们是看了《人民日报》的照片以后来的。

北大王丹等人也将花圈送到了天安门广场。到了夜里，王丹又在北大三角地鼓动了近千名学生去天安门广场。

18日凌晨，王丹在纪念碑前演讲，提出了事先与李淑娴等人

商议过的7条要求，其中最主要的是两条：一是，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过；二是，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反自由化中所谓“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昭雪。这两条的实质，就是要在中国取得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实现资本主义化的绝对自由。

清晨，学生们被鼓动到人民大会堂前，提出向人大常委会递交请愿书。出来接待的工作人员答应负责转达他们的要求。

7时30分，王丹让同学们坐下，自己去给李淑娴打电话。王丹回来后说，李老师让我们继续坚持，她将动员6千多学生来声援我们。

8时，中央办公厅、国务院信访局负责同志邀请学生代表进入人民大会堂，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王丹、郭海峰（后来担任“高自联”秘书长），将请愿书交给信访局负责同志。

本来事情已经可以结束。但王丹等又称这次对话不能令人满意，又要求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出来对话。

9时30分，李淑娴在北大三角地贴出三张小字报，号召人们前去声援天安门广场的学生。

10时30分，坚持在广场静坐的只剩下二三百人。王丹将让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出来对话的要求，降为让副委员长出面。接待人员向他们解释，请委员长们出面要有一定程序。

中午，广场上的学生只剩下一百多人。王丹等人又降低了要求，说让人大常委会委员出来也可以。

下午3时，部分高校的几百名学生陆续到达广场，王丹开始煽动学生冲击人民大会堂。

下午5时，接待人员答复学生，人大常委会委员刘延东等三人将与学生座谈。

这时，广场上的学生陆续增多，王丹等人突然提出不对话了，要求人大代表在晚7时50分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第一层台阶上当

众接他们的请愿书。并说，只要接了请愿书就什么事也没有了。

有关领导又同意了学生的这一要求。

晚7时50分，人大常委委员刘延东，人大代表陶西平、宋世雄在人大大会堂东门外从郭海峰、李京津（后来担任“工自联”法律顾问）二人手里接过了“十点示威要求”和“七点要求”的请愿书。十多位外国记者早已对准了摄像机镜头。

接下请愿书，果真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吗？

不。3个小时之后，马上就发生了2千多人冲击新华门的事件。他们围聚新华门前，堵塞了长安街的交通。他们打伤了维持秩序的警卫战士，呼喊着重：“李鹏出来”，每隔半小时冲一次新华门。值得注意的是，人群中有人（自称是北大学生）竟打着写有“绝食”二字的横幅。而此时，王丹却嘻笑着与两个女同学站在一边看热闹。

19日凌晨4时20分，市政府在现场广播了通告，指出冲击党政机关是违法的，是法制不能允许的，这已不是正常的悼念活动。要求在场的人群离开现场。

当工作人员和值勤武警一出现，王丹第一个溜掉了。

清晨5时许，在工作人员和值勤武警的劝说和疏导下，围聚在新华门前的人逐渐散去。

为什么王丹等人递交了请愿书后，又提出对话？有关方面答应对话后，他们又要求当众接请愿书？这一要求满足了，他们为什么又去冲中南海？

请看北大一学生事后揭发的材料：

“4月19日，当我怀着兴奋的心情与另外几个同学聊我们在天安门和新华门前的行动时，一位不是我们班，但是行动的中坚人物（王丹）说，新华门前最来情绪的就是拱起警察的火，只要警察无奈，一动手，我们就有借口把事情扩大。我问，那你们是有意让警

察打我们了？他说：话不能这么说，但这样才能号召同学。

原来如此，我心一抽。我是怀着为民主献身愿望参加这一伟大运动的，没想到有人竟利用我。经验告诉我，阴谋家制造冲突都是这一着，而坐收渔人之利，而今我身边也有！”

这位同学和更多善良的人们当时也许没有想到，这还仅仅是开始。以后，类似的，或者说是更恶劣的阴谋、欺骗，在这场风波中还将一再出现，极少数策划者非使动乱不断升级不可，他们早已下了决心。

（原载 1989 年 7 月 18 日《北京日报》）

炮制出来的“4·20新华门血案”

——4月19日夜至20日凌晨纪实

任 玉 清

4月18日夜至19日凌晨，王丹等人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请愿书后，又冲击了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新华门。虽然事先李淑娴曾向王丹授意过：“到新华门静坐，必要时往里挤，只要警察敢管，就是打人。这样能唤起同学的同情心。”但是公安人员一出现，人群很快就疏散了。动乱的策划者和组织者蓄意要制造流血冲突的阴谋没有得逞。

但是，他们绝不愿意就此罢休。虽然他们当时还想不出用大学生们的名义提出任何新的请愿要求，也找不到什么需要找国务院交涉的事由，然而，19日夜至20日凌晨，他们又煽动和指挥北京的一些大学生和社会上的人再次冲击新华门，以制造一个根本没有血案的所谓“4·20新华门血案”，再次将动乱引向升级。

19日晚，王丹等人在北大三角地主持的第16次“民主沙龙”上，暴露了他们誓与党和政府斗到底的用心。他们提出，新成立的“北大团结学生会筹委会”要接受上次行动“没有组织、没有纲领、没有口号”等教训，领导“五四”以前的一切学生运动。一个学生还当场传达了金观涛的意见：“当前形势对我们非常有利。清华、北大要联合起来。”一些人还提出要用行动来实施严家其的观点：“流血可以推进民主化的进程。”

与此同时，一些“行动者”则在新华门又掀起了一股狂潮。

这天晚上 21 时许，数以千计的学生又一次向新华门聚集。尽管有的大学生竭力要求人们坐下，但大约半小时后，一些人便开始有组织地向新华门冲击。执勤官兵组成几道人墙，顽强地阻拦着洪水般涌来的人群。

零点左右，疯狂的冲击达到高潮。黑压压的人群狂飚般地一次接一次地向新华门大门口逼进，门前的警戒线一次次地被撞成“S”型，警卫战士的军衣早已被汗水湿透。这时，一个谣言在人群中飞传：“中央的头儿就在新华门的二楼上，实在闹急了，就下来和学生们对话。”冲击者更加狂暴了，瓶子、鞋子、石块、还有花圈一齐抛向警卫战士。有人挥舞着拳头，不断高喊着：“李鹏出来！”有人辱骂警卫战士：“奴才滚开。”还有人无端地怪叫着：“不许打人！”此时，一些外国记者则爬到新华门前国旗旗杆的底座上，不断地拍照、录音。一个又高又瘦的外国记者还连声大喊：“OK！”

大约冲闹了 40 分钟后，冲击的人群疲惫了，一些学生坐了下来。吾尔开希等人便站出来进行煽动，打气，什么“××滚蛋”等语言不断地从他们嘴里进出，恶毒咒骂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顺口溜也不断流传。

这种野蛮冲击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的情形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没有发生过。为了制止事态进一步扩大，20日凌晨 2 时 30 分，市公安局的宣传车，开始在新华门东侧的长安街上广播北京市人民政府的通告，要求新华门前的人立即撤离，警察也开始对长安街进行清场。

到凌晨 4 时，在新华门前静坐的一百多名大学生仍坚持不走。在市公安局和一些学校领导的一再劝说下，有一些同学站起来想走，但马上有人威胁道：“谁走谁就是叛徒！”想离去的学生又怯生生地坐下了。

4 时 50 分，市内一些公共汽车即将按时发车，而这百余名大学

生还是不肯离去，眼看交通就有阻塞的危险。于是，不带任何警械的公安干警们制止了有些大学生推搡拉扯的抵抗，强行架着他们上了公共汽车。

学生们上车后仍在狂呼乱叫，还打碎了车窗玻璃，有的学生因此刮破了手臂。吾尔开希从车窗探出脑袋对着警察又叫又骂，一名女学生高喊：“打倒共产党”。这时，在现场的一名工作人员立刻蹬上汽车，严厉地说道：“我听见这个女生喊‘打倒共产党’。你们说，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听到这义正辞严的声音，又见有4名警察也上了车，学生们才安静下来。随后，司机将车驶出新华门地段。

20日凌晨，新华门前除了个别学生打破车窗时手臂被划破外，根本没有发生什么流血事件。

事后，外电在报道此事时都说，警方采取了极其克制的态度。有的报道还说，看到这种在美国白宫前都绝对不会发生的事情在新华门出现，“感到十分震惊”。就连最能造谣的“美国之音”也只能说：“学生宣称，200多人挨了警察的打。然而记者只看见几十人推打。学生说40多人被拘留，记者没有得到官方证实。”

然而，在首都一些高校的校园里，却立即传出了耸人听闻的所谓“4·20新华门血案”的谣言。

20日凌晨5时许，将学生们强行带离新华门的汽车开到北大南门后，冲击新华门的学生马上涌到了北大三角地，有人演讲“新华门前血流成河”，有人居然展示什么“血衣”，有人竟然呼喊出“讨还血债”的口号。北大当天就贴出十几张大小字报，“谴责政府暴行”，其中一张题为《法西斯的镇压》大字报竟把谎言编得绘声绘色：“大批公安警察突然出现，冲开手无寸铁的群众，大喊‘打死他们、往死里打’。警察专打后脑、腰、肾、胸和其他要害。”

清晨7时，在北师大校门口，几名学生商议完22日游行事宜

后，一个学生便向行人演讲：“昨晚警察在新华门打人了，不光打学生，还打了老人、女人和孩子。从西单一直打到王府井，是上头让他们干的。”

在人大、清华等数十所高校还出现了“一千名科技工作者倒在血泊中”，“4名学生代表被扣留”等弥天大谎。别有用心的人还嫌不够，又抓住4月19日晚北师大女生郭向东看演出归来，与无轨电车相撞致死一事，无中生有地造出了“共产党的军车轧死了学生”的谣言。

有人说，这场动乱的策划者搞的是“谣言政治”。一点也不错，正是这一个个谣言的蛊惑和挑唆，大大激化了青年学生同政府的对立情绪。4月20日北京高校大字报的一个突出内容就是号召学生们罢课，游行，参加“4·22”胡耀邦同志追悼会。北大“团结学生会筹委会”贴出了《告北京高校书》，提出“近期请愿活动的目的是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其形式是游行、罢课、静坐、绝食。”吾尔开希则在北师大学生集会上公开叫嚣“偿还4·20血债”，鼓动学生21日晚“到天安门广场去，继续斗争。”李淑娴则早就指示：“下一步要求参加追悼会，很多人都有这种心理。这样事情就更大了，还能推向全国。”

动乱的策划者们制造一个实际上没有发生过的“4.20血案”，就是利用大学生自视“特殊公民”的心理弱点，为这个“下一步”作舆论准备。他们平日吹捧大学生能够作出“理智的抉择”，但是这时，他们需要的却是大学生失去理智的狂热。这是动乱升级的需要。两天之后，“下一步”——一个新的圈套正在等着北京的大学学生呢。

（原载1989年8月22日《北京日报》）

精心策划的一场骗局

——胡耀邦同志追悼会前后纪实

任 玉 清

今年春夏之交发生的这场动乱，是借胡耀邦同志逝世提前爆发的。

中央关于召开胡耀邦同志追悼会的公告是4月19日晚才公布的。然而在16日，受控于鲍形的国家体改所成员《经济学周报》编辑高瑜便找到北大学生王丹，明确地告诉他：“这次咱们要掀起十里长街……因为中国的老百姓都成了华老栓了，成了阿Q了。”“星期六(22日)我们希望学生都到人民大会堂外。”18日，李淑娴又向王丹授意：“要求参加追悼会，很多人都有这个心理，这样事情就闹大了。”

在22日之前，无论是18日向人大常委会递交请愿书，还是20日凌晨冲击新华门，都是动乱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们为这一天所作的准备。

许多大学生是怀着对胡耀邦同志的悼念之情来参加一些活动的，但是，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完全不是这样，他们从一开始就要掀起一场反对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斗争。

4月15日下午，耀邦同志去世才几个小时，清华大学就贴出了“李鹏辞职”的标语。晚上，北京大学出现了大字报：“我们要求撤换无能政府，推翻专制君主，建立民主政治。”16日，中国人民大学的标语提出：“悼胡公骂李公不如倒了邓公；说千条道万条不如砍掉四条。”17日，中国政法大学的大字报更加明确地说：“现在的任务是要保护活着的改革派，保护赵紫阳。”至22日前，首都高校的大字报已有了上千份。

这些大字报的内容也在天安门广场上散播着。香港《九十年代》月刊登出一位港人的目击日记说，4月18日晚，他在天安门广场听大学生们演讲，一学生说：“中国只有一党专制，就是官僚。打倒共产党一党专制！”众人大笑，有喊“不现实”的，有鼓掌的，还有起哄的。

一些文化“精英”们也积极地做着舆论准备。15日，《世界经济导报》与《新观察》杂志主编戈扬以及苏绍智等人联系，准备召开座谈会。在19日的座谈会上，严家其、戴晴等人提出要为胡耀邦同志平反、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暗示要“倒邓保赵”。《世界经济导报》总编钦本立决定将刊有这个座谈会内容的报纸提前印刷，赶在22日之前发往北京，以“影响学运”。

21日这天，严家其、包遵信等人给中央、人大常委会的请愿书不失时机地出现在各重点大学的校园，其内容与王丹等18日所呈请愿书如出一辙。在请愿书的旁边，已贴上了所谓“澄清4·20血案真相”的大小字报及“到天安门去参加追悼会”的通知。

一股狂躁的情绪就这样在大学生中点燃起来了。21日下午，北大清华甚至传出了“耀邦是被最高统帅警卫打死的”谣言，有的学生竟商议要“截灵车”。晚上，北师大则一片混乱，外校学生撞开了校门，上万人出出进进要开什么“誓师会”。吾尔开希拿着电喇叭在操场上煽动大家“讨还4·20血债。”还有人用自行车驮着一大

袋白灰进到人群中分发，被一些高年级学生制止了。

山雨未来风满楼。借胡耀邦同志的追悼会大闹一场的风波似弦上之箭，一触即发。海外的一些新闻媒介也已按捺不住发出了信息。21日这天，台湾《中央日报》印出了大标题：“大陆势将爆发更大动乱”；香港《东方日报》刊出醒目标题：“明天悼胡纪念会，学生可能冲会场。”美国《华盛顿邮报》则干脆引用北京某大学生的话：“悼念胡耀邦只是示威者的借口。”

二

22日凌晨，数万大学生进入天安门广场后便席地而坐或倒头大睡，还有的在纪念碑附近的草坪上嬉戏谈笑着。大多数学校推出的学生代表也都不清楚天亮之后干什么好。

午夜2点多钟，在临时召开的20多所高校代表会议上，郭海峰提出，首先要搞和平请愿。在追悼会前，要求政治局常委甚至邓小平接见，进行谈判。如果不行，就冲人大大会堂。各校学生代表一听，马上都表示不同意。在人家办丧事时去闯灵堂闹事，太不得人心；再说，学生们谁也没有思想准备搞什么“谈判”，大家是来开追悼会的。经过这样一番争议，大约6时左右，代表们才决定向治丧办提出3条要求：绝对保证学生安全，瞻仰胡耀邦遗容，灵车绕广场一周。

7时15分，治丧办的同志转告熊焱、熊炜等5名学生代表：只要学生队伍不乱，将保证学生安全；临时安排那么多人进大会堂瞻仰遗容不可能；灵车能否从广场过正在商议中。对此，熊炜等人表示理解。但他们很快又提出3条新要求：澄清“新华门血案”，增加教育经费，新闻要说真话。治丧办的同志又很快答复他们：第一条现在无法答复详细情节；第二条与今天治丧活动无关，第三条已向

有关部门反映。几名学生代表听后便不再提什么。

但是，自称“有后台”的吾尔开希等人却打定主意要大闹一场。吾尔开希进广场后对记者说：“我们是来斗争的，有权选择多种多样的斗争方式。如在开追悼会的时候高喊口号。如果不答应我们的条件，我们就有可能这么做。其次，我们也许会使政府官员难堪。”吾尔开希一再说：“我们现在不动，但不是永远不动”。“如果条件不被落实，我们回去就要行动。”

实际上，一些人一进广场就行动起来了。他们有意识地在大会堂前的马路上鼓噪着。凌晨3时30分，当一队执勤的警卫来到这里时，这些人立即上前围挤、推搡、谩骂。“打倒暴政”、“当兵的滚蛋”等口号也响了起来。为了不发生冲突，这队警卫战士撤了回去。4时30分，身着警服的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一位负责同志来到人大会堂东侧路，准备疏导交通时，马上又被围攻踢打。

天亮前，大学生的队伍已拥到大会堂前的马路上，广场上聚满了人，根本无法清场。8时整，执行警戒任务的警卫人员只能准备在大会堂前的停车场边站岗警戒。一些学生即刻站起来，有组织地一排排地向尚未列出警戒线的警卫们冲击。在现场的香港《百姓》月刊记者写道：“社科院新闻系标语，‘新闻要说真话’往前涌进。传闻风起，背景是嗚嗚的叫声，人们的精神快要疯了。”

为了避免冲突，警卫战士们克制地站在了大会堂东门外，学生们的队伍离他们只有数米远。极少数人期望的、眼看就要发生的流血事件被控制住了。

追悼会期间，广场播放现场实况。放哀乐瞻仰遗容后，广场上的许多学生和群众便向北跑去，准备看灵车。已经出来了十几个小时的大学生们大都觉得该结束了，部分学生已经准备要走了。

三

广场上的大学生们并不知道，极少数人在搅乱追悼会不成后，还有着第二手计划。在21日这天，王丹、郭海峰、封从德、熊焱等“北大团结学生筹委会”的核心成员秘密召开了会议，决定由封从德把18日已递交过的请愿书重抄一遍，“利用这个许多学生都在场的机会，在追悼会后进行请愿。”

这个一直只有几个人知道的阴谋是在李鹏总理等领导同志的车队已离开大会堂的西门后才突然公开的。大约10时50分，广场西部猛然响起了“对话！对话！”的叫声，继而又喊起了：“李鹏出来”、“李鹏对话”等口号。吾尔开希、郭海峰等人则站到了离大会堂最近的学生队伍前面。

随着喊声越来越大，封从德从北大队伍里将一大卷纸传给郭海峰，示意他：“交给李鹏。”11点20分左右，郭海峰双手举起请愿书，向人群示意着，吾尔开希拿着电喇叭在他身边喊叫着，与另外两名大学生一起向人大大会堂走去。

在大会堂台阶下，郭海峰对闻讯赶来的治丧办的同志说：“我们要交请愿书。”吾尔开希接着说：“我们要交给李鹏，非面交不可。”治丧办的同志提出让他们派代表进入大会堂，吾尔开希拒不同意，他坚持道：“李鹏出来是第一要求，除此之外，放弃一切要求。”并下了通牒：“12点45分是最后期限。”

12点整，一位负责同志匆匆从大会堂出来，问治丧办的同志：“能不能让学生让开通道，灵车绕广场一周？”治丧办的同志又反复劝说吾尔开希等4人：“你们既然是来开追悼会的，就应先送耀邦英灵。”但他们就是一句话：“让李鹏出来。”

此时的天安门广场和周围的道路上已挤满了人，学生队伍还

在不断往大会堂涌。赵紫阳同志曾登上大会堂顶，用望远镜看了看这一情景，但没做任何指示，便驱车离去，准备打高尔夫球去了。

与吾尔开希、郭海峰等人接触的治丧办和人大会场的工作人员谁也没说过李鹏同志要来广场，但吾尔开希却用喇叭向广场的学生们宣布：“（人民大会堂）里边传出话来，李鹏 12 点出来与我们见面对话，请大家耐心等待。”这个弥天大谎迅速传遍广场，有些感到意外的大学生们议论起来：“李鹏来了我们鼓不鼓掌？”有的挺纳闷：“为什么要李鹏出来？除了增加教育经费外，请愿的内容都不归国务院管呀。”有的还不明白：“请愿书不是已经递给人大常委会了吗？办丧事时提条件搞请愿，合适吗？”

12时45分，吾尔开希一下子冲上大会堂台阶，举着电喇叭高声叫道：“我抗议！”郭海峰等三人也走上台阶，忽然跪了下来。郭海峰高高举着请愿书，放声大哭，边哭边喊：“李鹏，你为什么不出来！”吾尔开希则鼓动道：“李鹏欺骗了我们！”

尽管有些头脑清醒的大学生、研究生已感到事先无任何招呼，即要求李鹏在不可能出来的时候，不可能交谈对话的地点，接受本不属于他职责范畴，并已经递交过的请愿书是很荒谬的，更不赞成其下跪的方式，但是，他们已无法表达自己的疑问了。整个广场哭声一片，群情激愤的大学生们向大会堂冲过来。一个女学生喊着：“打死我吧。”拼命向警察撞去。

郭海峰等人跪了十几分钟后方坐了下来，学生们的对立情绪已达到顶点。回到广场的吾尔开希即和一些学校的代表开了个小会，不到 2 点，学生队伍开始撤离广场，向新华门方向游行，并喊出了统一的口号：“和平请愿，政府不理。通电全国，统一罢课。”

四

22日这天，令人奇怪的事还发生了一些。下午，参加追悼会的大学生刚刚回校，北师大的传单就撒到了他们手中。传单写道：“12:30，师大的代表告诉同学，李鹏将于12:45接见学生。下午2:00，李鹏还未出来。学生们愤怒地向前涌去，武警冲上去用皮带等殴打学生……”

这天上午11时，严家其、苏晓康等人“要求政府对话”、“绝不允许对学生施暴”的请愿书贴在了北师大等高校的墙上。

方励之在当天对外国记者发表了谈话，他得意地说道：“中共若不与学生坦诚对话，那么形势发展就不乐观。”王丹也高兴地告诉外国记者：“相信行动已发挥了一定的影响。”

这一天，由台湾豢养的反动组织“中国民联”成员胡平、陈军、刘晓波等联名从美国纽约发出了《致中国大学生公开信》，要求“巩固在这次活动中建立起来的组织联系。”

《新观察》杂志则明目张胆地歪曲事实。先是造谣北京市公安局“戒严”，然后称赞学生强占天安门广场，使“追悼会的主会场在大会堂外。中午，3名大学生‘扑通’跪倒在大会堂台阶上，要求向国家领导人面交请愿书。国家领导人工作繁忙，没有时间接见十数万大学生代表。”并煽动道：“他们往地下一跪，就把官僚主义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在这样一个政治气氛下，北京6万大学生罢课了。一些人开始南下北上，东来西走，串联募捐。外地许多大学生也相继效仿。

同一天，西安和长沙发生了严重的打、砸、抢事件。

王丹早在4月16日就说，大字报的“锋芒所指开始转向”，“如果发展下去，有可能与‘五四’相联”。“不少人寄希望于我引导方

向。”从4月16日至4月22日这一个星期，他和他的同伙以及背后的极少数人紧锣密鼓，到4月22日这一天又精心策划了这样一个大骗局，目的就在于把更多不明真相的大学生进一步“引导”向动乱的泥潭。

（原载1989年9月6日《北京日报》）

上海动乱真相

施 岩

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在首都北京的学潮、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报纸上已作了详尽的介绍，其真相已大白于天下，而同一时期，发生在上海的严重的学潮、动乱和局部骚乱，还没有作过系统的披露，人们还不太了解它的来龙去脉。这里，我们以写实的手法，记录了上海动乱的前前后后，意在帮助人们了解上海这场动乱发生、发展的全过程，以进一步认清这场动乱的性质、根源和危害，从中引出有益的经验教训来。

这场动乱是早有预谋的

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这场风波是在国际大气候的影响下，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长期泛滥的结果。由于赵紫阳同志的纵容和支持，近年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愈演愈烈，一些人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到处鼓吹经济私有化、政治多元化、文化西方化。去年九月，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针对过去几年经济工作中出现的某些严重失误，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一些热衷于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尤其是赵紫阳身边的一些智囊人物，凭借他们敏锐的嗅觉，预感形势不妙，便利用国内外、境内外的传播工具，竭力反对治理整顿方针，透露出“倒邓保赵”的政治信息，为这次动乱作了一系列思想、舆论和组织

准备。与赵紫阳的智囊团关系极为密切的《世界经济导报》，在十三届三中全会以后，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散布治理整顿必然导致经济“停滞”、改革“逆转”，并攻击李鹏同志在七届二次人代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耸人听闻地提出所谓要防止改革“走回头路”，把治理、整顿与改革开放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港台一些报纸也别有用心地称改革已走上绝路。今年年初，《世界经济导报》又异乎寻常地全文转载了北京《经济学周报》发表的严家其与温元凯《关于时局的对话》。严家其在这篇《对话》中毫无掩饰地说：“我觉得应当直截了当地把对中国前途的这种担忧说出来”，“就是不能重蹈赫鲁晓夫、刘少奇那样非程序权力更迭的覆辙”，并说“这种苗头许多人已经感到了”。这篇重头文章显然是为了掩盖赵紫阳的错误，保住他的权力地位，以便可以肆无忌惮地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这期间，上海与北京的所谓“精英”人物频繁往返，南北奔走，又是召开研讨会，又是发表文章，明里暗里进行了大量极不正常的活动。

象1986年底、1987年初一样，极少数人把挑动动乱的主要目标放在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青年学生身上。今年年初以来，他们利用高校这块阵地，打着“理论研究”、“学术探讨”的幌子，散布了一系列明目张胆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观点。一些人在上海高校内偷偷地张贴“海报”，蛊惑人心地说什么“危机！危机！危机！信仰危机！体制危机！前途危机！历史责任感逼迫我们大学生站在时代之前”，公开号召要“搞组织”、“结成社团”，“共研现时社会”。一些人以诗歌、话剧、小说、大字报等形式，“纪念八六年学潮”，煽动“走上街头，为民主、自由、人权而呐喊”。一些人则暗中串连，别有用心地在学生中传说“北京五四要上街”、“上海今年肯定要动”，“要用血来纪念五四”、“要大干一场”。当时上海高校有人曾洋洋得意地说：“现在全国好比一堆干柴，只要方励之等人出来领头，这堆

干柴一点就燃。”

动乱的征兆果然在境内外的相互策应、紧密配合下悄悄地引发起来了。今年1月，海外和国外一些组织不断鼓噪要求“中国政府释放魏京生等一切政治犯”。“中国民联”成员陈军（复旦大学82级毕业生）与方励之、苏绍智、严家其、包遵信、张显扬、李洪林等人密谋把所谓要求释放政治犯的“签名运动”引向上海。王若望闻风响应，声称“上海不能沉默，要奋起直追！”并伙同一批臭味相投者，企图在上海发起签名运动，“南北呼应”，向政府施加压力。王若望还亲自修改了征集签名稿，圈定了30多位知名人士的名单，研究了“先易后难、先分后合”的策略。并派人上门征集签名，准备发往香港登报。

“中国民联”也把黑手伸向上海。这个以“取消四个坚持，释放一切被捕的持不同政见者”为近期目标，并将“推进中国大陆民主运动”作为“现阶段的工作重点”的反动组织，把上海作为他们今年工作的主要目标，早在年初就派遣汤光中等三人从美国潜入上海，携带胡平、王炳章等人给杨巍的亲笔信、祝贺卡，准备在杨巍刑满释放时去监狱门口迎接，以此扩大中国民联影响，实现其所谓“政治登陆”。后被我公安机关及时发现，使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

今年3月，上海不少高校陆续收到大量来自境外的“心战品”，有的攻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提出“要迫使邓小平第四次不光荣地下台”；有的煽动大学生在五四期间搞全国性统一行动；“要以鲜血来纪念五四”。

鉴于上述种种迹象，上海高教系统很多同志预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并采取了一系列预防的措施。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就在胡耀邦同志逝世前两天，上海有一所高校的学生会收到署名“广西大学学生会”的《告全国大学生书》，鼓吹“没有小乱，就会出现文革那样的大乱；没有短乱，就会出现十年长乱。乱一点并没有

什么可怕”，还蛊惑人心地提出：“全国大学生们，‘五四’即将来临，届时让我们高举胡耀邦的画像和民主、自由、尊严、法制的大旗”。出人意料的是，胡耀邦同志恰在这个时候突然病逝，极少数人认为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们打着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旗号迫不及待地借题发挥，煽动学潮，制造动乱。因此，这场动乱在这个时候发生表面看来似乎是偶然的，其实是蓄之既久，早有预谋的。

学潮一开始就被极少数人 所操纵和利用

上海的这场学潮和动乱，大致可分四个阶段：从4月15日—4月26日，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借悼念胡耀邦同志逝世为名，掀起一股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平反的浪头；从4月26日—5月20日，学潮由学校向社会扩散，出现以“声援北京高自联”，“声援《导报》”，反对4·26社论，要求承认非法组织，要求所谓“新闻自由”为主要内容的大规模的游行、静坐、绝食、请愿；从5月20日—6月4日，国务院发布戒严令后，继续出现矛头直指中央领导同志、明目张胆地反对戒严的连续不断的大规模游行，继而发动“空校罢课”；从6月4日—6月8日，在“高自联”策划下，几千学生和一批社会渣滓沆瀣一气，上街破坏车辆、堵塞交通，造成全市交通瘫痪。

这场学潮从一开始就被极少数人所操纵和利用。首先表现在学潮初期的大小字报、标语口号就具有鲜明的政治目的和动乱性质。其中一类是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4月15日，在胡耀邦同志逝世的当夜，华东政法学院就有人贴出一条标语：“耀邦你死得太惨了，中国太惨了。”4月18日，复旦大学贴出一张题为《警世钟》的大字报，公然喊出：“本死不死，除奸更待何时”；“让上帝把完成历史使命的人收留去吧，别只召去了耀邦”。4月18日张贴于华东

师大内的一张大字报煽动说：“民主必须化，自由必须大，政府可以骂。”另一类是煽动学生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平反。如“追查胡耀邦辞职、去世真相”；“重新评价耀邦”；“重新评价1986年的学潮，为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恢复名誉，还我方、刘、王！”等等。还有一类是反对治理、整顿方针，煽动“倒邓保赵”的。4月22日，张贴在复旦大学的一张大字报，称李鹏同志今年3月在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是向改革派发出猛烈反击的檄文”，还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中央领导同志称为“保守派”，而把消极对待四项基本原则，怂恿支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赵紫阳同志封为“改革派”，把四个坚持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对立歪曲为保守派与改革派的斗争。4月19日张贴于华东化工学院的一张题为“我们行动的檄文”的大字报说：“改革正处在危难之中，我们可以想象一旦保守派全面掌权，中国将导致何种局面”；“我们应该拿出实际行动支援改革派，象莫斯科市民支持叶利钦那样支持我们的改革家。”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个时候，《世界经济导报》抢在4月23日提前出版了第439期，单刀直入地提出了这次动乱的两条政治纲领：一是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功过，彻底否定1987年初中央对胡耀邦同志辞职的处理；二是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在反对自由化中所谓“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昭雪。《导报》提出这两个动乱的政治纲领，其目的正如钦本立自己所说的那样“就是要邓小平检讨”。这期报纸理所当然地受到中共上海市委的严肃批评，并责令它停止发行。在这以后，《导报》某些人就不断出入于上海各主要高校，利用学潮制造动乱。许多高校的大小字报也都紧紧围绕这两个政治纲领大做文章。

学潮从一开始就被极少数人所操纵和利用，还突出地表现在学生以及某些非法学生组织的背后，都有那么一些出谋划策的“智

囊”，他们活跃于幕前幕后，诱引大批无知的学生，从成立非法组织、进行秘密集会、采取恐怖行动，直到大规模破坏交通、制造骚乱，一步步登上动乱的战车。

复旦大学有一个以“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教师叶茂强为首的七名教师组成的“智囊团”。他们公然对复旦各派学生组织宣布：“智囊团是最高决策机构，决定的事一定要执行”。在这次动乱中，复旦大学学生搞静坐、闹绝食、堵交通、设路障等活动，几乎都有这个“智囊团”在参与策划指挥。甚至复旦“自治会”和上海“高自联”在后期炮制的各种宣传品，不少也是他们起草或修改定稿的。5月26日，叶茂强还跑到上海“高自联”秘密召开的21所高校代表会议上，为学生头头们分析形势，指点下一步“行动方向”。他说，昨天下午，我们理论界开了一次会，认为：“一是万一上面采取高压政策，学生要进行自我保护，‘高自联’和各校‘自治会’的财产应隐蔽起来，以备后用；二是要准备打持久战，不仅要进行游行、示威、绝食、静坐，还要深入群众”，“要把启蒙运动的种子埋下去，让他生根发芽”，并声称“这就是我们对形势的总体指导”。

华东师大经济系副主任陈琦伟，在这次动乱中，一方面为学生出谋划策，充当“导师”，一方面多次向学生发表反政府演讲，公开煽动学生“打倒政府”，他说：“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使李鹏戒严，现在，这个目标已经达到了；第二个目标，我们是要把与全世界人民为敌的李鹏官僚独裁政府拉下台”。他还“指点”学生说：“我们不应提打倒官倒的口号，因为官倒不是一种现象，它是一种体制，这种体制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一个人发疯，全国跟着遭殃”；“这个政体造成当前经济困难、社会危机、信仰危机”。他的这些煽动性演讲被印成传单，广为散发，毒害了很多青年学生。

《世界经济导报》国内经济部主任陈乐波，也是上海动乱中直接操纵和利用学生的“智囊”人物。北京部分地区戒严后，他“建

议”上海“高自联”和“中自联”(中等学校自治联合会)的学生代表“聚会研究下一步行动方向”。他向学生提出了三条“行动纲领”：(1)争取公民的基本权利。这次取得了游行权，我们还应有其它的权。(2)争取高校学生自治会合法化。我们的做法是一个一个把阵地夺下来，报社，工会，党支部，民主党派，夺一个是一个，能改造一个就是一个。(3)要抓住一切机会，进行新的启蒙。这次学潮是一次耕耘，我们应该多撒下一些民主权力的种子，还要有点剧烈的行动，让后人有所收获。

与此同时，国外和港澳地区的敌对势力也有许多专线同上海“高自联”保持联络。“中国民联”频频插手上海的学潮。“民联”成员徐邦泰(原复旦大学学生)鼓动学生“建立独立的学生会”。“中国民联”总部还指派杨巍与上海“高自联”头头接触，对学潮予以“政策指导”。“中国民联”成员陈军，为了随时“与国内关系互通信息”，专门在其美国家中设立了一个指挥中心和专用电话，由陈军24小时值班，对上海的学潮、动乱遥控指挥。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动乱中，更是频频向上海投寄各种煽动性的“心战品”，指挥上海潜伏特务“把握现状，参加学运，汇报成果”，并伺机发展组织。总之，各种敌对势力和社会不满分子都千方百计伸手操纵和利用学生，策划和加剧动乱，这已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动乱自始至终呈现 “南北呼应”的特点

这次动乱的中心和主战场在北京，上海是与之遥相呼应的分战场。京沪两地极少数动乱的策划者、组织者、指挥者通过北京“三所一会”(即赵紫阳的“智囊团”)、《世界经济导报》驻北京办事处以及两地“高自联”组织和学生南下北上的频繁串连等多种渠

道，策动上海“与北京联合行动”。在整个学潮和动乱过程中，“北京刮什么风，上海就下什么雨”。

学潮初期，北京高校出现许多“打倒官僚政府”、“打倒独裁统治”等颠覆性口号，上海高校也如法炮制，亦步亦趋。各校贴出的大字报有的咒骂我们的政府“是最腐朽的政府”，咒骂我们的党“是集权的党，是欺诈人民、靠不住的党”；有的要“打倒封建专制！打倒独夫民贼！”“推翻共产党，解散政府，改组政府”。《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发表后，在方励之等人授意下，北京“高自联”立即发出改变策略的“新学联一号令”，把“打倒官僚政府”、“打倒腐败政府”、“打倒独裁统治”等颠覆性口号改成为“反官僚、反腐败、反特权”。上海在同一时间，也以“上海高校学生联合会”名义，在复旦大学贴出一张“通告”，统一规定游行时多提物价、官倒，“绝对不提打倒官僚政府之类的口号”。

当这次“学潮”和动乱“风起于青萍之末”时，由于上海市委、市政府于4月17日就旗帜鲜明地发出“通告”，提出“要严防坏人借题发挥，挑起事端，进行破坏活动”；又由于全市50多所高校的干部、教师以及社会力量，全力以赴地做好稳定工作，赢得了时间，争得了主动。在5月4日以前，全市51所高校、13万大学生中，仅三所高校、四五百人上街，教学秩序基本正常。但是，5月4日以后，风云突变，赵紫阳同志在亚行年会上的讲话，使形势急剧恶化。“学潮”和动乱以来，坚持上课的大多数学生和积极向学生做工作的大多数干部、教师感到泄气。如5月4日以前局面一直比较平静的交通大学，许多学生在收听了亚行讲话的当夜就议论纷纷：既然上街游行是“爱国运动”，那我们不上街的是否就不爱国了？而那些搞动乱的人则从中看到了中央有人公开支持他们，摸到了气候，从而更加有恃无恐、肆无忌惮，使动乱以更大的规模、更为嚣张的气焰越演越烈。

这一时期，上海的学潮出现了两大特点，一是紧跟北京、声援北京，二是学生与《导报》互相声援，共壮声势。市“高自联”的头头们在5月10日下午策划组建上海高校学生“赴京请愿团”，并为此于11日在复旦大学召开记者招待会，声称请愿团主要任务是“质问国务院：《世界经济导报》错在哪里，什么叫总编负责制等等”。行前，同济大学的“高自联”头头打电话给“北大自治会”，要求派人迎接。请愿团到达北京后，立即同“北高联”头头王有才等接上了头。为了加强同“北高联”的联系，上海“高自联”向北京派出了联络员，每天把北京的情况传到上海，把上海的情况传到北京。从那以后，北大“三角地”广场就经常可以看到上海学生行动的海报。

5月15日，上海学生从赴京请愿的代表那里获悉北京学生于13日开始静坐绝食，立即采取了两项“策应”行动：一是请愿团派其中5个人立即参加天安门广场的绝食，余下的人继续去北京各高校联络、演讲、递交请愿书。二是复旦、华师大、同济等校马上贴出倡议书，号召上海学生也进行绝食行动。赴京请愿学生还打电话给同济“学生自治会”头头，通报戈尔巴乔夫访沪的日程，要上海学生届时“有所动作”。5月16日下午，复旦、同济、上海工大等高校的数千名学生、研究生以及青年教师上街游行，声援北京学生的绝食请愿。当晚，成立了“上海高校绝食团”，50余名学生在市政府门前宣布绝食。5月17、18、19日连续3天，参加绝食的学生最多时达300多人。

与此同时，上海高校又陆续有大批学生到北京去申连并参加天安门广场绝食。仅上海工大，这一时期进京申连学生就达102人。5月19日下午，上海高校有人在与北京“高自联”头目王有才电话联系中，获悉当天晚上李鹏要发表讲话，北京要实行戒严，“消息来自上面，绝对可靠”后，立即随着北京“高自联”这根指挥棒，开始作绝食“降温”的准备。中央召开的党政军干部大会，使上海“高自

联”极少数人感到靠绝食来加剧动乱的阴谋已彻底破产，于是一面通知绝食学生撤回，一面采取了一系列更为激烈的对抗行动，在上海掀起了一股反对北京戒严和妄图推翻合法政府的反动浪潮，促使动乱进一步升级。

一是连续不断地组织大规模示威活动。5月21、22日，上海高校的少数人连续在复兴公园聚会，密谋近期“要不断地、持续地交叉游行”，即组织各校轮流上街，学生也分批上街，保持声势，保存实力；提出“近期目标，要李鹏下台，远期目标，实行多党执政”；并决定正式成立“上海高校自治联合会”。

5月23日，华师大“学生自治会”头头在该校共青广场的千人集会上说：“北京的学生现在心力不济，我们上海学生要多分担一些，要把学运的重点转移到上海来。”就在这时，“北高联南下宣传团”、“特别行动队”等纷纷窜到上海。“南下宣传团”头头赵文利（女，西北政治学院法律系88级学生）于5月24日持“北高联”常委柴玲签发的联系证明信，携带北京各高校印刷的大量传单、照片、演讲稿等宣传材料，与其他10多人潜来上海，先后与上海“高自联”常委张才（即姚勇战，复旦大学学生）等有接触，并在张才等人安排下，先后在上海工大、铁道学院、复旦、交大作了多次煽动性演讲，谩骂中央领导同志，说“‘李鹏不下台，我们天天来’，希望上海的学生坚持到底，复课无疑是对北京同学最大的背叛！”，此后，这种说法便成为上海学生的“统一口号”，并连续组织了长达9天的游行示威。

二是配合北京极少数人策划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妄图“废除戒严令，罢免李鹏总理职务”的阴谋，由复旦、华师大、同济、交大四所高校的“自治会”头头决定，5月25日下午在人民广场召开了所谓声讨大会。会议策划者供认，召开这次大会，是“要趁万里在上海之际，让万里知道上海学生不满，要求尽快召开全国人

大和中央紧急会议，罢免李鹏，为学生运动正名、定性”。当天晚上，交通大学“自治会”召开有 2500 人参加的大会，上海教育学院的一个教师（原非法组织成员）作了题为《万里回国后的形势和对策》的演讲，煽动学生“要围绕人大的召开，进行呼吁，形成广泛的政治力量”；“这次人大应有市民和学生等各阶层代表参加，这是他们应该争得的权利”；“学生要向人大常委作思想工作，让常委会了解学生运动真相”等等。同一时间，复旦有人向全国 29 个省、市、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写信，鼓动各地“人大代表马上进京”，迫使“改组政府”。

三是配合北京极少数人阻拦戒严部队进城的阴谋活动，在上海堵塞交通、破坏经济。上海动乱的制造者们在北京部分地区戒严后多次秘密召开会议，商定“万一上海军管就上街堵交通，造成事实上的罢工”；并按“以就近学校为主”上街堵路的原则作了分工。在此期间，他们还派出大量人员，先后到铁路、码头、机场和驻军营房附近打听消息，察看有没有军队调动迹象。5 月 22 日凌晨，华师大“自治会”头头以“今晨 5 时部队将进入上海实行军管”为由，紧急集合六七千名学生，于清晨 4 时分别占领了苏州河上的 5 个桥头，使市区 5 条南北主要干道被堵塞两个多小时。5 月 24 日凌晨 4 时，复旦大学 1500 名学生也前往五角场地区的四平路、邯郸路、翔殷路、黄兴路、淞沪路等路段，以静坐方式堵塞交通，前后长达 4 个多小时。与此同时，“高自联”还组织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分头到全市各主要工厂企业进行煽动性宣传，企图挑动工人举行罢工。但全市各企业的干部、职工，坚定地响应市委、市府关于“稳定大局，稳定上海，坚持生产，保障生活”的号召，对这些煽动和挑唆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使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

四是组织“空校罢课”，对抗李鹏同志提出的“无条件复课”的要求。由于上海各高校坚决贯彻中央党政军干部大会的精神，对学生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各校大多数学生陆续返校

上课，少数人感到形势对他们不利。5月28日下午，上海“高自联”按照天安门学生游行指挥部的指令，又挑动数万名学生配合所谓“全球华人大游行”，在人民广场举行大规模集会和游行。北京“南下宣传队”成员在集会上分头发表演讲。上海“高自联”头头在会上宣布：上海高校学生从现在起“空校回家”，造成“事实上的罢课”。5月29日，“高自联”向全市51所高校发出“空校公告”，鼓吹“空校是最彻底的罢课”，“是对李鹏所说的‘无条件复课’的最强烈抗议和无声的否定”，“是爱国民主运动的一个精彩插曲”；空校“将发扬播种机的作用，扩大这次民主运动的影响”。

短短几天内，市“高自联”发起的“空校罢课”活动迅即波及到大部分高校，给已经基本恢复正常教学秩序的海上高校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和干扰。不少高校除毕业班外，其它年级的学生成群结队，匆匆离校。“高自联”的极少数人并不因此罢休，他们策划撕毁各校张贴的恢复和维护正常教学秩序的通告；抢夺校广播台或私设广播台；冲印刷厂，强行印刷传播反革命谣言的传单；冲变电所，威胁学校安全；殴打公安保卫人员，抢劫报话设备；一些学生还到教工家属区哄闹，千方百计鼓动教师“罢教”；对一些立场坚定、态度鲜明的高校领导进行围攻、谩骂，甚至到领导干部宿舍进行威胁，扬言要抄领导同志的家。一些不愿“空校罢课”的学生被谩骂，不让进教室，甚至把他们的衣被用具扔出宿舍；他们还冲击考场，破坏正常教学秩序。他们这样做，实质上是把一代青年的命运和广大同学的自身前途推到了危险的境地。

各种人物纷纷介入动乱 迅速向全社会扩散

上海的这场动乱源于学潮，很快演变成为动乱，同社会上各种

人物的纷纷介入是分不开的。上海作为旧中国的“十里洋场”，作为“四人帮”的老窝，那些“静观待变”、唯恐天下不乱的人，那些长期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而又搞政治阴谋的人，他们从学潮一开始就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转机，是可以改变当前情况的转机”，而迫不及待地介入进来。以4月23日《世界经济导报》的介入为标志，动乱便迅速向全社会扩散，演变成为一场社会动乱。

《世界经济导报》是上海这场社会动乱的“策源地”。他们声称“在学潮中，导报应作为运动的主角身份发挥作用，要将自己的旗帜打出来，研究怎么改变中国的制度”。为此，他们一方面利用439期导报事件，多次召开所谓“新闻发布会”，煽动学生和新闻界声援导报，以“保持长期的压力、推进的势头”；一方面利用该报驻京办事处，随时把北京动乱情况传回上海，如本阶段北京动乱者的目标是什么，有些什么主要动向，严家其、方励之等发表了什么意见，中央领导对动乱以及对《导报》的看法有什么不同等。然后，《导报》的一些人就通过翻印散发有关材料、到高校去演讲、与动乱的组织者个别串连等方式，把有关消息迅速传播开来。《导报》卷入上海这场社会动乱的程度，从复旦大学非法学生组织头头写信“感谢《导报》老师的“宝贵指导”和上海“高自联”的“最新消息找《导报》，理论指导找《导报》”的自白中可见一斑。

上海理论、新闻、出版、文化、教育等战线，有那么极少数人长期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同国外的政治势力有着密切的联系，同北京参与策划、组织、指挥暴乱的幕前幕后人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在这次动乱中也上窜下跳，极为活跃。

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面人物王若望，在这次上海动乱中，几次三番上街游行，多次接受境外记者采访，还频频向境外报刊投寄支持动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学潮初期，他得意洋洋地对人

说：“你们看，可有好戏看了，我盼望的一天终于来到了”；“5月份尚未到，在4月份就掀起了这样的浪潮，比八六年的学生运动更成熟了，这次事件肯定是全国性的，肯定会产生出一个新的转机”。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王若望急忙为香港一家杂志撰文，攻击社论是“中共领导层迈向自取灭亡的病危通知书”。5月中旬，北京和上海部分学生绝食，王若望煽动说，“我不仅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老祖宗，而且是绝食的老祖宗，一生绝食四次”。他参加游行时身披条幅，胸前写着“铁石心肠，可悲可叹”，背后写着“救国救民，救救学生”。王若望还说，“有人担心，这一来共产党被打倒了，中国没有干部了，今后怎么办？其实这是多此一举。严家其、方励之等都是政治家，现在又涌现多少象王丹这样年轻有为的接班人，还有赵紫阳这样的人嘛！”他还暗中排列组阁名单，提出“学生运动胜利后，要同知识分子组成集团，召开国家会议，修改宪法，组织联合政府”，真是利令智昏到了极点！

以王若望为代表的极少数长期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还挑动和裹胁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多次走上街头，为学潮和动乱火上添油，推波助澜。一些新闻单位、理论研究部门、群众团体以至个别党政机关的少数人，也打着横幅上街。各种“呼吁书”、“公开信”也频频出台。上海作协也有那么几个人，在王若望的蛊惑和策动下，着手起草《向世界各国笔会的呼吁书》、《给全国作协及人民的通电》，企图用国外舆论向党和政府施加压力。一时间，种种极端反动的观点公开散布，形形色色蛊惑人心的政治谣言广为传播，各式各样践踏民主、破坏法制的无政府主义行为到处蔓延。城市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遭到严重破坏。

在这次动乱中，上海还有几个身居党政机关要职的共产党员，公开同中央对抗。在5月19日中央党政军负责干部大会之后，他们策划起草了所谓上海市的共产党员《致中共中央公开信》，提出

要求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收回李鹏5·19讲话”、“否定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立即解除新闻封锁”，同北京“三所一会”的活动遥相呼应。这份《公开信》复印数百份散发至本市新闻、理论、文化、高校、企业广泛征集签名。它一出笼就受到上海广大共产党员的抵制，指责这种行径是唯恐天下不乱。但策划者们还是急不可待地通过香港报纸发表了消息，并公布了部分签名名单，在海内外造成恶劣的影响。

在这次社会动乱中，上海社科院研究生部的部分博士生、硕士生也是一支极为活跃的队伍，其头头是“高自联”常委之一。这批人几乎参与了上海“高自联”中后期的所有的破坏活动。就在动乱期间，他们还举办了所谓“当前中国政治和思想热点”系列讲座，企图把动乱扩散到更广的范围。从6月4日开始，他们还在淮海中路闹市区社科院门口梧桐树上安上高音喇叭，连续不断地播放“美国之音”等海外电台的反动叫嚣。直到6月10日上午，他们还纠集了四五十人，到康平路市委机关外面游行示威，喊叫一些非常反动、恶毒的口号。

动乱期间，一些“四人帮”残余分子得意忘形。他们私下里议论说：看到“现在这种形势，我们‘造’字头心里不晓得有多高兴！”“这次搞的就是‘文化大革命’。”他们相互庆贺“要改朝换代了”，“出头的日子不会太远了”；还采取各种方式支持和煽动闹事，妄图“出来撑一下局面”。据现在初步掌握的情况，本市“四人帮”残余分子在动乱期间乘机公开活动的就有35名，其中，公然跳出来煽动工潮的就有11名。

上海的一些社会渣滓在动乱中先后拼凑了14个非法组织，后来凑成所谓“上海工人自治联合会”（“工自联”），提出了所谓“组织工人罢工，建立自己的武装，打倒李鹏政府，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组织纲领”，并与上海“高自联”勾结在一起，纠集社会上的一些

乌合之众，游行、演讲、发传单、造谣言，进一步煽动和制造动乱。

北京“平暴”铲除动乱根源 上海人民一举稳定大局

6月3日晚，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党中央、国务院采取果断措施，一举平息反革命暴乱。消息传来，上海动乱的组织者、策划者、指挥者们乱了阵脚，躲的躲，逃的逃，也有的象输光了的赌徒那样孤注一掷，疯狂进行各种破坏，将上海这场动乱推向极端。

他们首先利用平暴初期北京有几天信息不畅的机会，大造反革命舆论，歪曲北京平暴事件的真相，搞乱人们的思想。从6月4日凌晨起，各种传单、小字报充斥街头，特别是通过港报复印件传播所谓“北京镇压真相”。交通大学图书馆的复印设备，竟被一些人用来大量复印歪曲北京平暴真相的香港报纸，并四处散发。《世界经济导报》在社科院门前的阅报栏里也连篇累牍地张贴、复印港台及西方一些新闻机构编造的“血洗天安门”、“军队内部火并”、“38军倒戈”等谣言的报刊及图片。在极少数人策动下，上海高校一些学生组织了所谓的宣传队走上街头，用自制广播台和手提喇叭传送各种谣言。复旦大学“自治会”还组织一批学生到市政府和一些新闻单位门口用高音喇叭放哀乐。有个自称是刚从北京回来的人向围观者歪曲地介绍北京情况，呼吁市民进行“三罢”，呼吁其他国家立即与中国断交，撤回驻华大使，进行经济制裁；并叫喊“党员要退党，团员要退团”，“军人家属要挂白色挽联进行抗议”等等。同济等高校甚至在马路上拉出广播喇叭公开播送“美国之音”和台湾“自由之声”等电台的反华反共广播。

上海动乱的极少数策划者、组织者和指挥者在绝望中加紧了反革命破坏活动，策动堵塞大小交通，造成事实上的停工、停市，搞

瘫痪经济，搞乱上海。6月4日下午和晚上，“高自联”两次召开紧急会议，决定6月5日凌晨4时统一行动，驱使成批学生在一些社会渣滓配合下，上街拦截车辆，设置路障。据不完全统计，在6月4日至8日的5天内，全市共有234个马路道口被反复堵塞979次，有六千多辆机动车被强行拦停用作路障，其中有16辆被掀翻、砸毁、烧坏，有1223辆（内公交车1017辆）被戳破轮胎或砸坏。与此同时，他们还在市内许多铁路道口卧轨，拦截火车，破坏铁路运输。光新路等十一个铁路道口被反复占据、堵塞，沪宁、沪杭线铁路运输中断近50个小时，共有281列客货列车无法到发。6月6日晚，在铁路光新路道口还发生了焚烧列车、殴打司机和公安干警的严重骚乱事件。在这次骚乱中，共烧毁了9节列车车厢，殴打170多位民警和铁路职工，直接经济损失达570万元，骇人听闻，影响极坏。

极少数人策划的堵塞全市交通的卑劣行径激起全市人民的强烈不满。他们原先的如意算盘是，经过3天的强制性的停工、停市，加上他们的反动宣传，就可以引发上海工人自觉的罢工、罢市，谁知结果适得其反。上海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在北京平暴真相的教育和感召下，日益坚定地站到了党和政府的一边，对动乱制造者的怨愤越来越强烈。极少数动乱策划者担心再这样搞下去“会激起民愤”，经开会研究，决定改变策略，组织多路小分队冲击工厂，迫使工人罢工。因为他们认为“工人一天罢工的压力，等于学生十天静坐的压力”。从6月7日起，成批学生小分队便来到了江南造船厂、上钢五厂、大中华橡胶厂、宝钢等一批大厂以及上海柴油机厂等“文革”中的“重灾区”煽动工人罢工，遭到这些工厂党政组织和广大工人的坚决抵制。

这段时间里，极少数动乱的策划者、组织者和指挥者，还铤而走险，大搞恐怖活动。他们煽动大学生“制造、购买武器”，同党和

政府进行“武装斗争”。6月5日至6日，在复旦大学、上海科大、华东化工学院分别贴出鼓动恐怖活动的大字报，煽动学生“抛去一切幻想，拿起各种武器同伪政府战斗到底”；“自制各种化学、机械武器，自发组织各种行动小组，破坏官僚豪华汽车，打伤甚至杀掉伪军、伪警和各级高级官员，破坏军方设施”；还扬言“不是敌人踩着我们的尸体前进，就是我们踩着敌人的尸体前进”。复旦、同济、交大、华师大、外贸学院的一些人甚至公然煽动学生自制燃烧瓶、手榴弹，“搞化学武器”、“爆炸加油站、化工厂”，企图制造大乱。在他们的挑唆下，同济一些学生购置了一批水果刀和西瓜刀。一些学生头脑发热，干出了一系列打、砸、抢、烧活动：6月5日，工大部分学生将公交六场一辆抢修车拦住，砸碎玻璃，砸坏发动机，抢走工具，最后将车身掀翻。6月7日，在江湾五角场，一些学生和社会不法分子将一辆公交75路公共汽车放火燃烧。6月10日，复旦、同济约100多名学生还在“高自联”头头张才等人策划下，组织了所谓“英雄敢死队”，到市公安局门口静坐、示威，“抗议”公安局逮捕上海“工自联”成员。

6月初在上海出现的连续几天强烈的动乱，虽然其势汹汹，但毕竟已是强弩之末，起不了多大作用。6月4日、5日，“高自联”还能先后动员3500到7000学生上街，到7日、8日，要动员几百人都已困难。6月9日，“高自联”在人民广场召开的所谓“悼念北京死难同胞追悼会”，事前他们在各校作了七八个小时连续动员，才勉强拼凑到4000人。会后，一群人窜到《解放日报》社门口呼口号、烧报纸，并冲击黄浦区政府，用油漆肆意涂抹区党政机构的招牌，群众称这些人的暴行是最后的蹦跳。

这里还要指出的是，北京平暴以后，上海与北京的极少数动乱的策划者曾经企图搞动乱“中心南移”，在上海成立所谓“全国高自联”，继续负隅顽抗。6月3日，上海“高自联”头头张才曾到北京

找到了北京“高自联”秘书长王有才，密谋“成立全国高校自治联合会”。王有才说：现在“北京‘高自联’一部分人撤了，一部分人失踪了，一部分人躲了，‘北高联’已没有力量搞‘全国高自联’了，还是把‘全国高自联’设在上海。”6月9日，张才返回上海，原来还想大干一番，当他看到形势剧变，发现上海“高自联”也不行了，便想一溜了之，跑到香港去成立所谓“全国高自联”筹委会。6月11日下午，他公然抗拒市政府6月10日发出的关于取缔非法组织上海“高自联”的通告，拒不向公安机关登记，并在某国驻华使、领馆官员的“陪同”下前往虹桥机场，企图逃往香港，被我公安机关当场扣押。6月10日晚上海“高自联”召开常委会，哀叹“鉴于目前时局”，“我们要作好长期斗争的准备”，“不要再作无谓的牺牲”。华师大“学生自治会”当晚贴出题为“别了，师大人”的大字报，宣布即日起“自行解散”。6月11日，复旦、同济、华东化工等高校“自治会”也纷纷以布告或广播形式，自行宣布“解散”。在这以后几天，上海“高自联”的头头或自首，或转移，或逃窜，至此，上海持续近两个月的学潮至动乱才逐渐平息。

在平息上海这场动乱中，工人阶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6月8日，朱镕基市长发表关于“稳定大局、稳定上海”的电视讲话以后，当天晚上，10万工人和上海干部、市民一起走上街头，清理路障，6月9日清晨，被阻断了几天的市内交通一举恢复，浦江两岸重又展现出一派和平劳动的景象。上海的动乱之所以能依靠工人阶级而一举得到平息，其决定性因素是北京果断地平息了反革命暴乱，从根本上铲除了制造全国动乱的策源地，端掉了他们的“老窝”，也给上海极少数制造动乱的分子以极大的威慑。北京暴乱的真相，特别是一小撮暴徒疯狂残害人民子弟兵的惨象，给了全市干部、职工以极大的教育。上海在处理学潮和稳定社会的整个过程中，自始至终得到党中央、国务院及时的指示和支持。没有党中央、

国务院的正确领导，没有北京的果断行动，上海的动乱是平息不了的，要求得上海局势的稳定也是很难想象的。

上海动乱已经平息了。这次动乱留给我们的经验教训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恐怕是“五个不能低估”，即：第一，对上海动乱的严重性决不能低估；第二，对上海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严重程度决不能低估；第三，对上海动乱的社会基础决不能低估；第四，对境内外敌对势力在动乱中对上海的种种渗透破坏决不能低估；第五，对赵紫阳淡化党的领导给上海党组织造成的严重思想混乱决不能低估。我们要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和市委第五届八次全会精神指引下，深入开展清查清理工作，除恶务尽，不留后患；同时要认真地总结过去，开拓未来，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稳定上海、稳定大局、保证我们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而继续努力奋斗。

（原载 1989 年 9 月 21 日《文汇报》）

《导报》导向何方？

冯 兆

《世界经济导报》在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方面由来已久。

《导报》在经济上竭力鼓吹私有化。它借介绍西方国家“私有化浪潮”和“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美化私有制，贬低和否定公有制，并引用所谓“精英”提出的中国出路在于私有制的见解，为私有化提供理论依据。

鼓吹政治上的多元化，是《导报》的又一个重要导向。一个时期来，该报上发表排斥党的领导言论连篇累牍，并打着“言论自由”的旗号，企图摆脱党的领导。

党和政府提出治理整顿任务以后，一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物，利用《导报》的阵地刮起一股反对治理整顿的冷风，他们将改革开放与治理整顿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胡说治理整顿妨碍改革，亮出了他们用资本主义一套来改造中国的“改革”观。

在今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政治风波中，《世界经济导报》兴风作浪，成为从舆论入手制造动乱的一个策源地。人们不禁要问：《世界经济导报》怎么会在这次动乱中陷得那么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导报》导向何方？只要翻阅一下近年来《导报》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和访问记、对话录，以及《导报》领导人介绍经验的一些记载，不难发现《导报》在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方面由来已久，不遗余力。

鼓吹经济私有化意欲 改变社会主义性质

《导报》在经济上竭力鼓吹私有化。翻阅它的版面，赫然在目的标题是《国有制在世界范围走到了尽头》、《私有化浪潮席卷全球》、《国有制往何处去？》、《国有财产个人化：中国经济改革的趋势与选择》等等。从这些标题我们可以看出它明显的倾向性。

《导报》为私有制大造舆论，采用了由远及近的手法。它的报道中称：“私有化浪潮自80年开始，如今席卷全球”。“英国是全球私有化的先锋”，“日本私有化金额居首位”，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纷纷拍卖国有公司财产和出售公司股票。这种宣传力图要人们相信：国有公司没有出路，私营化是当今世界之潮流。

《导报》又借外国人之口，说“亚洲四小龙”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是“向居民提供相当大的个人经济自由，严格实行私有产权制度”。“社会主义最大的问题不知道社会主义是什么，不知道如何给社会主义下定义，公有制优越性不清楚。”两相对比，《导报》的导向也就再清楚不过了。不过，这里掩盖了一个基本事实，即资本主义国家是资产阶级共同管理委员会罢了，它的“国有”转私营，是垄断资本的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的转换而已。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最基本特征。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私营经济对于发展社会生产、方便人民生活、扩大劳动就业，具有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补充作用，因而应鼓励它们在国家允许范围内积极发展。但也要估计到私营经济的盲目性和自私性的一面，应限制它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消极作用。而《导报》发表的文章则认为“私人经济在当前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可以概括为动力、活

力、主力、利己、利国、利民。”随即提出对私人经济应“不受发展比例、范围和规模的限制”。把私有制吹嘘得天花乱坠，似乎是天仙美女，救世良方。

江泽民同志指出：“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和发展领域，要根据我国现实生产力水平和客观需要来确定，不能简单地把它所占比重的大小作为衡量改革成绩的标志。”在一些人看来，似乎私营经济不受限制地大发展，才是改革的巨大进展，这是片面的和极端错误的看法。又有一些人在《导报》上提出：“如果说包产到户是农村第一步改革，那么发展私人经济则应作为中国当务之急的第二步改革”。“在中国广大农村，私人经济应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主力军”。实际上要公有制经济让出广大农村这一地盘，由私营经济来主宰一切。如果真是那样的话，粮食和经济作物的计划安排将全被冲破，国家所必需的原料得不到有效保证，粮食、棉花、油料、水产、蚕丝、药材、茶叶、烟叶等等重要物资一旦控制在私人手里，将出现哄抬物价、奇货可居和对农产品大肆杀价的局面，国家利益和农民利益都将受到严重损害。农村和城市密不可分，私营经济一旦在农村占支配地位，城市公有经济也势必受其掣肘。那就必将从根本上动摇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了。

不仅如此，《导报》还发表公然鼓吹压根儿地主主张实行私营化的文章。他们宣称：“试了各种方案，就是不敢试被全世界上百个国家数千年历史所证明最有效最简单的一个方案——私有制。”还有一个所谓“国有制危机理论研讨会”，居然提出“国有制已到了最后被否认阶段”。“今后的出路是民营化、私营化”。对上述公然否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主张，《导报》竟称之谓“真知灼见”，“令人耳目一新”。

《导报》又借外国学者之口，推崇私有制。比如有一个外国学者建议，把政府掌握的财产，变成各级政府、基金会、社团和个人的

资本，他们之间可以自由转让。换句话说，即把国家的财产化为地方和小团体及其个人所有，这是瓦解公有制之策，《导报》辟出版面，予以介绍兜售。

显然，美化私有制，旨在否定公有制。严家其就在《导报》撰文提出：“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改革所有制，要积极发展私有制。腐败与公有制有关。”《导报》记者张伟国也对公有制大加非议，他认为“公有制腐蚀了整个民族、整个社会、整个干部队伍”。把公有制简直描绘成一种祸害。按严家其等人的逻辑，公有制都得改变为私有制，中国才有出路才有前途，那不是要倒退到旧中国去了吗？

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公有制经济显示了它的生机活力。当然，我们的工作也有失误，但毛病不出在公有制本身，而是具体管理制度上（包括宏观的与微观的运行机制）还存在一些弊端，妨碍着社会主义公有制优越性的进一步发挥。当今的条件下，除了探索社会主义条件下私人经济、个体经济如何健康发展以外，重要的是要研究怎么使公有制经济充满生机活力，尤其是探索如何进一步发挥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活力问题，怎样调整产业结构，怎样完善企业管理，怎样能够真正体现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克服收入分配不公，怎样调动全体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等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进行改革。而我们的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完善公有制，而决不是要去削弱或否定公有制。

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极其令人厌恶的腐败现象，一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物以为这抓到了可以用来中伤公有制的把柄，一时公有制产生腐败的论调泛起。然而，建国几十年来，先前较长时期中，并没有出现“官倒”等腐败现象，可见公有制与腐败并无必然联系。近年来出现腐败现象，有复杂的原因，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正是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一切向钱看”的歪

道被视为正经，利己主义盛行，一些人以权谋私，把权力转化财富。我们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摒弃一切为了个人的拜金主义，乃是防止腐败的重要途径。严家其、张伟国责难公有制出腐败，隐匿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是造成腐败的思想根源，可谓因果颠倒。

《导报》在鼓吹私营化的同时，呼唤中国应有一个“中产阶级”，据云它“活跃在微观层次，无须任何强加，在他追求自身利益的时候，本身就代表了长远利益”。有人构想“实现国有财产个人化，……把本来属于人民的财产从国家占有的形式转变为个人直接占有形式。”实际上，所谓“中产阶级”的理论是西方对社会阶层的一种说法，是模糊阶级关系的一种理论。将这种理论搬到中国来，无非是为了替换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否定工人阶级和工农联盟，为他们的私有化提供阶级基础的理论依据，其后果，只能是召唤一批化公为私的能手，用巧取豪夺的办法吞噬国家公有财产，成为新的资产阶级。亦即企图用劳动人民的血汗去重新培植和养肥一个资产阶级，妄图让中国各族人民再度沦为外国资本和本国剥削阶级的双重奴隶。由此看来，《导报》某些负责人所一再标榜的“坚持改革”，实质上是坚持那种背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

鼓吹政治多元化旨在摆脱党的领导

政治上的“多元化”，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排斥和取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企图在中国建立反对党的代名词，他们不便明说，便用“多元”这个词作遮掩。《导报》借报道国外消息，注入自己的灵魂，诸如《多元的政治：改革成功的道路》、《多党制思想给……社会带来新的活力》、《社会主义要保护反对派的地位》，用标题做文章，可谓典型的借题发挥，人称春秋笔法。“借他人之酒杯，消胸中之垒块”。

一个时期来，在《导报》上发表排斥党的领导的言论连篇累牍，如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以权力多元化为原则”；“改革之成功与否的基本标志在于是否出现了某种制衡的格局和多元的政治”。“经济多元化，是政治多元化的基础，是现代政党的基础”。弦外之音是，既然存在私有经济也就有代表他们利益的政治派别甚至政党，为建立反对党制造舆论。

发表在《导报》上的温元凯等人的《未来十年中国改革的初步设想》中居心险恶地提出：“党理党务，党筹党费，党正党风，党容党派”。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自己去管管党务、收收党费、整整自己的党风吧，你要容纳别的党派呀！这里，根本抹去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党容党派”，这话似乎令人费解，中国不是存在各民主党派吗？“党容党派”岂非无的放矢？显然，温元凯意在言外，即要允许反对党的存在。

《导报》有文章说“政党只是国家范围的一个社团而已，且被国家概念所涵盖，它只是大圈内的一个圈子”。制造这种舆论，意欲把长期来中国革命实践中所确立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降低到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社会团体，而且不许对其他社团进行领导。有的文章就提出：“要改变党和社会团体之间简单的领导和被领导关系，使各种社会团体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政治力量”。换句话说，要排斥党对工会、共青团等等的领导作用。让一个个社会团体“独立”出来，向党闹独立性，实际上妄图使之演变为反对党。尽人皆知，国际上哪一个执政党不是对国家的大计方针的兴革起重要作用，执政党决不是一般的社团。在我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上形成的，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功绩、系统而深刻的理论基础以及积累的经验为其他政治力量所不可比拟的，所以亿万人民发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心声，反映了人民对我们党的信赖。党也曾有过这样那样的失误，这不仅为创建人类崭新的社

会的探索中难以避免，并且党总是主要靠自身的力量起来纠正了错误，拨正了航向。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给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带来了蓬勃的生机和活力，改革开放十年来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然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导报》领导人，对党别具二心，竭力为摆脱党的领导而制造舆论，该报总编辑钦本立对境外报纸发表谈话时就提出“淡化党的领导”，“必须改变党领导一切”的主张。在《导报》上还出现这样的论调：“必须允许政治反对派的存在并且发言”。钦本立的错误言论受到批评时，他仍固执己见地说：“对党不能领导一切，我仍这样看。党难道能领导太阳吗？”激愤之情昭然可见。一个入党多年的老党员，一个多年担任报纸总编辑的老报人，何以若此？除了说明他实在按捺不住久蓄心头力图摆脱党的领导的急切心情和肆意对党进行嘲讽外，还能说明什么呢？

打着“言论自由”的旗号，企图摆脱党的领导是《导报》的重要一招。据称“言论同思维一样，其自由是无条件的。”“什么叫言论自由？肯定方面就是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否定方面就是人说什么不能听命于他人，即人不应该因言获罪”。“当人们郑重其事地为言论自由定规矩划框框时不知是否意识到，这已经违背宪法了”。这个“自由”真是天方夜谭，是世界上从来也没有过的，连标榜“自由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否定的，资产阶级的法律规定，自由是以不损害他人利益为前提。孟德斯鸠说得很清楚，“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在我国，“言论自由”是在整部宪法总纲前提下的自由，要符合四项基本原则，要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离开这总的前提就不符合宪法；不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进行反革命煽动，造谣、诽谤，何尝不是“言论”？法律明确规定对上述行径要治罪，世界各国的许多法律条文都对旨在颠覆国家和诽谤他人的言论列为罪行。所以“言论自由”决不是绝对的和无条

件的。

《导报》的某些人并非不知道这些起码的常识，而是另有所图。今年四月中旬，学潮爆发之际，《导报》邀集一些人研讨修改宪法，有人就提议宪法中要删掉“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语句。有人还撰文提出“代表不同利益阶层和不同思想观点的公民，在议会外对议员进行游说，以自己的主张去影响政府”。《导报》鼓吹“言论自由”目的何在，不是一目了然了吗？

宣扬“整顿倒退论”，对党和 政府施加压力

近年来，我国经济出现了过热现象，党和政府审时度势，提出了治理整顿的任务。这一下触痛了想用资产阶级面貌来改造我国，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物的神经，他们刮起了一股反对治理整顿的冷风。《导报》正是他们的一个舆论阵地。他们首先把改革开放与治理整顿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认为治理整顿妨碍改革。有的文章写道：“紧缩对国民经济起的副作用，超出了国民经济可以承受的限度。”讽喻治理整顿也不可能成功。

《导报》的一篇书简中写道：“我们往往需要纠正操作失误的时刻，连同目标方向一起否定了”。另一则报道中称：“现状促使更多人在深思：是把各种帐都算到改革份上，通过治理整顿办法使其寿终正寝”。“整治正强化旧体制的作用，将带来很多妨碍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负效应。”一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物把治理整顿与“停滞”划等号，而“停滞的损失比失败更严重”。他们叫嚷：整顿有使十年改革成果付诸东流的危险。如此等等，这既是危言耸听，也咄咄逼人，意在向党和政府施加压力。事实上，治理整顿根本没有改变改革方向，而是旨在克服经济过热，力争用三年或者更

多一些时间,从根本上缓解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抑制消费需求膨胀,缓解社会分配不公的矛盾,控制以致逐步消除通货膨胀,使国民经济尽可能得到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治理整顿不仅为深化改革和保证改革健康发展创造条件,而且它本身也需要改革的配合。把治理整顿同改革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是毫无根据的,也是完全错误的。

其实,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物所说的“改革”,和我们主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是截然不同的。当中国经济的治理整顿正在稳步前进并取得初步成效时,他们终于图穷而匕首见,情急意乱地叫喊:“我们(再)也不能犹豫不前,退却比失败更可悲”。《导报》发表严家其与温元凯《关于时局的对话》和温元凯等人《未来十年中国改革的初步设想》,抛出了系统的多党制政治、私有化经济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纲领,为这次动乱作了理论上的准备。这个受到动乱“精英”狂热吹捧为“89宪章”的《未来十年中国改革的初步设想》俨然以收拾时局的姿态,亮出了与我们截然相反的用资本主义一套来改造中国社会的改革观,它宣称“我国社会面临和潜在的危机,已具结构性、普遍性和总体性。任何个人、政党、阶层和集团的意志和直接的利益需求,都不能、也无权取代亿万人民的选择、参与”。“一切借口国情特殊、或排斥曲解现代化的作法,都必将受到历史的惩罚。以世界公认的现代文明准则来审查和规范我国改革的思路和举措,是克服我国历史、地域局限性,真正稳步、持久走在现代历程的唯一正道”。明眼人不难看出这些话后面隐含的一大堆潜台词:一、所谓结构性、普遍性、总体性危机,即是说整个社会制度不行了;二、“任何政党”,意指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不能”“也无权”代表人民;三、“一切借口国情特殊”,针对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四、所谓“曲解现代化”正是我们坚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五、所谓“世界公认的现代文明

看，社会渣滓在 上海动乱中的丑恶表演

甄肖逸 任华文

早在1980年12月，邓小平同志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要求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高度警惕和坚决打击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和刑事犯罪活动。他说，“如果不对这类活动进行打击，不但经济调整很难进行，而且人民的民主权利甚至生存权利，都要遭到危害。”今年4月到6月在全国发生的由学潮发展到动乱，进而在北京发展成为反革命暴乱这一严酷的事实，证明了邓小平同志论断的正确。近几年来，由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力，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势力便不断地积聚力量，终于在去年的春夏之交向党和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的进攻，差一点断送了中国人民经过长期浴血奋斗换来的革命成果。

历史已翻过这沉重的一页。现在，动乱和暴乱已经平息，许多问题已经真相大白，人们正在对过去几个月所经历过的和感受到的许多事情作认真的反思，这无疑是十分必要的。本文将从一个新的角度——社会渣滓在上海动乱中的丑恶表演，向大家介绍一些鲜为人知但又触目惊心的事例。我们相信，“善良的人们”将会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让我们按照“时间顺序表”来详细展现已经过去的一幕幕吧。

社会渣滓打着各种“声援学生”的旗号，成立非法组织，制造和传播政治谣言，发表反动演讲，散发反动传单，呼喊反动

口号，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对政府不满，狂叫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5月18日，在“声援”学生的一片喧嚣声中，人民广场率先亮出了“上海工人联合声援团”的旗号。这个组织的名称是一个因经常出没街头巷尾赌博而被公安机关处理过的该组织的核心人物提出的。在发起组织“声援团”的十余名成员中有4人有前科劣迹，他们中的一个曾因盗窃被判3年徒刑（因怀孕监外执行）；一个曾因流氓罪被判3年徒刑；一个曾因奸淫幼女劳教1年；一个曾因流氓罪被起诉。这帮乌合之众汇集在一起，干了许多坏事。他们聚集在闹市中心造谣惑众，说什么“北京绝食学生已有2人死亡，北京工人已经大罢工了。上海工人不能再沉默了，要行动起来”。这伙人先后在大光明电影院、沪港餐厅、汉口路小花园等处秘密集会，拟写反动口号。他们组织了数十次示威游行和静坐请愿。当他们得知江泽民同志在上海展览馆接待戈尔巴乔夫总书记时，组织了千余人的队伍前去示威，还企图拉队伍在虹桥机场干扰戈尔巴乔夫来沪访问。这伙人为了扩大声势，故意制造混乱，在游行途中拦截各种车辆，强迫司机按喇叭，以示声援学生和“哀悼”所谓绝食中死亡的学生。尤为恶劣的是，他们带领队伍，嘴哼哀乐，抬着花圈到上海电视台要求录像遭拒绝后，竟将花圈挂到了市总工会的门上。

5月19日，在外滩市政府大楼门口出现一个自称是“王震的孙子，现任上海青年会干事，名叫王月辉”的人，实际上，此人既不是王震的孙子和上海青年会干事，也不叫王月辉，他的真名叫蔡朝军，是一个曾被公安机关拘留三次、劳教一次的解教人员。就是这么一个人，他担任了所谓“上海工人自治联合会”的总指挥，伙同一伙歹徒制定了所谓“要号召人民起来革命，推翻当今腐败政府，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纲领。他多次在外滩、复旦大学、人民广场发表演讲，咒骂国家领导人是“国贼”，是“政治大流氓”，还造谣说“中

央一些老同志反对军管,要求退党”等等,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5月23日,人民广场上又冒出了一个“民主自由之声”。这伙人在广场上搭起广播台,公开宣称他们的宗旨是“唤起民众,唤起工人阶级尽快起来,能起一个宣传鼓动作用”,并且叫嚣:“我们的目的不是叫中央某个人倒台,而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罢免一个总理两个主席,重新组织内阁。”他们诬蔑我们国家“现在是不三不四”,诬蔑我们社会是“黑不黑,黄不黄”,声称要以“最后通牒”的方式进行罢工,“逼李鹏下台”。他们把从“美国之音”及其它非法渠道传来的反动宣传反复通过“民主自由之声”传播。当北京实行戒严后,他们又造谣说,部队要进上海了,已经开到了苏州、无锡,要求群众行动起来,阻止部队进上海,等等,似乎气壮如牛;实际上,这个所谓民主自由之声,一共只有五个成员,而其中为首的竟是一个现行犯罪分子。此人叫朱福明。5月15日,朱犯与一个在麻将台上搭识的女人勾搭成奸后,得知这女人身边有外币,即起歹念。时隔三天,朱犯再次与这女人鬼混时,就将她活活勒死,劫得美元等外币和其它财物。5月23日,这个穷凶极恶的杀人犯还没有洗干净手上的血迹,就乘着混乱,骑着自行车跑到人民广场去高喊“捍卫宪法,争取民主”了。这伙人渣要实行什么样的“民主自由”,不是很清楚吗?

5月24日,在市总工会对面的外滩码头上又冒出了一个所谓“上海爱国工人声援团”。这个组织的成员共10名,担任总指挥和副总指挥的,一个曾因贩卖黄金被公安机关拘留过,一个曾因参与诈骗被公安机关收审过。就是这样的两个人,带领了一伙人四处活动,进行反革命宣传,发表蛊惑人心的演说。在6月3日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后,这个组织中的一名骨干分子严廷贵(曾因赌博和流氓活动被公安机关处理过2次),还提出了绑架大厂厂长的阴谋,妄图胁迫厂长下达罢工命令。他们还具体商量的绑架厂长所

需的麻醉药品、交通工具和关押用的房子等问题。

还有一个叫“上海工人自治声援团”的组织，为首的人外号叫“海龙王”，曾被强劳一年。这个组织的9名核心成员中有3名是曾因侮辱妇女、流氓斗殴而被公安机关处理过的对象。他们用恶毒的语言诬蔑国家领导人，公开呼喊反动口号，说什么“搞独裁的人没有好下场”，“总理颁布戒严令是不合法的”，“政府镇压学生没有人道”等等。在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乱之后，6月7日，这伙人在湖北路杏花村秘密聚会，妄图作垂死挣扎。其间一个成员吃菜时吃到一只死蟑螂，与服务员发生争执，邻座好言相劝，这伙人竟大打出手。待民警赶来，这个组织的一个成员如同泼妇一般，将民警咬了一口。大家看看，这伙高喊“民主”、“自由”的斗士竟是一批什么样的东西！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也出现过一个“肖斌式的人物”。6月5日，在杨浦区平凉路口，一堆人群正在议论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一个自称是刚从北京逃回来的人正绘声绘色地向人们介绍他身上穿的这件带有血迹的衬衫。此人名叫耿修亮，曾因流氓斗殴被公安机关拘留过。他造谣说衬衫上的血迹是从北京带回来的，是解放军用枪在天安门广场进行血洗时，子弹击中了身边的一个人的头，血溅到了他的身上。还说“一个3岁的小孩被子弹打了6个洞，叫声妈妈就死了”，“北京死了2万6千多人”，等等。当人们怀疑地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他竟大言不惭地说“解放军打一枪，我数一下，数下来的”。其实此人根本就没去过北京，他衣服上的血迹是他这天杀了一条狗溅上去的狗血。

社会渣滓在冲击政府机关的反革命活动中也活跃异常。6月8日，一伙歹徒在黄浦区政府门前以“纪念在北京死去的学生”为由，要求区政府降半旗。这时人群中有一个特别活跃的人物拼命地叫喊起哄，扬言要冲进区政府，“不敢冲的是缩货”。这个“勇敢分

子”实际上是一个因盗窃而被拘留过的犯罪分子，名叫吴其浩。6月5日晚上他在某新村公房内用螺丝刀撬窃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6月8日就骑了这辆偷来的自行车加入了所谓“争取民主”的行列，为“声援学生”队伍开道。象这种鸡鸣狗盗之辈竟成了这次动乱中的重要人物，这次动乱的性质，就可想而知。

同一天，还发生了一起歹徒冲击公安机关事件。这起事件的领头人吕国栋是一个曾因流氓斗殴而被处理过的犯罪分子，他伙同另一个无业人员对公安机关抓住一名犯罪分子表示不满，同一批围观者在人民广场派出所外面起哄，并煽动说“凑满15个人冲进去，不要怕警察”。尔后，他们冲进派出所的值班室，狂叫“把电话线拉掉，叫他们不能联络”。由于公安机关及时采取措施，他们的阴谋才没有得逞。

“文革”期间的造反派小头头在动乱中也不甘寂寞。6月8日下午，同济大学门口有一人站在公交车辆上演讲，时间长达90多分钟，围观的人群由开始的500多人逐渐增加到2000多人，交通严重受阻。这个自称代表上海工人阶级向大家讲几句话的人，曾在“文革”中担任过“下放工人造反派”五角场分部头头，这个“四人帮”的残渣余孽，公然叫嚣“现在共产党不得人心，就好比竹笋一样，从头头开始烂掉了，”“我看他们（共产党）的日子不会太长了”。这个罪犯还在市百一店门口对群众煽动说“中国没有新闻自由，就没有民主。共产党讲话不算话，所以报纸要从反面看。中国工会不给我们工人讲话，我们要象波兰一样成立一个团结工会”，反动气焰极为嚣张。

社会渣滓以“上海要军管了”、“要阻止解放军进上海”为由，疯狂地设置路障，聚众堵塞交通，破坏交通工具，破坏交通秩序，妄图搞乱上海。

李鹏总理于5月19日代表国务院宣布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

严后，上海部分高校学生听信上海要军管的谣言，在5月22日占领了苏州河上的五座桥。从这天起，一些社会渣滓纷纷出笼，扰乱上海的治安秩序。特别是6月3日北京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以后，这些社会渣滓眼看大势将去，更加肆无忌惮地设置路障，破坏交通工具，妄图造成我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的全面瘫痪，来进行垂死挣扎。这里仅以6月5日至6月8日四天为例。

6月5日凌晨，天色微明，设置路障的犯罪活动开始在上海北区实施。他们妄图通过设置路障，堵塞交通，造成全市性的混乱局面。在市中心，社会渣滓拦截车辆，设置路障更加猖狂，致使机动车辆无法在市中心行驶。6月6日，因流氓活动而劳教三年刚被释放的伏李勇，在西藏路北京路口见一辆客货两用车驶来，就高叫“拦住它”，并同一伙人将车团团围住，逼驾驶员放轮胎气。驾驶员不从，伏李勇即拿下车顶灯将车右门玻璃砸碎，还伙同他人将车掀翻在路中央。这天晚上，曾被劳动教养和行政拘留过的胡家豪、何恒，特地从闵行赶至市政府门口，尾随一伙打着“血海深仇”旗帜的人参与闹事。途经乍浦路桥、四川路桥时，这两个人先后拦截了2辆吉普车、一辆面包车和一辆轿车，将这4辆车的7只轮胎戳破作路障，并把路边的金属管子横在马路中间作路障。由三个刑释解教人员和—个无业人员组成的“野鹅敢死队”可谓是一支设路障戳轮胎的“专职队伍”。6月7日晚上8时，他们先是聚集在市政府门口，然后沿着福州路、人民广场、黄陂路、南京路、西藏路闹行，一路将马路上的隔离栏杆推翻作路障，同时拦截了来往的15辆车辆，戳破汽车轮胎11只，还殴打了多名驾驶员。几乎在同时，另一名曾被公安机关拘留过的非法组织头头，伙同7名歹徒，手拿5根尖头铁棒，在西藏中路和平电影院附近，先后拦下4辆车子，将车轮胎的气放掉。他们还拦下2辆摩托车，其中一名歹徒还强行从驾驶员的口袋里搜去一包香烟和若干人民

币，真是无耻之极！

市委、市政府一声令下，几十万工人纠察队上街，协同公安干警清除路障，维护正常的交通秩序。那些社会渣滓眼看他们的阴谋将彻底破产，更加丧心病狂。6月8日凌晨1时，曾因奸污幼女、盗窃而被少教、劳教各一次的赵国正，在南京路西藏路口见数十名民警和工纠队员正在清除路障，即伙同他人将已清除的一辆4吨卡车重新推至路中央，并在旁人打火机的照明下，用刀戳轮胎，将轮胎气放掉，尔后又将一辆64路公交车推至西藏路中央横放，妄图重新阻塞交通，同一天上午，一个曾因侮辱妇女被公安机关拘留过的罪犯，先后在肇家浜路、天平路、大木桥路等处将4辆公交车和一辆厂车的轮胎气放掉，横在路中央作路障，致使这些路段的交通中断。这天上午10时，一个自称她的儿子在北京被解放军打死了的女人，在延吉路黄兴路口，先是帮助他人用铁丝放车轮胎气，后因觉得这样太慢，又跑回家拿了老虎钳、螺丝刀等，提供给他们放气，还自己动手放了3辆汽车轮胎的气，并煽动说“北京在流血，不管大道小道都要设路障”。这个女人叫宋瑞英，是曾被公安机关拘留过的犯罪分子，所谓她的儿子“在北京被打死了”，纯属无稽之谈。

由于这些社会渣滓伙同社会上的歹徒设置路障，破坏交通工具，使上海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蒙受极大的损失。仅6月5日一天，全市264处交通要道受阻，664辆公交车和运输货车被放气或被戳破轮胎抛在路中央。由于交通受阻，造成工人不能上班，市民生活发生困难，路上行人没有安全感。另据市公交总公司统计，从6月4日至6月9日公交被损坏车辆达1017辆，全市的公共交通近乎瘫痪。这几天，这伙歹徒确实是称心如意，享受了充分的“自由”，但是我们人民群众的工作权利、生存权利又在哪里呢？

社会渣滓蓄意破坏铁路运输，纵火烧毁161次列车，制

造6·6光新路道口严重骚乱事件，继而又组织冲击闸北区中心医院，妄图抬尸大游行，向政府施加压力。

人们一定记忆犹新，在上海的动乱中曾出现过一个不小的“高潮”，这就是光新路铁路道口6·6严重骚乱事件。这是极少数歹徒继在市内设置路障，破坏交通秩序，造成全市事实上的瘫痪之后，又把破坏活动转向冲击铁路运输的一大阴谋。让我们先来看看“6·6事件”前奏曲中社会渣滓的丑恶表演吧。

6月5日晚，一部分高校学生在江湾五角场国定路道口欲撬拆直达江湾机场的一条军事铁路专用线的道轨。此时，在铁路沪东工区做线路工、曾因赌博而被公安机关拘留过的犯罪分子杨芬庭，特地从道口库房内拉出电线和照明灯，为撬拆铁轨照明。另一名曾被判过9年徒刑的铁路养路工主动上前拿过学生手中的撬棒说，“我来起给你们看看”，竟连续起出道钉20余枚。由于这两名犯罪分子的配合协助，闹事的学生很快将一段25米的道轨拆离路基，致使这条军事专用铁路线全线瘫痪。

这一天早晨，在光新路道口，一伙歹徒开着汽车反复播放“美国之音”，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坐轨拦车。又是一个社会渣滓——曾被公安机关拘留过两次的高贵红带头呼叫“一、二、三，坐下”，鼓动围观群众坐在铁轨上拦截了多辆火车。这名罪犯干了这些之后，又窜到交通路上拦截了6辆车辆，将其中一辆菲亚特轿车翻成侧状，还把来往的送蔬菜拖车拦住，将西红柿、鸡毛菜等朝天乱抛，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围观起哄。曾多次因盗窃犯罪而被强劳的犯罪分子范锦春混在人群中散布“邓小平已在医院被打死了”，“现在警察乱抓人，把人打得半死”的谣言，并指着前来维持秩序的铁路民警说“你这小子我认得依”，煽动群众对民警出冷拳。由于这伙歹徒的破坏，致使沪宁、沪杭两线客货列车严重受阻。

歹徒破坏铁路的活动愈演愈烈，终于发生了6·6光新路道

口严重骚乱事件。在这一事件中，社会渣滓的表演可谓淋漓尽致。6月6日，曾因流氓行为而被劳教的女犯罪分子王霞，见322次列车在光新路道口受阻，便带头煽动围观群众坐在列车正前方的轨道上。公安干警前来维护秩序，她不但不听劝阻，反而煽动围攻公安干警，大耍流氓手段。一个曾因流氓斗殴而被拘留过两次的犯罪分子，多次煽动群众拦截火车，致使301次、123次旅客列车在道口受阻。这天晚上20点30分左右发生的161次列车事故，就是这些歹徒骚乱所引起的。这起意外事故发生后，一些歹徒借机煽动，扩大事态。他们竭力阻止抢救伤员，袭击车上旅客。曾因偷窃被处罚过的犯罪分子陈德庆，拿着手电筒爬上列车驾驶室，一把抓住驾驶员的领口，推驾驶员到门口，然后一脚把驾驶员从驾驶室踢下去，一伙歹徒一哄而上拳打脚踢，当场把驾驶员打昏。另一名驾驶员也被歹徒打成手臂两处骨折，无法站立。一些歹徒用石块、铁棍打执勤民警，甚至用汽枪向民警射击，许多民警被打伤；161次列车的18节车厢玻璃几乎全被歹徒砸碎。一伙歹徒还丧心病狂地纵火烧列车车厢、警用摩托车，拦砸消防车。曾因盗窃而被劳教和行政拘留过的罪犯彭家民、韦迎春见数辆摩托车被烧还嫌不解恨，又跑进停放警用摩托车的附近一家厂内，推出一辆摩托车焚烧，并阻拦消防人员灭火，围攻消防人员，致使灭火工作无法展开，火势迅速蔓延，造成巨大损失。据初步统计，这次光新路道口骚乱事件，造成570多万元的经济损失，170多名公安干警和铁路职工被打伤。

光新路道口事件之后，极少数歹徒还不死心，又妄图抬尸大游行。当车辆将死伤人员急送闸北区中心医院时，曾因盗窃被判过三年徒刑的女罪犯戴珍萍，即从闸北区中心医院跑到人民广场，边哭边向数百人造谣说，“好惨啊，光新路道口火车轧死了三十多名大学生，是解放军用枪顶着火车司机脑袋开车轧死的，实在没有想到啊！”并指着自己衣袖说“我的衣服、手上还留有在医院抬尸的血

迹”。在她的煽动下，数百名不明真相的群众哄闹着向闸北区中心医院开进。行进途中，曾因殴打他人和犯有流氓活动而被判刑、劳教过的个体户张某(此人在动乱中小有名气，人称“个体户小张”)跳出来，站在自行车书包架上反复进行煽动，狂叫准备进行抬尸大游行，逼迫现政府下台。队伍到达闸北区中心医院时尾随群众已达万人以上。这伙歹徒强行冲进急诊室，提出要看抢救记录，遭到拒绝后，他们又冲进太平间，拉出尸体让“高自联”成员拍照，制造所谓罪证材料，有的还挤进人群，用电喇叭进行宣传煽动，致使不少人冲入太平间，将医院的西大门和太平间的两扇门全部撞坏，窗玻璃全部砸碎，医院的正常医疗秩序、工作秩序完全遭到破坏。

上面介绍的大量材料，从“纵向”揭露了一些社会渣滓在动乱中的丑恶表演。在此再从“横向”作些介绍。黄浦区和铁路是上海动乱闹事最厉害的区域。据黄浦公安分局和铁路公安分局的统计，这次动乱中他们抓获的犯罪分子，有前科劣迹的社会渣滓要占46%和50%。

行文至此，不妨作一下归纳。这些社会渣滓，有的是公安机关正在追捕的现行犯罪分子，有的是曾犯有各种罪行、虽经判刑劳教但没有改造好的刑释解教人员，有的是早已定性的反动组织成员，有的是“四人帮”的残渣余孽。在上海从学潮到动乱的各个阶段、各大事件中，这些社会渣滓怀着强烈的复仇心理，或煽风点火，造谣惑众，或打砸抢烧，大搞破坏，或密谋策划，心怀叵测，他们的真正目的并不是“为了国家好”，而是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我们的人民共和国。

我们揭露社会渣滓在上海动乱中的丑恶表演，是想从这些发生在人们身边的活生生的事实中引出一些启示。

启示之一，在我国确实还存在着敌对势力，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着阶级斗争；而且，在一定条件下，阶级斗争还会激化。这次北

京和全国一些城市(包括上海)发生的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正是国际和国内阶级斗争的深刻反映和必然表现。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一手策划和制造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人,就是代表着国际和国内的敌对势力向着我们党、我们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猖狂进攻的;那些没有改造好的社会渣滓,则是这场政治动乱的社会基础,也是直接的破坏力量。看一看他们在上海动乱中的丑恶表现,听一听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疯狂叫嚣,一切正视现实的人们,都会加深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确实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在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我们进一步搞好改革开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

启示之二,任何一次大的社会事件,判断其性质,不能仅仅看有多少人参加了这个事件,而要象马克思在分析波拿巴王朝时所说的,要看它所代表的阶级利益,看它的旗帜上的阶级徽记。从社会渣滓的丑恶表演中,我们可以充分地看到,前一阵子上海确实确实发生了一场动乱,而不是什么“爱国民主运动”,他们打的“民主”旗号只不过是欺骗人心的幌子而已!

启示之三,一切善良的人们特别是头脑单纯的大学生,都应该从社会渣滓的丑恶表演中,增强识别能力,进行认真的反思。应当肯定,在学潮之初,许多学生确实抱有反腐败、反“官倒”、要求推进民主进程的善良愿望,这同党和政府的主张也是一致的。但是,由于这次学潮从一开始就被极少数人所操纵和利用,具有了政治动乱的性质,而动乱又为社会渣滓、反动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同时,相当一段时期以来,高等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削弱,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没有很好开展,相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不少大学生中却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事态的发展必然要走向广大学生善良愿望的反面,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严酷

的事实再一次告诉我们，在严肃的政治斗争中，不用四项基本原则武装自己，不讲立场，不辨方向，单凭善良的愿望，就很容易上当受骗以致铸成大错。列宁早在1913年就曾借用一句俗话告诫过人们：“善良的愿望会把人引入地狱。”（《列宁全集》第19卷第256页）许多大学生在这场政治动乱中的所经所历，难道不正印证了列宁这一论断的深刻性？社会渣滓在上海动乱中的丑恶表现，难道不正从反面告诉我们，一旦放松了四项基本原则，会造成多么可怕的后果！社会渣滓是很好的反面教员。他们的丑恶表演从反面警醒着人们，正如邓小平同志说的，“只有对极少数人实行专政，才能够充分保障绝大多数人民的民主权利。”

（原载1989年8月23日《解放日报》）

《美国之音》的不光彩行径

《北京日报》评论员

4月中旬以来，对中国首都北京发生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美国之音》表现了异乎寻常的热心。每天用3种节目，花10多个小时，进行喋喋不休的报道。可惜的是，人们只要稍加琢磨，就发现，《美国之音》的报道，实在经不住推敲。且把那些挑拨、煽动、攻击、中伤的言论放在一边，暂且不论，仅就编织谎言、造谣惑众这一条来说，真可说达到了登峰造极、令人吃惊的地步。对一个一向标榜“客观公正报道”、“恪守新闻道德”的官方传播机构来说，这种表演，是太不光彩了。

北京学潮爆发之初，4月18日和19日，在极少数人的挑动下，接连发生部分学生冲击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新华门的事件。20日凌晨，治安警察在多数学生已经离去之后，将少数坚持不走的学生强行带上汽车，送回北京大学，没有拘捕一个人。而当天《美国之音》却造谣说：“星期四上午公安人员逮捕了大约二三百名在中南海正门静坐示威的学生”，后来又说“有300人被拘留”。国内立即有人呼应，编造了所谓“4.20惨案”的谣言，使学潮升级。

5月12日，《美国之音》报道说：“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的时候，对于向北大学生讲话表示了兴趣。但中国政府拒绝了这种做法。”这纯粹是子虚乌有的捏造。我外交部证实，在中苏双方共同商定的戈氏访华日程中，根本就没有这项安排。

5月20日，国务院宣布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但执行戒严

任务的部队主要还停留在北京郊区。而《美国之音》却在当天的广播中造谣说：“中国军队乘坐装甲车，封锁了天安门广场。”这样的凭空捏造，其手法也实在是太拙劣了。

这一段时间，《美国之音》特别热衷于“报道”我国领导层的一些动向，尤其是军队领导层的动向。5月23日，它借刘宾雁之口说什么“现在有100多个将领联名反对这种错误决定（即戒严），有很多省份和一些军师都明确表示，他们不承认李鹏政权，甚至称其为伪政权”。这是明目张胆地捏造事实，挑拨离间。实际上，全国各省市和各大军区都已先后致电党中央、国务院，表明了对中央决策的坚决拥护和支持。

就在当天，《美国之音》还广播了一条消息，也是借刘宾雁的口说，“参加天安门广场游行示威的人数，我相信早已超过1000万”。这是天大的笑话。北京总共只有1000万人口，其中有300多万农民。即使城市人口中，也有几百万老人和娃娃，怎么可能都到天安门去游行呢？他们的这一报道，如果不是无知，那就是别有用心。

6月3日，北京的动乱发展成为一场骇人听闻的反革命暴乱，《美国之音》难以掩饰他们的兴奋，作了大量的报道。我戒严部队一举平息了暴乱，《美国之音》又大肆造谣。它在6月5日的报道中说：“中国军队血腥屠杀……，造成数以千计的人死亡。据信至少有1400人于星期天凌晨前，在人民解放军血洗天安门的大屠杀中遇难。”事实果真是这样吗？当晚天安门清场时的许多目击者的谈话和已经公开播放的实况录像，完全戳穿了这一谎言。对广场静坐的学生不仅根本不存在“血洗”的问题，而且一个人也没有死亡。至于军队进城时部队和群众的死亡人数，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同志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得很明确，《美国之音》的夸大和渲染是别有用心。

这几天，反革命暴乱已基本平定。军民之间、军队与军队之间

团结一致，为恢复首都的正常秩序共同努力，取得了很好的成果。《美国之音》又怀着一种沮丧的心情，使尽力气造军队的谣。6月6日他们造谣说：“在忠于不同派系的军队之间，也发生了权力斗争”，“北京可能发生内战”。6月7日，又造谣说：“部署在北京西区执行戒严的军队与其他没有权力镇压示威者的军队，互相开火。”6月8日又造谣说：“前一天中国军队在北京市内抢占了有利地形，……等待和对立的军队交战。”这些海外奇谈，也许可以一时欺骗不明真相的人，或是为国内外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提供煽惑人心的资料。而身临其境的每一个北京市民都能够出来说明，这完全是一派胡言。6月9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情况，更有力地证明，我们的党中央是团结的，我们的军队是统一的。

现在，《美国之音》又开动他的谣言机器，在学生中制造恐怖情绪。6月9日，《美国之音》宣称：“从星期四晚间在各个高等院校地区实行宵禁，不久公安人员就进入了北大。”在另一则报道中又说：“警察晚上进入了北京大学，带走了大约12名学生。”事实上，到现在为止，戒严部队从没有宣布过在什么地方实行宵禁。所谓从北大带走学生，实际上是外地流窜人员和小偷混入北大作案，该校保卫部门根据学生的检举，将这些坏人交由公安部门处理。

《美国之音》造的谣是实在太多了，表演也够充分了，为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推波助澜也真够卖力气了。现在，北京的秩序正在恢复，人心日趋稳定，《美国之音》也该休息一下了。不过，靠造谣过日子的《美国之音》如果不造谣，那是一天也混不下去的。下一步它还会编造出什么谣言，我们等着吧。

（原载1989年6月12日《北京日报》）

《美国之音》的表演与“和平演变”策略

吴 戈

《美国之音》为什么对这次发生在北京的动乱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暴乱，会狂热地加以支持呢？只要我们稍稍回顾一下历史就会知道，这是美国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又一恶劣表演，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中反共人士对中国推行“和平演变”策略的旧梦重温。

马克思主义早就告诉人们，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作为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对立面，一经问世，就预示着整个资本主义必然衰落，预示着它最终要被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这是由现代社会的内在矛盾和规律所决定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因此，任何一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巩固、完善和发展，都使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受到冲击和威胁。虽然，各国人民依照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完全是自己国家主权范围内的正义事业。但是，国际资产阶级中的反共人士，总是企图交替地运用武力颠覆与“和平演变”的两手策略，来扼杀和消灭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且不说“十月革命”胜利之后，西方十四国的反动武装干涉曾企图把刚刚出世的苏维埃俄国扼杀在“红色的摇篮”里；且不说三十九年前，美国进行侵朝战争、派第七舰队进占台湾海峡，并运用贸易禁运，经济封锁，以及其后成百次地、挑衅地侵犯我领海领空等手段，企图用武力颠覆社会主义中国。在这里，我们要回顾的是，当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勤劳的双手，依靠艰苦奋

斗,使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华大地上站稳了脚跟,社会主义事业获得了稳固的基础,中国的国际威望大大提高的情况下,甚至在双方努力下于1972年中美两国建交之后,美国的一些反共人士仍然念念不忘对中国推行“和平演变”策略,幻想在将来的某一天实现其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目标。

奉行“和平演变”的策略,是美国朝野的反共人士在武力干涉失败后,或在社会历史条件变得使武力干涉成为一种不现实的选择时所作的一种策略转换。从四十年前的艾奇逊到五十年代的杜勒斯,再到今日美国反共势力的若干作为,就体现了这种策略转换的历史轨迹。

美国前国务卿艾奇逊,是制订对华“和平演变”策略的始作俑者。1949年年中,中国人民反对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的那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不可逆转。在军事干涉失败后,在这年8月发表《美国与中国关系》即“白皮书”的前夕,艾奇逊在7月20日致杜鲁门总统的一封信中,制订和提出了鼓励支持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妄图使中国“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的斗争策略。他在信中说:“我们仍旧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局面无论可能是怎样悲惨,无论中国庞大人口中的一个主要部分,可能残酷地处于为一外国帝国主义利益而效力的一个政党的剥削之下,中国悠久文明和民主个人主义终将再起来,中国终将推翻外来的羁绊。我认为我们应当鼓励在中国的一切发展,这些发展在现在或将来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而工作。”显然,艾氏在这里说的“帝国主义”,指的是苏联;而“一个政党”,指的是中国共产党。艾氏这些充满诬蔑言词的主旨,是提出了一种“鼓励”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从内部搞“和平演变”,以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搞垮人民政权为目标的策略。由于在当时及其后的一段时间里,美国对华奉行的主要是公开敌视的态度和军事侵略及

军事威胁政策，因而搞“和平演变”还不是他们占主导地位的策略思想。

真正把“和平演变”开始视为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斗争的主要策略，是杜勒斯时代的产物。从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中，社会主义制度继苏联之后，先后在中国和其他一些人民民主主义国家中牢固地建立起来，并且开始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而在这期间，美国的侵朝战争也以失败而告终。显然，再试图主要用武力来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是行不通的、也是极不得人心的愚蠢行为。于是，他们不得不实行策略转变，即把“和平演变”作为对付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的策略原则。五十年代中，当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我国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后的一次国策声明中，就公开宣称，美国的政策是要促进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化（即自由主义化或资本主义化），并寄希望于这些国家的第三代人和第四代人。所谓“促进”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化”，就是要策动和配合这些国家内部的残余的资本主义势力，搞“和平演变”，使社会主义社会逐渐演变成资本主义社会。因此一举，“杜勒斯”这个名字，也就成为搞“和平演变”的代名词。不过，在六十年和七十年代，由于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主要推行的是“战争边缘政策”和“冷战”政策，由此造成的逐渐升级的军备竞赛，以及东西方紧张的国际形势，使得他们“和平演变”的策略原则，无法充分施展。

进入八十年代后，在美国朝野的一些反共人士看来，是他们搞“和平演变”的极好时机。因为自二次大战迄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段和平环境中，现代科学技术有了迅猛的发展，社会经济力量有了迅速的膨胀，社会和阶级矛盾得到了局部的调整和缓和，因而资本主义世界在经济和科技上积累起了相对的优势。与此同时，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种种复杂原因，在社会和经济问题上，

遭受到了程度不同的挫折。社会主义事业在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在前进中发生了一些新的问题和困难。其中一个普遍性的原因，是僵化、过时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呈现出种种弊端，从而妨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发挥，阻滞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较快提高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充分发展。所以，从七十年代末开始，中国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都先后开始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的体制改革。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些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在西方某些反共、反社会主义者的眼中，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正是他们策动这些国家“和平演变”的千载难逢的机遇。而这期间，东西方开始走向缓和的趋势，也为他们在不断扩大的东西方交往中贯彻这种策略原则，提供了方便条件。

对美国一些反共人士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我们要警惕他们的两手：

其中一手，是他们使用经济援助和技术转让作为手段，想引诱社会主义国家上当，或者借以施加压力，促使它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搞“和平演变”。凡是不愿意搞“和平演变”的国家，他们就不提供“实质性的援助”，或者先给点援助，然后就用“逼债”等经济手段，来迫使你就范。关于这一点，作为中华民族败类的方励之，是深谙外国主子心意的。他曾向华尔街的老板们献计说，在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外国要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抽回在中国的投资。而作为这一点的前提，是在短期内既要给予刺激，又不要激化到使中国完全实行自力更生的程度，并在短期内通过外国在中国的投资，在达到“中国对外国投资有更大的依赖性”时，即“在国际社会和中国的关系上经济因素越来越重要的时候，那就容易……”了。至于“容易什么”，方先生欲言又止。其实是不言而喻的，他就是想借助西方的经济压力，来达到他们梦寐以求的，在中国搞“和平演

变”亦即实现“全盘西化”的目标。当然，在中国与外国的经济关系上，我们决不能因噎废食，在平等互利和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前提下，我们仍应扩大对外经济交往，仍应尽可能多一些地引进外资和加强技术合作。但同时，对蓄意玩弄“和平演变”阴谋的人们，我们则应保持必要的警觉。

至于我们要警惕人家的另一手，那就是他们运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即以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和人权观念作为精神武器，向社会主义国家浸润、渗透，并用以策动和支持我们国内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极少数人，从内部瓦解社会主义制度。

马克思主义者历来认为，以抽象的自由、民主和人权作为旗帜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中，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它在本质上，是资产阶级雇佣劳动制度、资产阶级利益在观念上的反映。它作为在该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取得了社会的名义，并被赋予了抽象的普遍性的形式，因而它是一元的，是为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和权利观念，已经改造和扬弃了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中的消极成分，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在这里，社会主义民主意识和制度，代表的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意志，是与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相适应的政治和观念的上层建筑。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应该发展社会主义的民主、自由和权利观念；如果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要求实现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自由和人权，必然会瓦解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然而，资产阶级的一些思想家和追随者，为了让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争得某种合法地位，并用以作为搞“和平演变”的思想工具，却硬要说它是多元化的”。故而，西方反共人士所希望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政治多元化的改革”，只不过是他们搞“和平演变”的隐蔽的说法。对此，连“高自联”的头目王丹，也是心领神会的。王丹曾对北大的一位

同学说：他们闹事的“最低目标”，是争取承认“高自联”合法，为方励之平反，民间办报；而他们的“最高目标”，则是要“建立多元政体，实现精英政治”。

因此应该说，国内外一些人想在中国搞“和平演变”与中国人民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不仅是国际范围内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也是中国社会本身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因为在国内，搞“和平演变”，也有一层薄薄的基础。在中国社会内，包括知识界，甚至在共产党内，仍然存在着极少数羡慕资本主义制度的人。如果说，当年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只是一些对美国存有幻想，对共产党尚有误解的中间分子的话，那么，今日中国的一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则是拜倒在西方文明脚下，狂热地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动分子。如方励之、王丹、刘晓波之流，他们不仅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狂热分子，而且也是中华民族的败类。他们奴性十足，崇洋媚外，与国外反共势力心心相印，内外勾结，配合默契，在中国制造动乱和暴乱，企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人民共和国，建立依附于西方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励之之流，是美国反共人士妄图在中国搞“和平演变”的应声虫。

也正因如此，《美国之音》对于这次发生在北京的动乱和暴乱的煽动和支持，才达到了利令智昏、忘乎所以的程度。人们记得，今年春季美国总统访华时，美国驻华使馆所导演的方励之的“赴宴风波”，显然是对方励之正在酝酿在中国闹事的一种露骨的支持。在这次发生动乱和暴乱过程中，《美国之音》大肆煽风点火，拨弄是非，唯恐中国不乱；美国驻华使馆又以暴乱分子的保护神自居，为反革命暴乱的策划者和操纵者、我公安部门通缉的人犯方励之夫妇提供“庇护”；6月5日，美国政府又对中国平息暴乱进行“指责”，表示“极大的遗憾”，并且，宣布中止中美政府间的军售和商业

性的武器出口，中断中美两国军事领导人的互访活动。美国政府及其宣传机构的这些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进一步暴露了他们支持在中国搞“和平演变”的野心。这是中国人民所不能容允的。

应该指出，自1972年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关系有了一定的发展。中美双方只要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两国关系，就具有良好和稳定的发展前景。我们奉劝美国政府和朝野人士，应以中美关系的大局为重，不要干涉中国的内政，也不要妄想在中国搞“和平演变”。目前，发生在中国首都的反革命暴乱已经平息。动乱暴乱的策划者们，以失败而告终。我们奉劝人们不应用近视的眼光来看待中国。中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不会改变的，坚持改革开放也是不会改变的。中国将继续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一切国家的关系。中国决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也决不允许任何外国干涉中国的内政。企图在中国搞“和平演变”也罢，这一图谋失败之后搞什么“制裁”也罢，到头来吃亏的只能是他们自己。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原载1989年7月9日《人民日报》）

方励之言论摘录

钟 宣

编者按：这里摘录的，是方励之1987年以来的一些言论。他猖狂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鼓吹成立反对党，建立完全西方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他与国内外敌对势力紧密配合，或发宣言，或写公开信，或到处讲演，或暗中策划，成为这次动乱的重要煽动者和组织者之一。看看这个材料，对于认识动乱以及反革命暴乱的性质及其根源，是会有益处的。

一、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

社会主义不管具有“中国特色”还是不具有“中国特色”都根本没有(用)，而且不可能起作用。

(原载英国《独立报》，1988年5月25日)

当前的通货膨胀，应该根据法律规定，通过改革所有制加以解决，使所有制向私有制转变。

现在的通货膨胀超过了市场原理，存在着恶性膨胀的部分。中国的垄断性体制是个问题，外汇和进口品的黑市交易就是个很坏的现象。首要的是进行法律取缔。但最终是要进行所有制改

革,也就是要实行私有制。

(接受日本记者单独采访时的谈话,原载日本
《朝日新闻》,1988年6月12日)

当《读卖新闻》记者问:中国的社会主义有灵活的一面,您认为有希望吗?方励之说:我不这样认为。比如,说建设“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商品经济”,而商品经济赖以存在的基础是私有制,假如今后成功了,那也就成了资本主义。

(与日本《读卖新闻》记者的谈话,原载
1988年8月2日该报)

我认为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思潮应从全世界来看,不单单只是中国。……共产主义在三十年代兴起,到了末期就走下坡了。中国、苏联、东欧国家,他们有共同的问题,他们现在走的路也大概相似,我想最终要达到多元化状态。

(原载台湾《中国时报》,1988年9月3日)

中国的改革应朝向全盘西化,实行全方位开放,应该放弃马克思、斯大林、毛泽东式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模式。

(据新华社香港分社1988年9月6日电)

叶知秋:那么中国的出路是什么?

方励之:资本主义化!

叶:这一代做不了。

方:对,邓小平做不了。

.....

叶:从中共执政算起,应不用一百年(就能实现资本主义)。

方：如果真正实行资本主义，我看最多两代人。

叶：邓小平说中国以后还是共产主义。……

方：他那个主义就是乌托邦。……这是赫鲁晓夫留给共产党人的后遗症。

（方励之在香港与叶知秋的谈话，原载香港《信报》1988年9月9日）

这里他们说是公有制，但这等于是领导人所有制。这比私有制更糟。私有制肯定也有一些问题，但是至少有许多拥有人，而领导人所有制，那就只有少数领导人。政府应当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鼓励私人所有制。

（在北大宿舍接受美国记者采访的谈话，原载《纽约时报》，1988年11月13日）

近四十年来的失败不能（至少不能完全地）归咎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不能归咎于中国的人口过剩。近四十年来幻想破灭，应该归咎于社会制度本身。

（方励之：《中国需要民主》，原载法国《解放报》，1988年1月17日）

40年的社会主义岁月，是令人失望的。在50年代“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好看（原文如此）物理定律那样被人接受。然而看上（原文如此）今天的新中国，只能感到那时的虔诚被玩弄了，那时的热情被欺骗了。……

测量一个社会成功与失败的最基本的考虑是：它与世界上的发达社会之间的差距是缩小了，还是增大了。用这个标准来衡量过去的四十年，不但毛泽东时代是不成功的，就是改革以来的十

年，也还没有足够的根据去唱颂歌。

(方励之：《中国的失望和希望》，原载香港《明报》，1989年2月9日)

二、反对党的领导，鼓吹成立反对党

当记者问及：“对您来说，党意味着什么”时，方说：“我曾有过理想。但是，经过30多年，我的理想破灭了。我懂得了这是假的。我们拚命干，而领导人仅是装装样子而已。党已经变质了。党的领导已经成为一种宗教。”

(接受日本记者采访的报道，原载日本《读卖新闻》1988年8月2日)

除共产党外，大陆需加入(原文如此)反对党，以发挥相互制衡作用，而目前大陆虽有多个党派，但并无形成反对力量，算不上是反对党。

民间组织反对党与中共对抗的形势将会出现，并会成为一个趋势，因为，这亦是一个世界潮流。

(方励之：《大陆首要(原文如此)迈向现代化，中共政权必须多元化》，原载《香港时报》，1988年9月2日)

如果中共衰落而同时私人经济变为优势，如果中共失去了政治和经济的权力及人民的信任，其唯一的出路是让别的组织上台。现在中共已经无力控制一切了。

(接受前澳洲广播公司驻中国记者采访的报道，原载香港《争鸣》第131期，1988年9月)

我在大陆谈过多党制，但现在基础条件还不够，我也鼓励组党，同样地基础条件也不够，我倒是认为香港有相当的条件可组党了！

（与台湾“立法委员”宋高正在香港的通话，原载台湾《中国时报》，1988年12月22日）

我觉得中国大陆走到今天，以邓小平为首的这一代领导人，已走到了他们的极限。……不可能再有什么突破或开创，我们对他们这一代的领导层已经不抱希望了。邓小平能做的，业已做的差不多了，他们这一代的领导人，不可能再接受新的东西了。

（对台湾记者的谈话纪要，原载台湾《中国时报》，1989年2月22日）

三、反对人民民主专政

（邓）政治上和毛泽东没有多大差别，阶级斗争的理论是改变了，不过他们还是相信（共党）独裁政治。

（对香港记者的谈话，原载《香港时报》，1988年6月21日）

从政治上讲，邓同毛一样。他们在使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是邓把魏京生监禁起来的。

邓在1983年发动了反对“精神污染”或反对西方思想的运动。去年，他又发起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这表明，他仍在追随毛泽东有关阶级斗争的思想。

（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国立大学的讲演，1988年8月）

四项基本政治原则与毛泽东的六条政治标准几乎完全一样。而后者正是三十年里指导阶级斗争的最主要的政治原则。

中国的专制政体，与其他政治专制、经济自由的国家不同，它似乎很难完全接受自由经济体制。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的专制政体，是与所谓公有制，即官有制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它的正统意识形态，原则上不与自由经济的必需的产权私有体制相容。

（方励之：《中国的失望和希望》，原载香港《明报》，1989年2月9日）

四、反对马克思主义

邓天诺：您起初攻击地方上的干部，然后是北京市党委会，前不久是政治局。您的下一步攻击目标是什么？

方励之：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没有多大用处了，这是不容争辩的真理。作为科学家，我可以证明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对自然科学的大多数回答过时了，有一些甚至是完全错误的。这是确凿无疑的。马克思主义可以对自然科学发表意见的东西，都源出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书。你在这本书的差不多每一页上，都能发现不现实或者错误的东西。

这不是仅仅指自然科学而言，如果考虑一下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事，那么马克思主义在社会问题上也失去了它的权威。我是公开谈论“马克思主义异化”的第一批人之一。

邓：邓（小平）1979年根据中国宪法，规定每个公民都应遵守四项原则，……。

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过去的东西。它有利于理解上一个世纪的问题，但不是今天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属于一个已经过

去的一定文化时期。它象一件穿旧的衣服一样，必须把它脱下。

邓：四项基本原则是一件紧身衣，中国不能从这件紧身衣中发展成一个民主国家，难道不是这样吗？

方：如果原则是僵死的，那是不可能的。但是领导自己讲过，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我抓住了这句话，如果原则会被发展，我们能够坚持这些原则。

邓：但是在今天的权力结构内，如何实现根本的改革？

方：可以保留形式，改变其内容。新教反对天主教而实行宗教改革，但继续利用同样的圣经，在中国我们可以如法炮制。挂羊头卖狗肉。

（与西德《明镜》周刊驻意大利记者邓天诺的谈话，原载该周刊1987年7月27日）

中国大陆目前正面临着两大困难：一是传统的、封建的东西；二是40多年马克思的文化。近期要解决这些问题很困难，中国应怎么搞，没有解决办法。

四项原则是不能推动改革进程的。四项原则的定义就不清楚，什么叫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国立大学的讲话，1988年8月）

马克思主义三个部分均已过时，而且错误。

（原载《香港时报》，1988年9月9日）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根据上个世纪自然科学联系比较紧密的部分总结出来的总规律。但今天自然科学变化已经很多，……有很多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断已经完全过时了。比如说剩余价值这种概

念，现在证明是不对的。至于科学社会主义这种理论，事实已经证明，它的结果都不会成功。

（原载《香港时报》，1988年9月9日）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死了。要说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话，中共领导既不信，也不懂。年轻的一代完全不信马克思主义，中共领导也明白马克思主义在今日之中国没有用处，他们的目的只是保住手中的权力。

（接受前澳洲广播公司驻中国记者采访的报道，
原载《争鸣》第131期，1988年9月）

五、宣扬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

中国目前没有民主，连民主的ABC也没有，所以，中国目前应向民主迈出第一步。

中国科学家正在中国民主化促进运动中起着带头人的作用。科学家是自由化运动的必然领导人，因为他们理解独立思考和思想交流自由的重要性。

（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国立大学的讲演，
1988年8月）

大陆知识分子争取民主的长期目标是多党制的民主制度，近程的目标是实现必要的人权，争取言论、思想、新闻等自由及受教育均等的权利。

（原载《香港时报》，1988年9月6日）

1989年1月6日，方励之写了一封给邓小平主席的公开信，交由海外报纸发表。信中提出，在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和国庆四十周年之际，要求释放魏京生及所有类似的“政治犯”。此公开信马上得到反动组织“中国民联”的陈军之流的响应，发动了要求释放魏京生的签名运动。

（《公开信》原载《香港时报》，1989年1月11日）

在接受香港《解放月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说：“中共自称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根本是强奸民意，这是对人权最大的破坏，大陆连最基本的人权都没有。我只需举一个很小的例子，中共《宪法》上没有居住自由，这是起码的人权之一，这个例子就够了。”“中共《宪法》规定党领导，更是不合（原文如此），因为中共没有证据证明它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原载《香港时报》，1989年2月4日）

1989年1月初，在北京饭店举行了一次约100多人参加的“纪念‘北京之春’民主运动十周年”的新春茶话会。方励之到会讲话，呼吁采取实际活动“争取更多的言论自由”，宣称“今年是大陆的人权年”。

（原载台湾《中国时报》，1989年2月5日）

1989年2月17日，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举行“促进中国民主化联络组”成立会议，方励之担任组长，由反动组织“中国民联”成员倪育贤担任常务干事。会上发表宣言，要求“释放政治囚犯，删除刑法中关于‘反革命罪’的条文”。宣言说，中国大陆“人民的强烈不满日益接近临界状态”。“现行政治体制的根本弊端是：它取消了人民理所当然应该享有的对于政治制度、政府及执政党的政治

选择权”。因此，“名义上的全民所有制也当然演变成特权阶层所有制”，“根本的问题在于人民必须拥有对于执政者的选择权”。2月19日，台湾《中国时报》刊登了这个宣言。

美联社报道说，(1989年)2月22日，方励之向美联社记者透露，他已被邀请参加美国总统布什访问中国所举行的宴会。他说，如果他有机会同布什交谈，他将提出人权问题，包括中国关押政治犯问题。

我认为要争取的第一步是人权，人权的涵义应包括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与保障，政治犯的释放，以及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也就是要让不同的声音与意见出现。

(与台湾《中国时报》记者的谈话，
1989年2月23日)

方励之要西方更多地“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他说：“出于狭隘的目的，一些政治活动家在人权问题上采取的态度不一样。他们对前者(指苏联东欧)公开表示关注，甚至使这个问题成为对外政策问题中的一个首要条件。但是，对后者(指中国)他们只是嘴上说几句，几乎没采取什么行动。”为此，他抱怨说：“这种做法不仅表明了一种错误态度，而且根本不符合人权精神。”

(方励之：《在人权问题上存在双重标准吗》，
原载美国《华盛顿邮报》，1989年2月26日)

外电报道，方励之(1989年)2月27日在他家中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他对美国外交官一直未就他未能出席宴会一事与他联系感到“有些奇怪”，并说，如果美国不追问这件事，他将感到失望。他要求美国能在中国的“人权”问题上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和再有所举动。他说：“我希望美国对我们表现出更多的同情”，“我希望美国人在今后的几天里能再说些话”。

1989年2月28日《美国之音》报道，布什总统对方励之没有出席宴会表示遗憾，方励之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对布什总统的讲话表示欢迎，他说：“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表明他要肯定中国要有人权。”报道还说，方励之星期一告诉记者说，他认为美国应当在中国人权问题上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

六、煽动学潮和动乱

邓天诺问：您在中国担负什么使命？

方答：民主化。没有民主就没有发展。不承认个人的人权就没有真正的民主。在中国，人们甚至不懂得民主的起码知识。我们必须教育自己懂得民主。我们必须懂得，民主不是领导人能够赐予我们的某种东西。从上面来的民主不是民主，而只是一种放松控制。将会有一场激烈的斗争，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与西德《明镜》周刊驻意大利记者邓天诺的谈话，原载该刊1987年7月27日）

中国的政治气候，近一个时期有了改善。（这）是争取民主自由的人民赢得的，就是因为有86年底的学生运动，不是领导人的恩赐。

我们学生现在所说的民主是在人权基础上说的，就是大家不管任何人都有同等的权利，有说话的权利，有思想的权利，有其他方面的人权，不管领导人还是被领导人。如果用更加明显的话来讲，我们学生所说的民主，不是上帝给予的民主。

（对《美国之音》记者的谈话，1988年5月16日）

民主不再只是一个口号，因为它正在施加它应当施加的压力。

这种压力的目标在于逐步地、通过一些非暴力手段来迫使当局同意朝着政治民主和自由经济方面变化。

(方励之：《中国需要民主》，原载法国《解放报》，1989年1月17日)

1989年1月28日，北京都乐书屋为出版《新启蒙》举行招待会，方励之在会上发表讲话，说“知识分子不能只是改变他们的思考方式，他们还必须行动”，“如果没有人出来呐喊，就没有前途”。

(据台众国际社电，原载《香港时报》，1989年1月30日)

中国的希望正在于越来越多的人能摆脱对当局的盲目希望，开始意识到只有对当局采取公开的批判、监督立场，才是推促社会进步的有效方式。

随着民主意识的扩散，必是会形成对当局有越来越强的制衡力量的集团。事实上，一些雏型已经出现。目前，各种行业各种社会阶层中的非官方活动，如联谊会、讨论会、俱乐部等等，都开始起着不同程度的压力集团的作用。民主不再只是一个口号，已经对当局形成了一种压力。这种压力的目的就是要用非暴力的方法促使当局逐步接受政治民主经济自由的改革。

(方励之：《中国的失望和希望》原载《明报》，1989年2月9日)

匈牙利当局已为1956年事件平反，这是很重要的事。中国大陆目前还没有达到这一步。不过，显而易见的是，外在的压力已越来越大。内部来说，不论知识分子、工人或一般民众，普遍希望自由、民主，要求改革的声浪也越来越高。

(与台湾记者的谈话,原载1989年
2月23日台湾《中国时报》)

1989年2、3月,有些人以纪念“五四”七十周年为名,围绕民主人权等问题,频繁集会。方励之称赞这些集会“对当局采取完全批判、彻底批判的态度”,“火药味很浓”,断言“这种会连续开三次,就要上街了”。

方励之谈到:要外国公司用抽走资金的办法,在“人权”问题上向中国施加压力。他说“至少把人权作为投资的条件”。由于随着大批抽走资金而带来的危险,经济将崩溃,但是国家将幸存下来,然后它就可以“在内部做任何事情”。他并献计,由世界银行暂停提供贷款和信贷开始。

(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的谈话,原载《亚洲
华尔街时报》,1989年4月25日)

中共领导人该就他们所犯的错误下台。如果是集体领导的话,便该全体辞职。李鹏担任教委主任的时间相当长,而赵紫阳昨天也说,中共的领导人是邓小平,所以他们两人(邓、李)都该下台。

中共如不公开承认这几年所犯错误,将很难平息此次的学生民主运动,而且也很可能会扩大成全国性的运动。

(接受香港亚洲电视台记者采访时的谈话,
原载《香港时报》,1989年5月19日)

方励之1989年6月2日在接受美联社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现在发生的事情很重要。学生、知识分子和老百姓首次知道自己有权批评政府,这是中国以前从未有过的。

当记者问到 he 是不是这次运动的幕后主事者时,方说:在精神

上我有很强的影响力，一些学生领袖以前常来我家。……同学们知道我完全支持他们，但他们不想有明显联系。

当记者问到“这次运动会会有什么效果”时，方说：短期而言不易有大改变……长远来说，我们要年老一代领导人比如邓小平他们都下台，他们下了台，情况会好些，会有较多民主。

（香港《明报》1989年6月13日刊登美联社消息）

抓住刘晓波的黑手

王 昭

人们都还记得，在首都部分地区宣布戒严12天之后，经过大量的宣传解释工作，戒严日益取得人们的理解和支持，而天安门广场静坐的学生则日渐减少，难以为继的时候，6月2日，天安门广场却又演出了一出4人绝食48—72小时的闹剧。这次绝食的发起人，就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动乱之初特意从美国匆忙赶回来的刘晓波。

6月1日晚，刘晓波其人在北师大校门通过大喇叭做了一通演讲。他直言不讳地说：“我从回国后，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全民民主运动，我在天安门广场同大学生度过了十几个非常难忘的日日夜夜。现在政府一再强调极少数、极少数人，所谓的一小撮，它的所指看来就是指类似我这样不是学生身份的人。但我想说……我不怕当黑手，我反而以当黑手为自豪，为骄傲，为荣光！”

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现在，让我们通过刘晓波在这场学潮后以及动乱和暴乱中的所做所为，看看这只黑手是如何在同海内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中，伸向首都学潮，并极力煽动动乱的。

刘晓波向来有“狂人”、“疯狗”、“黑马”之称，1986年以来，他以否定中国的一切很出了些风头。1988年6月2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后，8月24日去到挪威讲学。3个月期满，转到了美国。还在出国之前，他就想抛出一批反共反人民的所谓

“重磅炸弹”，但是考虑到出国在即，害怕因此“泡汤”，暂时隐藏起来。到了国外，他无所顾忌了，便把它们连续地抛了出来。在这些“炸弹”剧烈的爆炸冲击震荡中，赤裸裸地暴露出了他的真实面目。

1988年10月，他在香港《解放月报》上著文宣称：“马列主义在中国，与其说是信仰，不如说是专制权力的组成部分。马列主义不是信仰，而是统治者进行思想独裁的工具。”因而，他始终把攻击的矛头指向马列主义。在1989年4月的《解放月报》上，他著文说：“批判马克思主义将直接转化为对东方专制主义的批判。”1988年11月，他从挪威赴美、途经香港，在接受《解放月报》记者专访时，更加放肆地为殖民主义大唱赞歌。当记者问到在什么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时，刘晓波恬不知耻地答道：“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样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对此，连香港《解放月报》的记者都忍不住说：“十足的卖国主义啦。”刘晓波回答说：“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而作为纲领性的主张，则是刊于1988年11月《解放月报》一篇署名文章中提出的四个“代替”。他说：“只能从多党并存的民主制代替一党独裁；用私有制、市场经济代替公有制、计划经济；用多元化的言论、思想的自由来代替思想一元化；用世界的（西方的）现代文化来代替中国的传统文化。”这里，刘晓波提出了以资产阶级共和国来推翻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系统的全面的主张。

1988年底，刘晓波到了美国。同总部设在纽约的以“取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四个坚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现行的专制制度”为纲领的反动组织“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简称“中国民联”），一拍即合。他们勾结起来，沆瀣一气，不断寻找机会，伺机而动。今年以来，从方励之等人的签名上书为魏京生请命，到打着悼念胡耀

邦同志旗号煽动的学潮，他们都密切注视，潜心研究，协作行动。首都学潮刚刚发动，刘晓波自以为时机成熟，便急不可耐地披挂上阵了。

这个一向宣称“我最佩服希特勒”的法西斯信徒，现在竟以“民主斗士”的面目出现。1989年3月，他在纽约参加了所谓“维护人权”、支持方励之等人要求释放魏京生的公开信的签名。4月，首都学潮出现之后，香港《明报》在4月20日发表了一则消息，披露刘晓波伙同反动组织“中国民联”的头头胡平、骨干分子陈军联名发出了所谓“改革建言”，“对大陆目前的学运表示关注”。他们在“建言”中提出，要“重新审查”“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1987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有关问题”，鼓吹“修改宪法”，把四项基本原则“从宪法中取消”。4月22日，刘晓波在《世界日报》上抛出了《胡耀邦逝世现象的省思》一文，集中攻击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是“专制政体”，鼓动学潮要“抛弃寻找开明君主的改革模式，而尝试着走一条从制度上改造中国的道路”。这条路怎么走呢？刘晓波公然叫嚣要同国外的反动势力相勾结。他说：“如果大陆的大学生们和那些追求民主的知识分子们，能在公开支持党内开明派的同时，也公开支援魏京生等人和海外的《中国之春》，肯定会加快中国民主化的进程。”这里所说的《中国之春》，就是受台湾国民党豢养的“中国民联”所主办的反动刊物。很显然，刘晓波的目的就是要把学潮纳入内外勾结的轨道，进而将其进攻矛头引向反对所谓国内的“暴政”上。他煽动说：“暴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暴政的屈服、沉默或赞美”。（见1989年4月号香港《解放月报》）我们看到，首都学潮很快提出了要求为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平反的口号，学生游行队伍中打出了“打倒暴政”的反动标语，这当然不是偶然的。

人们记得，4月26日，在北京学潮面临下一步怎样走的紧急当

口，北京大学三角地贴出了一张题为《致中国大学生的公开信》的大字报。信中为学潮打气说，部分大学生的闹事活动，“已经影响了中国的现在，并必将在更大的程度上影响中国的未来”。并给学潮的组织者出了“巩固已经建立起来的组织联系”，“出版自己的通讯或其他出版物”，“加强与其他社会各界的联系（包括工人、农民、市民和知识分子）”，“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参与”，以及“努力落实校园内的自由”，包括“建立充分自治的各种社团”，“巩固校园内的表达自由（校内民主墙、大字报、学术讲座上的各种辩论会等）”，“随时准备采取从贴大字报到游行、罢课等方式”等七条主意。这些主意的绝大部分都在其后的学潮乃至动乱中被采纳运用了。这封公开信，就是由刘晓波4月22日在纽约起草并伙同“中国民联”头头胡平、陈军等10人签名，在美国报纸发表后迅速传回北京的。

也许刘晓波感到，远隔重洋操纵国内的学潮不够得心应手，于是便接受“中国民联”的派遣，于4月27日匆忙由纽约赶回北京。本来刘晓波向北京师大中文系写信，讲他应哥伦比亚大学邀请去讲学，到1990年才回国。可是5月初信到北师大时，他人早已到了天安门广场了。善良的人们也许会问，他是不是匆匆赶回来参加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呢？绝对不是的。这一点他在《世界日报》一篇文章中说得明明白白：“听到胡耀邦逝世的消息，除了淡漠，我没有其他感觉。”他的突然提前回国，完全是为了直接插手学潮。

据悉刘晓波在回国前，曾与胡平等就北京学潮事做过多次商谈。刘在临行前，陈军特地给北京四通公司打电话告知了刘所乘坐的航班，要求“四通”派车去机场接刘。并说，倘若刘在机场被捕（可见其作贼心虚），一定要把消息及时告知“中国民联”。从这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民联”对于刘晓波的回国插手学潮何等关心备至并且寄予厚望。

另据有关人士透露，刘晓波回京后，立即与“高自联”的头头、

刘的好友吾尔开希以及王丹等人接上头，并向他们和“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转交了他与王炳章（原反动组织“中国民联”头头、新组建的中国民主党党魁）等人所“捐赠”的数千美元和万余元人民币，作为学潮活动经费。其后，刘晓波在天安门广场积极参与了“高自联”指挥部宣传、撰稿、讲演、募捐等活动。他除负责“广场之声”的组稿、编辑，多次发表对学潮形势的演讲以外，还负责非法组织“首都各界联合会”的筹建工作。当广场绝食学生中有人表示要退出绝食时，刘晓波还恶狠狠威胁说：“你现在一走就是叛徒，我们现在没有别的后路可走！”

在这段时间里，刘晓波十分忙碌。他起草并散发了《致北师大党委的公开信》、《告海外华人以及一切关心中国问题的外国人士书》等等，继续扰乱视听，极尽蛊惑人心之能事。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以后，刘晓波更加紧了他的罪恶活动。5月23日，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在动乱中心天安门广场，出现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建议》的反动传单。这份传单一时甚嚣尘上，被某些人奉为“指导学潮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传单把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合法政府诬蔑为“伪政府”，发出了“伪政府必须辞职，李鹏必须下台”的叫嚣，把北京市部分地区戒严歪曲为“军管”，煽动“全社会的总动员”，以求“瓦解军管”，鼓动“国营企业的工人们”成立“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自治会”；煽惑“民办企业”要公开提出“企业的完全私有化”，以使“产权明确为私人所有”；他还肆意挑拨国内“八个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的多党合作关系，妄图煽动它们脱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计划地公开地明确地向政府提出独立的参政要求，进一步成为真正的具有独立权利的民主党派”。现已查明，这份以非法组织“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的名义抛出来的旨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宣言书，根本不是师大学生写的，而是出自刘晓波的手笔。由此可见刘晓

波这只黑手同北京这次学潮及动乱的关系是何等地密切。

随着事情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动乱的实质,许多大学生从天安门广场撤退出来,大量外地学生返回本校,北京市民和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关系日益融洽,形势在向好的方面发展。但是一小撮幕后策划和操纵者不甘心就此收兵,社会上的地痞流氓和一切反动势力也不愿事态就此平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制度反人民之心不死,还要进行拼死的较量。在这样的形势下,刘晓波气急败坏地从后面跳到了前台。他在煽动大学生继续绝食和组织1000至5000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绝食之举流产以后,便亲自出马纠合了四通公司的两名职工,找上一位词曲作家,大喊大叫地来到天安门广场,搞所谓48—72小时的有限度绝食。他们不仅用这样的实际行动来煽动一部分学生和市民在天安门广场长期闹下去,扩大事态,为这场动乱打强心针。而且借机发出了暴乱的呼喊。在6月1日的演讲中,刘晓波就别有用心地说什么:“我希望通过我们的这次行动,结束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的只动口不动手的软骨症!”要他的信徒们丢掉“软骨症”,放弃“只动口不动手”的积习。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刘晓波自己的话说得清清楚楚。在这篇演说的最后,他叫嚷:“……今天在白色恐怖下,我们之所以站起来,是重新唤起全北京市民的信心。我们有能力、有信心主宰中国!”怎样“动手”以“主宰中国”呢?据香港某报发表的、他在6月2日与“一位大陆民运领袖”的对话中说,我们就“必须在人民之中组织武装部队”。如果善良的好心人对他们要组织反革命暴乱的阴谋还有怀疑的话,那就请听一听刘晓波这段“对话”吧。

历史是不以反动派的意志为转移的。刘晓波之流“主宰中国”的呼喊,不过是一场空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中国这片土地的主人。

(原载1989年6月24日《北京日报》)

动乱“精英”严家其

李 建 生

一些自命为知识界“精英”其实是中国知识分子败类的人物，在北京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中，担当了策划者、煽动者和组织者、指挥者的角色。严家其是其中一个主要代表人物。

(一)

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看来，严家其是“学术精英”。实际上，十年前他就是一个热衷于街头政治和非法活动的怀有政治野心的人。那个时候，他忙于同北京与外地的一些非法组织如“启蒙社”、“振兴社”、非法刊物如《四五报》以及它们的头头密切联系，参加会议，出谋划策，解囊相助。他自己还直接参与“西单墙”下的各种活动，成为鼓吹西方“民主”、“自由”的活跃分子。他就是从这里开始他的政治生涯的。

“西单墙”和非法组织被取缔后，严家其着手“研究”政治学。研究的“成果”主要是三本书：一本是由大小字报和各种谣言、传闻拼凑起来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本是宣扬资产阶级政治观的《首脑论》，还有一本是自我吹嘘、自我标榜的《思想自传》。他的基本政治观点，是主张中国实行不要共产党领导的“三权分立”、“权力制衡”，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封闭的思想体系”，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就是“保卫中国封建文化”。总之，是要取消四项基本

原则，在中国推销美国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他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一些人密切配合，互相呼应，成为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正因为如此，他被海内外一些人捧为“新型政治学家”、“政治精英”、“政治体制改革理论权威”和“民主斗士”、“自由派知识分子代表”、“当代世界名人”等等，名噪一时。他还频繁“出访”一些西方大国，颇受某些西方政治首脑的青睐，心甘情愿地充当西方资产阶级在中国的一个代言人。他被赵紫阳同志和鲍彤看中，是不奇怪的。1986年秋，他们将严家其调到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担任要职。鲍彤还打电话通知中国社会科学院，一要保留严家其的政治学所所长职务，二要派车保证他的活动需要。严家其从此成了被称为赵紫阳智囊班子的重要成员。

1987年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开始后，严家其受到有关部门的审查。但是，严家其立即向鲍彤求援，向他写信为自己的错误辩解。3月20日，鲍彤以中央政体改研讨小组办公室名义向赵紫阳写报告，说审查中提出的严家其的错误事实是“误解”、“以讹传讹”，称赞严家其“是守纪律的”，要他继续留在政体改研讨小组“照常工作”。赵紫阳同志立即表示同意，并批示有关负责同志“阅知”。这样，严家其就被包庇了下来。

(二)

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以后，面对党内外强烈批评，赵紫阳同志不仅不检查自己的错误，反而消极对待中央的治理整顿方针。在这之后，那个被称为智囊团里的人物透露，要刮起一阵“倒邓保赵”风，并由海外一些反动报刊透底，鼓噪只有“邓小平完全退休”，由赵紫阳“独裁改革”，“中国才有希望”。

这是一个政治信号。严家其，这个一头连着鲍彤、一头连着海

外国反共反华势力的人物，在“倒邓保赵”风中最引人注目的行动，是和温元凯发表《关于时局的对话》。这篇对话由后来在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中颇为活跃的《经济学周报》一位记者整理，几乎同时在《经济学周报》和一些香港报刊刊出，《世界经济导报》也发表了内容大体相同的消息。对话的要害，仍然可以用“倒邓保赵”概括。用他们的话来说，中央治理整顿的方针是“倒退”，党内外对赵紫阳的错误的批评使“改革成果面临断送”的“危险”，如果赵紫阳下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就会出现“停滞”，因此要反对“非程序的权力更迭”。这“非程序”三个字很费了一番心机，值得特别注意。这已经不再有任何学术气味，完全是一种赤裸裸的政治动员。

与此同时，他向人们推荐了一套所谓“程序”。去年11月，他在《世界经济导报》发表谈话，要人们放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抵制精神污染的斗争，把腐败的根源归结到公有制上，要求“积极发展私有制”，并从苏共历史谈起，提出“撤销政治局”，建立一种所谓华盛顿式的程序。今年2月，他又在日本提出“必须废除中共中央政治局”。总之，他追求和宣扬的是取消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地位的西方政治体制。他还在今年某青年刊物第2期上发表谈话，鼓吹按他那套“程序”修改我国宪法，规定国家政权如何组成，由谁来掌握国家政权。如果不遵循他的这套“程序”呢？他说“只有通过非程序的方式来表达，比如诉诸暴力或动乱”！请注意，严家其已经由反对“非程序”走到鼓动非程序。他的这些活动，同方励之等人的“新启蒙沙龙”，陈军等人的签名上书，戈扬等人的演说，李淑娴、王丹等人主持的集会，以及北京一些大学里直接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小字报一起，给动乱作了直接的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

4月15日胡耀邦同志逝世后，极少数人立即乘机利用学潮制造动乱。游行、静坐和冲击新华门的活动中出现了大量政治口号，

最核心的两条就是要为胡耀邦同志“平反”和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严家其正是紧紧抓住了这两条出谋划策，进行煽动。

4月19日，《世界经济导报》和《新观察》在北京召集一些人物座谈，不少人把攻击矛头直指中央。严家其发言说：“对天安门广场上只要去看一看，就知道无非是要对耀邦作出公正的评价，要对1986年的某些运动作出公正的评价”，“在天安门广场上面，我就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他不仅画龙点睛地概括出两个实质性口号，使之成为动乱初期的行动纲领，并直接为非法游行叫好，给动乱煽风点火。

4月21日，在鲍彤的授意下，他和包遵信贴出《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公开信》，要中央承认游行、静坐中提出的要求都是“积极”的“民主要求”，向中央施加压力。包遵信后来对香港《百姓》杂志的记者说，这封信“对学生的鼓舞很大”。

4月26日人民日报重要社论发表后，上海市委按中央精神作出了整顿《世界经济导报》的决定。但是，遭到赵紫阳同志的非难。赵紫阳5月4日发表“亚行讲话”，5月6日指示要进一步加强对学生潮报道的“公开程度”，5月16日在会见戈尔巴乔夫的谈话中又把矛头引向邓小平同志。在这一阶段，严家其依据赵紫阳讲话的精神，集中攻击4·26社论和上海市委决定，集中攻击邓小平同志，策划动乱的不断升级。

4月27日大游行的当晚，严家其说：这次游行“是我们的一个胜利”。

4月28日，他起草并散发了由他和其他一些人署名的公开信《捍卫新闻自由》，攻击上海市委处理《导报》的决定，煽动新闻界进行声援活动和请愿集会。

“亚行讲话”一发表，严家其说“现在出现了转机”，立即提出要“发动知识界支持赵紫阳”。随后，他与苏绍智等一伙人贴出《我们

再也不能沉默了》的大字报，动员知识界人士起来游行。

5月14日，严家其同其他共12人发出《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要中央公开宣布整个学潮“是爱国民主运动”，承认“北高联”为“合法组织”，威胁党和政府不得对学生绝食采取强制措施，否则“将成为历史罪人”。这一“呼吁”由严家其定稿后，先在天安门广场宣读，又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然后在15日的《光明日报》发表。《呼吁》提出的要求，立即变成学生的政治要求，并通过舆论工具造成了以绝食学生为人质要挟党和政府的严重局面。

5月15日，他带领一些人搞所谓“中国知识界”的首次游行，并到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说，支持学生继续绝食。

5月16日，他又带头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些人声援绝食学生的游行，并与一些人发表《5·16声明》，再次要党和政府承认“学生自治组织的合法性”，承认4·26社论“是错误的”。

5月17日，他又发起和起草《5·17宣言》，对邓小平同志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说“由于独裁者掌握了无限权力，政府丧失了自己的责任，丧失了人性”，“清王朝已经死亡76年了，但是，中国还有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昨天下午，赵紫阳总书记公开宣布，中国的一切决策，都必须经过这位老朽的独裁者”，叫嚷“老人政治必须结束！独裁者必须辞职！”

严家其的上述活动，上面体现了赵紫阳的意图，下面把黑手伸向学生和知识界，从一个重要侧面反映出这场动乱从酝酿到发动、经过逐步升级达到高潮的基本过程，揭示了动乱的策划者们从舆论准备到组织、煽动和直接出面指挥的基本轨迹。到了《5·17宣言》，他们的反动图谋和动乱的政治实质就和盘托出了。

(三)

5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了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问题，19日李鹏、杨尚昆同志在党政军负责干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20日发布戒严令。赵紫阳同志反对中央的正确决策，公开分裂党，并把同党闹分裂的态度公开暴露在全党全国和全世界面前。与此相配合，动乱的策划组织者更加疯狂地把攻击矛头指向邓小平、李鹏、杨尚昆同志，策动召开人大常委紧急会议，企图废除戒严令，罢免李鹏，组织反对戒严令的大规模游行等活动，使动乱不可避免地走向反革命暴乱。到了这个阶段，严家其不但在煽动方面继续领衔主演，而且跳到前台承担起直接组织者和指挥者的角色，在推动动乱向暴乱的演变中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反革命狂热。

5月19日后，他多次在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组织并主持有苏绍智、王丹、吾尔开希等参加的“北京知识界联合会”和“北京高自联”联席会议，策划对抗戒严令的统一行动。

5月20日，鲍彤看到败局已定，提出“党内已不能解决问题了，只能靠人大”。这一天，严家其对人讲：“李鹏应该打倒，要通过召开全国人大常委紧急会议罢免他。”他还参加了反对戒严的大游行，并与一些人发出《我们知识界的誓言》，声称“绝不出卖自己的良知，绝不向专制屈服，绝不向八十年代中国的末代皇帝称臣”。

5月21日，他和一些人策划组织知识分子联合会，先组织北京的，再走第二步，“总的目标就是李鹏下台”。同一天，他和一伙人致电人大常委会领导人，要求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

5月23日，“北京知识界联合会”正式成立，由包遵信负责统筹。有人说，待全国的知识界联合会成立，就该由严家其负责统筹了。同一天，《北京知识界联合会成立宣言》复印件即在台湾《联合

报》全文发表。《宣言》攻击中央的决策、国务院的戒严令为“倒行逆施”，呼吁“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罢免李鹏案”。当晚他们号召入会者到天安门广场静坐示威，并在天安门广场散发他们编辑的《新闻快讯》，咒骂李鹏同志，要把他“押上历史的断头台”。

5月24日，“天安门广场总指挥部”和“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又宣告成立，通过这一形式，严家其等人组织的“知识界联合会”，同“北京高自联”、“北京市民自治联合会”、“北京工人敢死队”、“北京工人纠察队”、“北京市民敢死队”等正式结成了反革命行动的“神圣同盟”，所谓“文化精英”和社会渣滓完全结合在一起，他们在共同誓词中叫嚷要“不怕流血牺牲”去推翻我国的政府。

5月26日严家其和包遵信在香港报纸发表《告李鹏书》，再次扬言要废除戒严令，“罢免李鹏”。

5月27日，他参加了组织所谓“5000知识精英大绝食”的会议。后来，演出了一场只有刘晓波等4人参加的48小时至72小时的绝食闹剧。

直至6月3日，反革命暴乱发生后，严家其仍在直接指挥。当天傍晚，他一直在建国门立交桥参与和指挥“堵塞军车进城的活动”，10时半才回到家中。11时多，他又赶到天安门广场，参加所谓“民主大学的开学典礼”，并担任“名誉校长”。他发表了20分钟的煽动性演讲，宣称李鹏必须“主动辞职”，否则“必将受到审判”！他还叫嚷要用鲜血和生命来铸造他们的“民主”。

在戒严令发布之后，严家其知道他们大势已去。但是同一切反动分子一样，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于是把动乱“精英”和各种社会渣滓拼凑为一支反动力量，为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拚死一搏。他们是注定要输的。在这输掉老本的一搏中，严家其口口声声标榜的民主、法制、非暴力等堂皇外衣，已被他

们肆意践踏宪法和法律。阴谋推翻人民民主政权的凶残暴行所彻底撕碎，他作为反革命暴乱的一个策划者、组织者和指挥者的面目已暴露无遗。

(四)

反革命暴乱平息后，严家其在国外敌对势力的策划下，带着老婆逃跑了。在国外，他还在咬牙切齿地咒骂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这样很好，好就好在不打自招地供认他不仅是一个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而且是一个背叛祖国的民族败类。

7月4日，严家其和吾尔开希在法国巴黎联名发表所谓《国殇周日宣言》，叫嚷要在国外成立“中国学运民运联合委员会”，在中国大陆制造更大的“风暴”。与此同时，在美国的“中国民联”头子王炳章跑到香港，宣布要成立一个“流亡的中国反对党”，提名“严家其担任这个党的第一任领导人”，“另一个人选”是方励之。这番话，很能表明卖国贼们和国际反共反华势力在严家其身上寄予的希望。7月中旬，严家其又召集一些人在巴黎秘密举行会议，策划成立以反对中国政府为宗旨的所谓“民主中国阵线”，鼓吹推翻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看来，得到海外国外敌对势力支持的严家其们，还要和中国人民继续较量下去。我们一定要彻底平息这场反革命暴乱，同时警惕极少数顽固分子的新的阴谋，随时防止他们捣乱。不过，我们要正告他们：凡是倒行逆施，与中国人民为敌的人，是绝不会有好下场的。他们的阴谋既然在国内已经以失败而告终，那么靠海外国外反动势力支撑继续进行捣乱，是成不了什么气候的。他们终究要失败，中国人民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一定要前进、要胜利，这是历史的必然。

(原载1989年8月3日《人民日报》)

万润南搬起“石头”要砸谁

叶 光

发生在首都的这场反革命暴乱中，暴徒们抛起石头、砖块，疯狂地砸军车，砸解放军，那一幅幅血淋淋的场面，那些骇人听闻的暴行，人们或者身临其境，或者通过电视屏幕，早就看到了，见识了。然而，恐怕谁也难于想到，一个西装笔挺、温文尔雅、腰缠万贯的企业家万润南，也举起了“石头”……

作为四通集团公司总裁的万润南多次说：“我们把四通的英文名字取意为 STONE——石头的意思。”“也许，我们是铺路石；也许，我们是新世纪纪念碑的一块奠基石”。5月21日，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第二天，万润南借非法组织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自治会办的“北京之音广播站”煽动说：政府已经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它就不再是人民的政府，各界人民要动员起来，粉碎戒严，打倒政府……同时重申：四通公司是一个战斗堡垒，就像它的英译名 STONE(石头)一样坚硬。怎样用这个“石头”(STONE)?万润南的得力助手、公司副总裁崔铭山向闹事的学生头头说：“我们几乎每天都去天安门”，“作为四通公司，我们作出的贡献，可以说在北京市排在第一位的。我们是冒着整个公司被政府整掉的危险！”

这就是说，万润南搬起块大石头——“整个公司”砸过来了！

—

对于自己在这场风波中的表现，万润南7月28日在美国芝加

哥的一次集会上做了一番自供，他说：任何国家、地区的企业家都小心翼翼地与政治保持距离，但在这次国内的学潮中，“我们却沾上了，而且涉入很深”。他不无得意地声言：“像‘四通’这样的民办企业和个体户，是最积极支持这个运动的一分子！”

然而，学潮之初，万润南还需要有一个掩人耳目的假象。当时四通公司还有过职工不得占用工作时间参加学潮活动的规定。实际的情况怎样呢？崔铭山就曾对天安门广场上闹事学生的头头说过：“从你们走上天安门广场那一天开始，每一分钟，每一秒钟，我们都监测着全国各阶层的反映，监测着全世界的反映。我们了解的情况比你们要全面一些，我们所作的判断，比你们要冷静一些。”四通公司综合计划部部长、公共关系部副部长周舵整天不上班，和闹事的学生搞在一起。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万润南直截了当地说：“是我派去的。”

那么，这个期间他们干了些什么呢？

香港《明报》6月28日登了篇专讯，称“四通”为“海外支持北京学运管道”。文章说：“4月下旬大陆学潮风卷云涌，四通公司成为海外与大陆学生沟通的管道之一。”作为海内外反动势力沟通的一条管道，万润南和四通公司极少数人确实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以学潮黑手自居的刘晓波，4月22日在纽约伙同反动组织“中国民联”的头头胡平、陈军等，搞了份10人签名的《致中国大学生的公开信》，为学潮打气加油，出谋划策。事隔4天，4月26日早9时半，这份由刘晓波执笔的“公开信”，就张贴在北京大学的三角地了。这一代表国外反动势力为动乱所作的谋划，就是先从美国传真到四通公司，再从四通公司转递出去的。而担任“信使”的，正是前面提到的受万润南指派插手学潮的周舵。

刘晓波受“中国民联”派遣回北京直接参与动乱，也是这个周舵同“四通”另两名工作人员去首都机场迎接的。刘上飞机后，他

在纽约下榻处的“房东”、“中国民联”头头胡平的老婆便打电话到北京，告知刘可能下不了飞机、出不了机场即被拘捕等等。刘到京次日，胡平老婆的查询电话，又打到了“四通”。刘晓波到北京后，便成了“四通”的常客。他多次拜访万润南，进行密谈。6月1日中午，即在刘晓波发起的4人有限绝食闹剧的前一天，他还同吾尔开希一起到四通公司拜会了万润南，双方晤谈了一个中午。

4月27日，周舵从机场接回刘晓波之后，4月30日，他又以《世界经济导报》和《亚太经济时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参加了《亚太经济时报》两名记者串连召开的“五四精神与时局”座谈会，参与起草了为钦本立鸣不平的请愿书，5月3日他们再次聚会通过了请愿书，并议定5月4日策动新闻界“集体围观”学生游行。5月4日12时，一些新闻单位的200来人在新华社前集合后，到民族宫前“集体围观”近两小时，有人打出了事先准备好的游行横标，队伍便卷进了学生游行的行列，并由此打开了社会参加动乱行动的缺口。这是事先策划好的预谋，香港报纸当天早上便预报了1000名记者要参加游行的消息。周舵集合时迟到，硬是追到西单、天安门，赶上队伍，自称“欣然”参加了游行。这以后，他卖力地参与文化界、知识界、新闻界、学生界的一系列活动；他多次参加“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两次代该会起草“告人民书”；他领着海外来“客”去“四通”购买通讯器材支援闹事的学生；他被王军涛（《北京之春》头头、《经济学周报》副主编、民办“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负责人）指定为海外捐款的3位财务监督人之一……作为受命于万润南的“特派员”，应该说，周舵干的相当出色。

万润南的一位得力助手曾经说：现在社会上盛传，我们“四通”是学运的后勤部、参谋部和指挥部。这些评价，万润南是当之无愧的。

7月30日香港《明报》刊登了该报记者芝加哥28日专电，报

道了万润南的一次讲话。万说：“争取民主是开销很大的，在广场上每天开支起码要4万元人民币。当然海外筹集了许多资金，但大部分未能进入大陆。”靠什么呢？“美国之音”7月30日播出的万润南讲话中，万自己作了回答：“广场上的学生主要是靠北京市民、北京的民营经济像‘四通’这样的公司，以及北京的个体户的资助。”公开地亮明了学潮“后勤部长”的身份。

“四通”的一位副总裁曾对学潮头头透露：“四通”支援了20多万元。除了大批直接送到“高自联”等非法组织的食品、饮料、药物，还提供了一批供反革命宣传煽动用的器材，如无线电话、高音喇叭、电讲仪等等。天安门广场“高自联”指挥中心那部为动乱立下了汗马功劳的高效率的造谣机器，就是“四通”供给的！

除了“四通”自己的资金，还有“许多海外金钱的支援通过四通公司源源流入天安门广场”（香港《明报》6月28日）。4月下旬以后，海外反动势力就利用“四通”向非法组织“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筹委会”、“高自联”等，陆续提供了油印机、打字机、复印机、微型收录机以及传真机等多台。充当联络员和提货人的，是王丹的一位挚友、北大民主沙龙的积极参与者。

“援助”是有条件的。“四通”下边有个鹭岛公司，该公司又下精一个华成托运服务公司。这个公司的头头就曾直接从天安门广场找来一名“工自联”常委和几名闹事的学生头头，当场付给1.8万元现金，一部无线电话，派给一辆解放牌卡车，并应允代印传单等等。条件只有一个：支持党内“改革派”，反对党内“保守派”，倒李（鹏）保赵（紫阳）。他毫不掩饰地说：“我就是想用自己的观点去影响广大学生。”

前边提到的那位从“四通”提取美国“资助”的“高自联”提货人，还借助“四通”的通讯条件，多次向海外汇报北京学潮情况及下一步打算，并接受指令。5月初，高校纷纷复课、学潮面对难题的时

候，在美国的一位提供“援助”的神秘人物就曾在电话中指示说，一、要坚持学生组织合法化的要求，这是当务之急。二、除了要求恢复钦本立《世界经济导报》的职务外，还可要求江泽民、李锡铭下台。三、要把学生办的《新闻导报》坚持办下去。

海外的反动势力远隔重洋的指挥，就这样通过万润南主持的“通道”不断下达。

二

5月20日，在首都局势越来越严重，许多地方已陷入一片混乱和白色恐怖的情况下，国务院断然决定，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

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动乱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们感到极大的恐慌。他们明白，一旦戒严实施，部队进城，动乱被制止，社会秩序恢复正常，他们设想的从北京乱起，搞乱全国，借动乱搞垮国家政权的预谋，就将完全破灭。于是，反对戒严，阻止部队进城，搞垮政府，便成了他们当时行动的总纲领、总目标。他们要“进行决死的斗争”（自称“体改委”一批人5月19日在天安门广场的演说）了。

面对这种形势，万润南及其得力助手们感到不能再待在后台了。“与其束手待毙，不如拚死一搏！”

——正像他的一位得力助手描述的那样，他跳到前台，赤膊上阵，举起“石头”——STONE，“拚死一搏”了。

5月21日，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第二天，他先召集北大等校的4个学生头头商谈，再次派助手去天安门广场“调查”之后，召开了“四通”全体干部大会，郑重其事地宣布他要亲自介入学潮，并提醒说：“我介入就是四通公司介入了！”面对员工们的疑惑，他交底说：“上边支持我们这样做！”有了“上边”的授意，万润南不顾

“四通”广大员工的意愿，决心破釜沉舟地孤注一掷。

万润南的一位得力助手曾描述当时他们的心情：“如果能劝说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撤走，赵紫阳也许还能复出。”于是，一个以学生撤退为筹码，逼迫政府取消戒严、逼迫邓小平、杨尚昆、李鹏下台，保赵紫阳复出的策略形成了。这是万润南下的第一着棋。

从5月21日至23日短短3天里，万润南不仅两次召开四通公司干部大会，5次与“高自联”的头头王丹等人个别接触谈话，还两次召集天安门广场闹事的学生头头开会、商谈。

5月22日下午4时许，万润南派人派车直接从天安门广场召来了首都和外埠近80所高等院校的近百名静坐学生头头。来到国际饭店彩虹中餐厅之后，万润南谢绝饭店服务人员任何服务，关起门来，以大老板身份挥舞起了指挥棒。他首先肯定学生们的行动“已经取得了很大胜利，作出了很大贡献。”接着打气说：“如果把你们的行动比作一部作品，那将会是一部杰作。这部杰作的上篇和中篇已经写完了。如果写好下篇，写好结尾，那就更加杰出伟大了。”

怎样才能“写好下篇”？万润南出主意说：“你们应该不失时机地撤离广场，主动地撤回学校，坚持校园斗争。”他特别强调：“这样，就会受到整个社会的赞扬，更有利于下一步的斗争。”“下一步”是什么？他意味深长地说：“你们知道，军队进京意味着什么吗？如果学生回学校了，就使得外边的部队进京的理由少了一分……那时候你部队进来，要干什么？”他亮出底牌说：“撤退，我们是有前提的，是有要求的。”“第一条，就是军队回去，你们回校；第二条，取消戒严，秩序正常；第三条，李鹏下台，邓小平、杨尚昆等老人按程序光荣退休；第四条，拥护赵紫阳同志。”他还特别强调这最后一条“很重要”。

在这次国际饭店会议上，万润南俨然以一个“指挥官”的身份，

做出了具体安排：“你们首先开新闻发布会，向中外记者亮明观点。其次，撤离广场时，可以举行‘凯旋在子夜’的大活动，大进军。”他还着重地说：“是进军，是为了新的目的才回学校。”

5月23日，万润南一边派车去天安门广场接昨天到会的学生头头到“四通”饭店继续开会，协商通过由“四通”副总裁曹务奇代行起草的所谓撤离《倡议书》；一边把首都新闻界近20名记者邀请到四通公司，企图通过他们造成舆论压力，迫使政府按照万润南们的意愿行事。

然而，绞尽脑汁策划的《倡议书》，尽管在最后成文时删去了一些露骨的反动内容，终因戒严令已经颁布，报纸未能刊登；他们精心筹办的所谓“凯旋在子夜”的示威活动，自然也成了泡影。

万润南不只有这一着棋，为了推翻合法政府，他还有另一着棋正在同时进行。这就是迫使人大常委召开紧急会议，进而召开人大特别会议，撤销戒严，罢免总理。

5月20日以后，动乱的策划者和组织者深感从党内解决问题已经没有多大可能了，便把希望转寄到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紧急会议上。严家其、包遵信等先是致电人大常委会领导人，攻击国务院按宪法授予的权力在北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胡说“目前宪法受到极少数人的粗暴践踏”，因而“紧急建议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解决当前面临的严重问题”；随即又在香港《明报》上，抛出《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当前中国的问题——并告李鹏书》一文，叫喊“每一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每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投下神圣的一票，废除戒严令，罢免李鹏总理职务”。

与此相策应、相配合，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在万润南的直接支持和指挥下，立即行动起来，策划征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签名的非法活动。

5月20日，宣布戒严的第一天，万润南就找该所所长曹思源商

谈，面授机宜。5月21日一早曹思源口授起草了一封《提议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的短信，派该所办公室主任中午送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胡绩伟家，胡略作修改后第一个签名。下午，该所所有人员一起出动，有的登门拜访，有的电话征询。有些人大常委委员对四通研究所插手有怀疑，拒绝签名，胡绩伟委员便给加上了个“由我委托你们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进行”的名义。

尽管征集签名信隐去了他们取消戒严、打倒李鹏的真实目的，但是直到23日，签名的人大常委委员仍然不多。于是，曹思源便把在戒严以前表示过要求召开人大常委会议而没有在征集信上签名的人大常委委员名单拉进来，还把几位没有同意签名的人大常委委员也擅自列入，拼凑了个50多人的名单。胡绩伟提议将“征求”的结果交香港《文汇报》发表，曹思源便多次给香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主任刘锐绍通电话联系，商议发稿事宜。

5月25日，香港《文汇报》在头版头条位置以“人大常委57人上书要求召开常委紧急会议”的通栏大字标题，发表了综合消息，并强调指出：“据悉，紧急会议的重点包括罢免李鹏。”

其后，知悉香港《文汇报》这条消息的一些人大常委委员，纷纷辟谣，并提出了严正抗议。“四通”内部也议论纷纷，许多员工表示怀疑和不满，插手签名活动的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也乱了阵脚。针对这个情况，5月31日晚，万润南紧急召开了四通公司全体职工大会，会上，万态度强硬地重申：“四通研究所就是四通集团公司的！”并就5月30日部分人大常委委员的指责，发表了3点意见：“一是血要热，二是头脑要冷，三是骨头要硬。”公开为他的同伙撑腰打气，要他们站稳反动立场，与党和政府顽固对抗到底。

三

无可奈何花落去。

发生在首都的这场反革命暴乱，在党的领导、人民的支持、戒严部队官兵和武警、公安干警的共同努力下，被平息了。万润南的美梦破灭了，孤注一掷的挣扎失败了。他躲过公安部门的缉拿，和海外反动势力相勾结，6月初私逃出了国境。

到了国外，在洋主人的卵翼下，再也没有必要继续伪装，万润南便赤裸裸地坦露出他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真实面目来了。为了实现他们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既定目标，万润南到了资本主义的“自由世界”，立刻和海外反动势力、新近叛逃国外及先期出国的“政治精英”们勾结起来，沆瀣一气，公开亮出旗帜，开始了他们反革命活动的新阶段。

7月，趁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纪念活动的契机，万润南和通缉犯吾尔开希、严家其以及苏绍智、刘宾雁等麇集巴黎，又是参加所谓“民主女神”像揭幕式，又是筹建“民主中国阵线”，万润南还被推为这个新的反动组织的秘书长。事实表明，万润南是横下一条心，要和人民作对到底了。

走到这一步，决非偶然。“四通”公司本来是以高科技开发为己任的，万润南也借此换来了巨大荣誉。然而，万润南本人早就声明过，他办“四通”并非着眼科技和经济，他要搞政治。5月30日，动乱高潮之际，万接见香港亚洲电视台记者谈话时就明确地说：“政治民主要有强大的经济基础。社会稳定要有一批中产阶级。”所谓“中产阶级”，正是他们心目中的资产阶级。如何使“中产阶级”大量涌现？万润南叛逃国外后，点得更透了：关键在解决“产权关系问题”，“就是财产所有权的问题，必须要有明确的界定”。说

白了，就是要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呼唤资本主义私有制。

而要解决所有制问题，用万润南自己的话讲：“这已经超出经济改革的领域，变成一个政治改革的问题。”同时，“活跃的经济势力必然会有它的政治代表”。万润南除了自己充当这样的“政治代表”以外，还组织了一个专门班子探讨、推行他的政治主张，这就是由曹思源牵头的“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该所从开张之日起，就把引进西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和修改宪法作为自己的重要课题。

今年3月26日，该所和《世界经济导报》、《新观察》等单位联合举办了一次“修改宪法理论研讨会”，曹思源在开幕词中就明确提出要把毛泽东、孙中山等人的名字统统从宪法中勾去，否则他“感到羞愧”。有人则挖苦“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由一个阶级、一党一派、一个人的权力来‘决定一切’”。这次会议严格谢绝外人进入，然而，英国《卫报》记者还是作了报道说：“这次4小时会议的参加者们要求删除宪法中任何提及毛泽东思想和‘四项基本原则’的文字。”

一个实现私有化，让一批所谓“中产阶级”占主导地位；一个取消四项基本原则，实现所谓“议会民主”——这就是万润南所梦寐以求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蓝图。这，当然是一枕黄粱！

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空的阴霾终于被廓清了。万润南带着破碎的梦逃到了国外。四通公司广大员工看清了万润南及其亲信策动、支持和参与动乱，与人民为敌的反动面目，最近四通集团公司、四通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已撤销万润南在公司的一切职务，将其开除出公司。至此，万润南搬起石头终于只能砸在自己的脚上。

（原载1989年8月17日《人民日报》）

吾尔开希真面目

石 青

北京发生学潮和动乱以后，吾尔开希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了新闻人物，西方一些记者追踪采访，有的还吹捧他为“学运领袖”“民主英雄”。一个一年级大学生何以受到海外资产阶级传播媒介的如此垂青？主要是因为他在今年四月中旬以后的这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中，作为组织者与策划者进行了拙劣的表演。如今吾尔开希已叛逃国外，充分暴露了他的可耻面目。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个所谓“民主英雄”“学运领袖”究竟是个什么货色。

一

吾尔开希最初煽动学潮，并非像他自己标榜的什么“反腐败”或“忧患中国教育的危机”，相反，他自己倒真正面临两种危机：一是入学不到一年，他就有三门功课不及格（生理学42分，数学52分，外语57分）面临被勒令退学的危险；二是他倒卖皮毛亏了7000元，债台高筑。这两个危机搅得他惶惶不可终日。当老师问他下一步怎么办时，他闪烁其词，一会儿说“学不下去就退学”，一会又说不能这么回去还要“挺一下”。直到他与同伙挑起动乱，本人也登上高自联主席的“宝座”，他似乎还余悸未消，在宿舍里说：“这次干好了就好了，就是回去也荣耀。”

接触过吾尔开希的人也不难了解，此人虽专业知识、历史知

识、理论水平极差，但他那种强烈的权力欲和自我表现欲却非他人所能比。进入北师大后，他曾两次争当系、校学生会干部，均因他平时经常旷课、私自倒卖引起斗殴、学习成绩太差等被否决，为此，他曾找到系领导质问“我怎么就不能当干部”。他自封为“自治会主席”，无疑是这种权力欲的一种满足。有一次，一高年级学生进入他的宿舍，他很得意地对这个同学说：“你信不信，我叫他们（指宿舍里的同学）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随即他叫一个正躺在床上同学“×××站起来”，那个同学“腾”地站起来，他又说“坐下”，那个同学又坐下。

当然，吾尔开希是不满足这些“小打小闹”的，随着动乱事态的发展，他头脑中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恶性膨胀起来，一出拙劣的表演使他逐步走向反动，并因此而成为名噪一时的“乱世英雄”。

二

吾尔开希第一次在北京大学生面前亮相是4月19日，他率领一些人冲击新华门。为把事情弄大，他在静坐的学生前面不停地演讲，煽动大家“不要离开”，“要静坐到天亮，天一亮就有北大学生来支援我们了”。他面对阻拦他们的非法行为的武警破口大骂：“你们是狗，政府的狗！”在新华门前被驱散返校之后，他开始大造“4·20血案”的谣言，说自己身上挨了打，鼓动同学上街游行。但当同学问他哪儿挨打时，他却说不清，也不肯脱掉上衣让大家看。

之后，他便更加兴风作浪，组织和策划这场动乱与暴乱，请看下面事实：4月21日，由他挑头成立了非法的“北大学生自治会”，自任主席后第一件事便是宣布废除合法的学生会和研究生会，要求各系学生会“交权”。

接着他又当了以悼念胡耀邦同志为名义的4月21日晚开始的大游行及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的直接指挥者。这次静坐他再次使用了造谣的看家本领，他拿着手提扩音器向在场同学们宣布：“（人民大会堂）里边传过话来，李鹏总理12点出来与我们见面对话，请大家耐心等待。”结果，引得几万学生翘首盼望。到了12点45分，他又鼓动说：李鹏欺骗了我们！随即领着学生们向人民大会堂冲击。

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的发表着实使吾尔开希乱了一阵手脚，然而等到5月27日，“黑手”刘晓波由美国返京，在他的引导下，吾尔开希直接与动乱的幕后策划者严家其、万润南等接上线以后，他便象一个泄了气的皮球又被充足气，重新蹦跶起来。

刘晓波回京立即向他转交了反动组织“中国民联”头头王炳章等人所“捐赠”的数千美元和万余元人民币。刘晓波等人不断向吾尔开希面授机宜，介绍动乱策划者们的理论观点和政治纲领，使得吾尔开希“大开眼界”。他曾私下对人说：“现在我的理论水平大有长进。”

让我们看看吾尔开希的“长进”吧：5月14日，在与法国《费加罗报》记者谈话时说：“政府是一个由坏蛋和腐败分子组成的帮……党和政府是一回事，要反对政府就必定要反对党。”坚持党的领导 and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目前不安定团结的最大政治因素”。他还明确表示，一定要逼迫党和政府承认“高自联”的合法性，在中国建立起政治上的反对派。

在回答西方记者提问时，他称“民主就是大多数人能按自己的选择去行动”。可在5月18日，在与李鹏总理对话时，他又说：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学生不是1%服从99%，而是99%服从1%。应该说这一阶段吾尔开希确有“长进”，他的反动手腕越耍越滑，制造动乱的胆子也越来越大。5月13日，吾尔开希和动乱的制造者们煽动学生进行“绝食”，妄图逼迫党和政府让步。5月18日，在与李鹏

总理的对话会上，吾尔开希提出两点要求：承认动乱是爱国民主运动，承认“高自联”为合法组织。并要挟：满足了上面两条要求，才可以尽量说服同学将绝食改为静坐。也就是说即使政府在原则问题上让了步，他们也没有打算撤出天安门广场，而且还要继续搞下去。在回答法国记者问时，吾尔开希毫不掩饰地说：我们的要求远远多于现在提出的三、四个条件，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要求，我们必须逐步前进。

5月20日，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后，吾尔开希多次到社会科学院政治所去参加严家其、苏绍智和王丹等人组织的“北京知识界联合会”和“北京高自联”的联席会，策划对抗戒严令的统一行动。他们派出人四出堵截军车，破坏戒严令的实行。他还通过一些渠道与掌握党和国家机密的人取得联系，为反革命夺权和反革命暴乱制造舆论。5月21日，他在北师大的一次演说中鼓动：“再坚持三天，一个光明的、从未有过的政府就会诞生。”

在24日以后的几天中，由于党和政府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北京局势趋于缓和，戒严部队与北京市民关系日益融洽，天安门广场静坐的学生越来越少。这使吾尔开希和他的同伙们深感不安，于是他们便下定决心作最后的挣扎。6月1日，吾尔开希对市民广播说，“天安门广场旗帜依然飘扬，有400多所学校（在那里），我们没有理由中途退出”。同日，他与刘晓波、万润南晤谈一中午，对下一步行动作了策划，导演了一场4人绝食的闹剧。

6月3日，面临灭顶之灾的动乱头头酝酿着最后的顽抗。这天晚上9点30分，吾尔开希在北师大自治会广播台作了他在叛逃前最后一次“表演”。他在演讲中煽动说，现在是考验每个共和国公民的时候，每个人在今天晚上都必须做出郑重选择。我呼吁大家今天晚上到天安门广场去！他大言不惭地说：“我今天下午在天安门广场向全国颁发了紧急动员令。”一些同学在他的煽动下到西单

路口去参与堵截军车，其中少数人付出了血与生命的代价。他们当然不会知道，他们遵照“领袖”的号召去“冲锋陷阵”，可“领袖”却早已溜之大吉。

三

溜出中国大陆，吾尔开希等人便一头扎进了国际反共和反华势力的怀抱。为迎合国际反华势力的需要，吾尔开希在国外各种场合继续编造谎言。在接受“美国之音”一次采访中，他又重弹“血洗天安门”的老调，说什么天安门广场死了三千多人，整个北京死了几万人，还说什么“天安门广场上‘高自联’的纠察队员几乎全部都被打死了”。在此之前接受法新社记者的采访中，他煞有介事地说，亲眼目睹了解放军屠杀一批又一批大学生。

吾尔开希等人继续做着有朝一日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推翻社会主义政府的美梦。7月，他与其他反革命暴乱的在逃通缉犯一起，参加了所谓“民主女神”揭幕仪式，他在法国、美国，宣称“有一天要将自由女神像竖立在天安门广场”。在美国他明目张胆地叫嚣，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国的坚持社会主义的政府，建立起资产阶级的“自由”的社会制度。

既要反共和反社会主义，就不能不向国际反动势力摇尾乞怜。七月底，吾尔开希在台湾人吴英毅的搓合下，与台湾反动势力头目、中国国民党海外工作委员会主任郑心雄握手言欢，合影留念，以求“可靠又独立的经济来源”。在拜见几位反华的美国国会议员时，他竟无耻地建议美国和其他反华势力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八月一日，他又跑到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前进行挑衅，拿着手提式扩音器跳着脚地进行谩骂。吾尔开希预言，他们的“民主运动”要在“三年内取得胜利”……

然而，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历史绝不会按照反动势力的意愿去发展。吾尔开希及其同伙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错误地估计了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力量。随着这场反革命动乱和暴乱的真相日益大白于天下，不仅广大中国人民和广大青年学生看穿了他们的丑恶嘴脸，国际社会也越来越对他们采取鄙弃和疏远的作法。一些法国知名人士早在七月份就提出，法国政府接纳吾尔开希等人是“上了美国人的当”，七月十八日吾尔开希、严家其等人在巴黎召开记者招待会时竟然无人充当其翻译，使招待会不欢而散。在美国，吾尔开希等虽受到一些国会议员们的支持，在白宫前却吃了闭门羹。不仅布什总统不予理睬，就连原来应见的奎尔副总统的接见也化为泡影。

眼下，吾尔开希在西方反华反共情报机构的庇护下，正在国外阴暗的角落里做着妄图推翻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黄粱美梦，但同所有历史上的跳梁小丑一样，他们终究逃脱不了可耻的下场！

（原载1989年8月29日《中国教育报》）

动乱“记者”戴晴

邝 岩

今年春夏之交，发生在首都的由学潮到动乱到反革命暴乱中，有一员活跃于新闻界、知识界和高校学生之中的“能干的女将”。她上窜下跳，牵线搭桥，呐喊助威，煽风加油，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作了充分的表演。她就是光明日报记者戴晴。

(一)

看过电视片《血与火的考验》的人，大约还记得其中这样的镜头吧：5月14日晚，当北京高校的一些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的绝食进入第二天的时候，严家其、包遵信、李洪林、于浩成、苏晓康等一伙知识界“精英”来到学生中间，为绝食学生助威打气。出面把这些人纠集到一起的就是戴晴。你瞧，她手持电喇叭，绘声绘色地极力鼓噪，说什么“自4月15日到今天，同学们冒着生命危险所取得的成果非常大，我觉得非常大，如果没有你们（从4月15日到今天的活动，我们决不会有今天的这种局面。”什么局面，当然是动乱的局面。对这种局面，戴晴显然是极力赞赏的。她还说：“一定要让（政府）向同学们让一步！”怎么让步，就是严家其等12人在这天下午炮制的《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中所提出的要承认这次动乱是爱国民主运动，要承认“高自联”等非法的学生组织是合法的。他们提出，如果政府不承认这两条，他们将同绝食学生一起“坚定不移

地奋斗下去”。尽管戴晴在此也说了一些希望学生撤离天安门广场之类的话，但有了上面这两条作为前提条件，他们的真正用心不就昭然若揭了么？邓小平同志早在1987年3月3日就明确指出：“少数知识分子煽动学生闹事，他们的主张实际上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戴晴等人煽动动乱，其意亦在此。后来的事实也恰恰证明了他们的《紧急呼吁》确实是在为动乱火上浇油。

如果五月十四号戴晴在天安门广场的这番表演算作一个高潮的话，那么，她在这之前的一系列表演就已经为这次出场作好了铺垫。

(二)

早在今年2月16日，反动组织“中国民联”的成员陈军曾举行过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广为散发方励之致邓小平的信，以及陈军等33人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共中央的信，要求实行大赦，释放严重触犯刑律的魏京生等所谓的“政治犯”。2月17日，海外一些人在美国发表《敦促中国大陆民主改革宣言》，其中包括释放“政治犯”、删除刑法中“反革命罪”的条文。对此，台湾《联合报》大肆鼓劲，该报2月23日发表文章说：“纽约发宣言，北京公开信，神州春雷动，民主浪潮涌！”紧接着，2月26日，张显扬、李洪林、包遵信、戈扬等42人又联名写信给中共中央，也要求释放所谓的“政治犯”。

在这种气候下，一向对此类事情不甘寂寞的戴晴再也按捺不住了。3月14日，她联络苏炜等三人又发起搞了个43人签名的公开信。信中说：“前不久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吁请释放魏京生等人，我们认为他们的请求是符合宪法、表达了民意的。在此，我们再次请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考虑这一要求。”请注意，戴晴搞这43人签

名的公开信，恰恰是在党和政府对此事表明了严正态度、袁木同志在一次讲话中作了明确的阐述之后。对此，戴晴今年4月对香港反动杂志《九十年代》的一个人说：“我们是（3月）14日签的，袁木讲话出来的时候，要撤销签名还来得及，但我们都没撤。”从这一段自白中，人们不难看出，她这样做完全是“对着干”的。这也暴露了她平素所宣扬的“以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想影响社会、干预政治”的根本出发点。

(三)

4月15日以后，极少数人借悼念胡耀邦同志之机，煽动学潮，蓄意掀起一场政治动乱。一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则到处串联，组织集会。此时的戴晴，也异常活跃起来。4月19日，《世界经济导报》（以下简称《导报》）和《新观察》杂志社在北京召开“座谈会”，鼓动为胡耀邦同志“平反”，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翻案”，明确表示支持学生的游行示威。一向出入于“沙龙”、“座谈会”的戴晴，这样的“座谈会”自然少不了她。她在会上发表了一段“精彩”的演说。她历数了陈独秀、瞿秋白、王明、张闻天、邓小平、胡耀邦的经历和遭际后，说“中国共产党的这些总书记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莫名其妙地被拿掉的。”这段话既是暗示要全力“保”赵，又是严家其的“非程序的权力更迭”说的一个形象的注脚。当然，戴晴是不甘于仅仅为别人做做注脚的。她在讲了上面这番话之后，特别指出：“你这个党内民主这么残缺，是不是与生俱来的！”其意在攻击中国共产党内从来就没有民主。那么，哪里才有民主呢？在戴晴的心目中是早有认定的。1989年2月号的香港《明报》上有一篇《戴晴谈心路历程》的文章，文中介绍说：“戴晴有一个新观点，可以说颇具惊人之处。她认为，中国专制的结束和民主的初步奠定，是自林

则徐、魏源开始，而至蒋经国完成。遗憾的是，不是大陆，而是台湾，先行实现了这一完成。”哦！原来民主在台湾国民党那里？！无怪乎采访她的那个人也不得不惊叹她的这个“新观点”“颇具惊人之处”了。由此也可看出戴晴的脚跟究竟站在什么地方去了。

(四)

戴晴及严家其等人在这次座谈会上的发言，无疑十分符合《导报》总编辑钦本立的口味。钦本立决定在4月24日出版的第439期《导报》上全文发表这次座谈会的发言，上海市委负责同志从维护大局出发，建议《导报》将严家其、戴晴等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发言内容删去，钦本立则顽固坚持发行未经删节的这期导报。4月26日，上海市委果断作出关于钦本立停职和整顿《导报》的决定，并在下午的万人干部大会上宣布。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导报》事件”。

在这一事件中，戴晴几次三番地登台表演，把她这个动乱记者的丑恶面孔暴露得十分充分。4月26日上午，她在上海市委作出处理《导报》的决定宣布之前，便给钦本立发了一封电报：“正义为本，民主为道，本立则道生，钦老板安康”。这是从北京发出的最早的一份给钦本立打气壮胆的电报。电报发出后，戴晴仍觉得不过瘾，又马上给《经济学周报》的总编辑陈子明和《中国青年报》的一个记者打电话，晚上又给《光明日报》的一个记者打电话，鼓动首都新闻界发电报支持钦本立。此后一封封“声援”的函电就从北京飞向上海，飞向钦本立。4月27日，严家其起草了一封给上海市委的《公开信》，并冠以耸人听闻的标题：“捍卫新闻自由”，信中污蔑上海市委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开始，在信上签名的仅严家其等两人。戴晴得悉后嫌人少，声势不够大，便和《导报》编委、北京办事处负责人

张伟国一起，把苏绍智、包遵信、于浩成、张显扬等人拉上，凑了30多人的签名，发往上海，并同时在北京散发。戴晴策划和组织的这些函电和《公开信》，与赵紫阳同志对《导报》的支持态度形成上下呼应，与《导报》内部蓄意制造事端的某些人里应外合，把事态进一步扩大到了整个社会动乱中去。

(五)

戴晴在《导报》事件中如此卖力，如果认为只是因这一事件直接牵扯到她的发言，那就把她看得太“小气”了。事实上，戴晴同《导报》有着深深的渊源，同钦本立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有着很深的默契。戴晴的一些在其他报刊发不出的文章，在《导报》可以“自由”发表。在戴晴的心目中，《导报》是中国最具“新闻自由”的报纸了。戴晴曾经认为，中国“没有新闻”。她曾对一海外记者发牢骚，说“从82年到88年，中国发生了多少事，有多少新闻呀！但是我不能写，你也不能写，没有一个人能写”。戴晴所要求的新闻自由是什么呢？《导报》今年4月3日刊出的一篇文章为她做了注解。该文说：“西方新闻学并不强调‘积极的’、‘消极的’、‘正面的’、‘反面的’报道，而是强调‘新闻事件’，即新发生的、不寻常的事件。”正是资产阶级的新闻观把戴晴和《导报》紧紧地捆在一起了。

(六)

戴晴在《导报》事件中搅和了一番，仍觉不够劲，又翻出了新花样。4月29日，在一次会议上，当有人提出“新闻界也要和领导人对话”时，戴晴欣喜之至，她马上介绍张伟国与那个人相识。三个人便当场凑在一起“商量新闻界出场名单”。戴晴提出的原则是：

报社部主任以下，具体新闻从业人员。在戴晴看来，部主任以上的干部是不能代表新闻界的。这就是新闻界一些人也要求“对话”的起源。经过一番酝酿和征集签名，5月9日新闻界部分人要求对话的公开信出笼并向全国记协送交。签名者中间自然有戴晴。这一事件与5月4日首都部分新闻工作者走上街头参加游行，被海外一些资产阶级报刊说成是中国“新闻界的抗议浪潮”。5月21日出版的香港《亚洲周刊》上登有一篇题为《新闻体制面临重大挑战》的文章。文章说：“光明日报记者戴晴对亚洲周刊说，新闻工作者的行动乃受月来的学生运动触发。……大陆记者过往对重大事件的如实报道都无法见诸报章，情绪积压已久，学运和上海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遭停职事件遂成了导火线，引发记者上街。”不难看出，戴晴在进一步鼓动记者上街了。

(七)

在动乱中上窜下跳的戴晴，在新闻界跳过一阵、煽动一番之后，又跳向知识界和学生中间。

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指明了这场动乱的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当天，戴晴就对香港《天天日报》记者发表谈话，说她对这个社论表示非常失望。该报记者这样写道：戴晴认为“尽管中共是次态度强硬，学生们还是应该坚持他们的政治理想的。”“此外，她又说，学生如果需要她的时候，她会给予援助的。”

果然，4月27日，她便到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校门口去“看”学生游行，观察动向去了。是时，她遇到美国《时代》杂志的记者，她对那位记者说：“今天政府如果对学生镇压，我就退党”。这大概就是她所说的“援助”吧！

当然，戴晴的“援助”决非只此一种。

5月3日，香港《明报》刊登“本报记者北京专电”：“以于浩成、李洪林、严家其、许良英等为首的一批著名中国知识分子，就‘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发出一联署倡议书，呼吁中共当局坚持改革，并对大陆目前的学运表示坚决支持，称此次学运是极其可贵的爱国行动。”“专电”转发了呼吁书全文，文后签名中，在李洪林、于浩成、严家其、许良英、张显扬之后，赫然写着戴晴的名字。这时的戴晴又变成“著名中国知识分子”了。

5月10日，戴晴到中国人民大学讲演。她说：“我觉得，1989年4月27日一定会象1949年的10月1日、1966年的6月6日、1976年的4月5日一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日子，大家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情（鼓掌、欢呼）。也许你们不知道，从1989年4月27日开始，我们国家统治了中国人上千年之久的权威统治，从此就要开始结束了（鼓掌、欢呼）。”这里，戴晴犯了一个“错误”，她忘记了1966年6月正是“文革”发难之时，而她把1989年4月27日与1966年6月6日相提并论，正好说明这次学潮是一次动乱。在这次讲演中，她还说：“大概今年年初，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编了一个《青年研究》，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你们今天会有这样英勇的作为，可是，那个时候，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中国的大学生和学生运动》，在这篇文章里的第一句话就是‘大学生们总是对的’（鼓掌）。非常遗憾的是，这篇文章到现在还没有发表出来。”可见，戴晴“援助”学生、支持动乱之心早已有之，这篇讲话可谓不打自招。

5月13日，戴晴在一个会议上，提出能否以开座谈会的形式，客观披露一批知名人士对形势的见解，得到当时中央主管宣传和思想工作的一位负责同志的首肯。5月14日，戴晴就把她的那些老朋友拉来“座谈”，炮制了一份《紧急呼吁》，随后，又到天安门广

场宣读这份呼吁，发表鼓动性演讲。这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一幕。

这份呼吁书经《光明日报》和中央电视台报道后，上街游行声援绝食学生的人一天比一天多，声势一天比一天大，造成绝食学生骑虎难下之势。这就是戴晴所谓“援助”学生的结果。

需要指出的是，戴晴在一些场合也曾劝说学生复课，劝学生停止绝食，劝学生撤离天安门广场。她似乎是站在一种公正的立场上，因此很能迷惑一些人。其实，她的本意不在这里。她在5月14日晚在天安门广场向学生发表演说时，就说过：要“打得出去”、“撤得回来”。其潜台词是“撤”是为了“打”。5月15日，她在接受日本《读卖新闻》记者采访时，更明确地表达了这种意思。她说：“学生们有很好的个人素质，表现在他们的政治敏感性、政治责任心、爱国热情、牺牲精神、组织能力等方面，可是他们却缺乏现代社会进行政治斗争的足够的经验。他们不知道每个人是有自己的角色的。比方说我是个主角，站在舞台上，当我把剧情推向一个高潮后，我就要退下去，由一些配角上来表演，如果需要的话，我再上来。”那么，学生撤出去，谁上来呢？5月18日，戴晴作出了回答。她打电话给一个“朋友”，提议知识分子们绝食，换得学生们进食。她要变擂鼓助阵为亲自出马了。

(八)

为了迅速制止动乱，5月20日国务院发布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戴晴感到很失望，流露出颓丧之情，并声称“从此不再参与运动”。

是“从此不再参与运动”了吗？请看她此后的行踪：

5月22、23两日采访7名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绝水的学生，

并到他们的家中采访他们的家长。

5月24日，参加全市大游行，手擎“首都知识界”的横标，并接受一批记者的拍照。

5月30日，接受香港无线、香港翡翠两电视台采访；接受香港商业电台采访；接受香港无线电台采访。

5月31日，接受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采访。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戴晴在50天的政治风波里，频繁地与英、美、日、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报纸、电台、电视台接触，接受他们的采访，发表谈话，有些是通过面谈，有些则是通过国际长途电话，对国内的学潮及动乱作了大量歪曲的宣传。一时，戴晴成了外国记者追逐的“明星”，成了他们歪曲报道中国动乱的一个消息源。

6月4日，首都发生的反革命暴乱被平息，戴晴说她“心情极为悲愤”，并策划组织知识界人士“联名抗议政府对学生和平请愿的镇压”，但未能成功。就在这时，她又一次接受香港及东京等地电台的长途电话采访，说自己“决意退出中国共产党”。终于在6月5日，她向所在的党支部递交了退党申请，向共产党示威。

这就是戴晴所谓的“从此不再参与运动”。

(九)

戴晴在北京动乱及反革命暴乱中的种种表演决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是她长期以来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必然结果。

1978年以后，戴晴开始写小说，因发表反映知识分子两地分居为主题的小说《盼》而有了点小名气，由此跻身文艺界。后调到《光明日报》当记者，进入新闻界。当记者后，她声称“一不坐班，二不采访官式会议，不做那种只发豆腐块新闻的记者”。她感兴趣的是

四处采访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物。1986年以后，她利用在光明日报办《学者问答录》专栏的方便，转达传播方励之、严家其、金观涛等人的观点，并与这些人过从甚密。在对香港某杂志记者谈采访经验时，她“再三强调”：“我得益于思想和情绪的长期压抑，所以当它们一碰到我这样的人，有一种悟性，一种感情的沟通、情绪的沟通”。由于有这种沟通，她和那些所谓“精英”们裹到了一起。1987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受到赵紫阳同志的阻挠，戴晴欣喜异常，按捺不住自己的“感情”、“情绪”，写起翻案文章。她不顾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所写文章的“矛头专门指向我认为她本应维护的东西”（香港明报1989年2月号《戴晴谈心路历程》）。香港某杂志在发表她写的《储安平与党天下》一文时，特别为该文加了一段很长的《编者按》。这个《编者按》说：“戴晴女士再接再厉，继《王实味与〈野百合花〉》之后，为本刊写就另一篇调查报告，详尽记录另一名知识分子——储安平——的崎岖命运，包括他在中共治下步向厄运的悲剧历程。单是他（储安平）右派身份至今未除这一点……俨然是说，即使中国没有发生‘文化大革命’，也从未给万恶不赦的‘四人帮’极左派窜扰捣乱，包括储安平在内的一批民主党派人士，始终是无法躲逃被打成右派的命运。”戴晴文章的矛头所向被这篇编者按点得再清楚不过了。正因为如此，她受到所谓“精英”们的喝彩和赏识，被一些和她“志同道合”的人捧成了“名记者”、“名作家”，受到国外一些图谋在中国搞“和平演变”的势力的青睐。她自己也就飘飘然起来，经常和“精英”们以及海外“学者”、“记者”们在一起，异常繁忙地出入于一些“政治集会”、“政治沙龙”，实现她的“参与”意识，似乎也是一名“精英”了。

其实，戴晴哪里是中国知识界的精英，她只不过是国内外妄图把中国演变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反动势力的一个走卒罢了。这个

戴晴，早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是一个造反派人物。当时名叫傅凝，“文革”之后改名戴晴。然而，名字虽然改了，思想依旧未变，只是从极左跳到极右而已，一遇适当气候，她和她的同伙们便又跳将出来兴风作浪，以求一逞了。但是，他们的目的是永远不会达到的。中国人民迅速平息了发生在首都的反革命暴乱，使他们的梦想彻底破灭了。

（原载1989年9月13日《光明日报》）

刘宾雁反动面目的大暴露

郭 帆

1987年初,刘宾雁因严重违反党章、党纪和党的决议,攻击四项基本原则,诋毁中国共产党,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代表人物,被党组织开除出党。1988年3月,刘宾雁接受美国提供的尼曼奖学金,带着妻子飞往大洋彼岸,在哈佛大学作为期一年的进修和讲学。今年春夏,他在北京发生学潮到动乱到反革命暴乱的前前后后,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乱以后,他东奔西跑、声嘶力竭地反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还勾结叛逃国外的严家其、万润南、吾尔开希之流发起成立反动组织“民主中国阵线”,从而把他自己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动乱之前:呼风唤雨

一年多来,刘宾雁以中国作家、老记者、留美“学者”的身份,奔波于美国东部、西部以及香港、波恩、巴黎、伦敦各地,广为结交海外各种势力,特别是新闻舆论界人士和华人知识分子,不时发表演讲、文章、谈话和答记者问,竟成为西方及海外一些传播媒介不可多得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新闻人物”和“消息来源”。

刘宾雁顽固坚持其多年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到了国外,更加肆无忌惮。去年4月,他在《洛杉矶时报》发表文章,宣扬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要求国内搞“民间办报”,反对中国共产党对新

闻事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新闻体制和指导方针，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争夺舆论阵地。6月，他在一次座谈会上发表的“关于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谈话，为香港《百姓》半月刊全文连载，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他宣称我国社会主义的“民主模式和制度失败了”，鼓吹要用“三权分立”的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取而代之，并且说：“从1949年以来，我们犯了一个巨大的、战略上的错误，就是要跟资本主义一刀两断”，等等。

从去年秋季开始，刘宾雁对国内政治问题说三道四的调子明显地变了，“火药味”变浓了。其中的奥妙就在于他以其特有的政治敏感，摸着了国内小气候和国际大气候的风向。

去年9月下旬，刘宾雁在哈佛大学讲演，断言中国的经济改革“不会有成功的可能”，胡说“中共官僚集团”是中国大陆无法进步的根本原因。10月30日，他到纽约市立大学皇后学院发表演讲，公然煽动说“中国大陆可能会发生一场比文化大革命更大、更激烈的动乱。”台湾“自由中国之声”电台以刘宾雁的这次讲话为题发表一篇评论，向大陆发出心战攻势。评论说，对于刘宾雁的看法，西方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都表示支持。他们认为，即将来临的乃是一场以中共为对象的新的“社会革命”。这家反共心战电台还叫嚷什么要“把握时机”，迎接“新时代”的来临。

去年11月，刘宾雁在波恩接受联邦德国《世界报》记者采访，在回答创作自由问题时借题发挥，诬蔑中国“直到今天还是没有言论自由”，宣称要通过对中国现行制度的“变革”，指望能出现“第二个政党”。12月初，他到美国马里兰大学对海峡两岸的留美学生作讲演，评论所谓“中共的兴亡和中国的前途”。他无视我国十年改革的伟大成果，说改革“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原因是所谓中国“政治制度不合理”，叫嚷要取消作为我国立国之本的四项基本原则，竟然说“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共宪法的前言，没有法律效力。一切纸

上的东西都是可以改变的”。他胡说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并指责毛泽东思想的“为害之烈”。他甚至公然声称，不反对“以暴力的方式”达到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的目标。讲演结束后，刘宾雁主动向《香港时报》记者表示，台湾的“民主化”对他敢于在国外公开批评中共有很大影响，说台湾是大陆的一面镜子，他有意访问台湾，但不急着去，还是让方励之先去吧。

刘宾雁的上述两次鼓噪，都搬出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模式和价值观念来攻击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他所谓的“民主政治”不过是议会民主、多党制之类西方政治模式的代名词，而他鼓吹的“民主化”，实质是要把中国变成资产阶级共和国，重新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附庸。

今年年初，刘宾雁又配合方励之等人演出一场要求实施大赦，释放严重触犯刑律的魏京生等所谓“政治犯”的闹剧。他们在国外一些政治势力的支持下，选择美国总统访华的时机，借“人权”问题发难，挑起事端，胁迫我国政府。1月6日，方励之发出致邓小平的公开信，要求释放“政治犯”，释放魏京生。1月28日，方励之在“新启蒙沙龙”集会上煽动说，“现在中国主要是人权问题，需要行动”，“要对当局采取完全批判、彻底批判的态度”。2月16日，“中国民联”成员陈军在北京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广为散发方励之致邓小平的信以及陈军等33人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共中央的信。2月17日，方励之和海外华人知识分子53人联名在美国发表《敦促中国大陆民主改革宣言》，其中包括释放“政治犯”、删除刑法中“反革命罪”的条文。2月20日，刘宾雁在美国发表事先起草好的《答〈华侨日报〉记者问》，对方励之、陈军等人的行为予以支持。

接着，刘宾雁还同方励之合演了另一出戏。2月19日美国总统访华，刘宾雁通过当天《纽约时报》的一篇专访，责怪美国政府在中国大陆“政治犯”问题上“未如对苏联一样提出抗议”，说“如认为

中国的人权无关紧要的话，实是一种侮辱。”几天以后，方励之也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他从北京发出的一篇文章，埋怨美国政治活动家对苏联、东欧国家的人权问题公开表示关注，而对中国“只是嘴上说几句，几乎没有采取行动”。两人一前一后借助美国舆论工具，以同一个腔调责怪美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对我国的内政还干预得不够，而为美国拿“人权外交”干涉中国内政张目。

这出有刘宾雁参加的“人权”闹剧，不过是方励之等人预谋的今年一连串寻机闹事计划中的第一张“牌”。台湾《联合报》2月23日的一篇文章说：“纽约发宣言，北京公开信，神州风雷动，民主浪潮涌！”这恰好说明，今年春夏之交的一场政治动乱在其酝酿阶段，就表现出国内外、海内外相互策应相互配合的鲜明特点。

今年3月，刘宾雁在哈佛大学作系列报告。他在美国大学的讲坛上不断发出对我们党和社会主义祖国大肆攻击和辱骂的声音，什么中国共产党“独裁”呀，40年来不断加强“专制统治”呀，已经“完全失败了”呀，什么10年改革“耗尽了中国的经济”呀，等等。刘宾雁的这些污言秽语都通过《美国之音》的电波传来中国，与北京一些大学里当时已经出现的大量大小字报和集会上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调子相呼应。

动乱期间：摇旗呐喊

4月15日，胡耀邦同志猝然逝世，一场酝酿已久的学潮和动乱提前爆发了。动乱的组织策划者以“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平反”作为“突破口”，提出了包括“议会制”、“多党制”、“私有制”在内的反动政治纲领。在具体要求上，有人点名要“为方励之、刘宾雁平反”，还有“新闻自由”、“民间办报”等。在美国呼风唤雨多时的刘宾雁，对学潮和动乱迅速作出反应：“大陆的学生示威使我觉得鼓舞”，

“可喜可贺！”

4月16日，刘宾雁掩盖不住他急于推翻我国合法政府而利令智昏的心态，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电视采访时说：“李鹏政府两三天内就会倒台”。三天以后他发现自己“错误估计”了形势，便跑到“促进中国民主化联络组”组织的一个集会上发出煽动性的狂叫：“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在大陆上那么糟过，中华民族已遭到严重危机”。“一个没有什么指望的环境将逼得老百姓奋起……”据刘宾雁自述，他曾经三次决定要回国直接插手动乱，4月高潮时国内“朋友”打电话催他回国是第一次，5月学生开始绝食后是第二次，后来又有第三次。“但三次决定都改变了”。老谋深算的刘宾雁终于没有回国，而是留在国外充当国际反动势力的喉舌，为动乱和暴乱煽风点火，擂鼓呐喊。

4月下旬刘宾雁在纽约连续参加几个座谈会。他的谈话，后来为反动刊物《中国之春》选登。刘宾雁在那里咒骂说，中国共产党的“昏庸”、“腐败”已到了空前的程度，“如果中国的问题解决不好，将成为人类的包袱和累赘”。5月4日，他在《纽约时报》发表《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文章，说什么“中国大陆的混乱局面可能威胁到共产党本身的地位与存在”，表露了他窥测方向以求一逞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心理。

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后，动乱的组织策划者们万分恐慌，又决不甘心失败，加紧策划反革命暴乱，组织一支反动力量拚死一搏。刘宾雁这时候通过《美国之音》和港台报刊制造传播了大量谣言。如5月22、23日，《美国之音》播出了他在美国的评论说：“有100多个高级将领联名反对（戒严）这种错误决定……不承认李鹏政权，甚至称其为伪政府。”5月23日，香港《明报》报道：“刘宾雁昨日出席美国一所大学的人权研究会时，对一群中国留学生说，他相信邓小平迟早会迫令李鹏引退。他说，据他知道的官方高层消息，

八个中央政府部包括外交部在内，以及几个省政府，已经表示拒绝向李鹏效忠。他又告诉学生，两天前辞职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将复出”。刘宾雁这些不高明的造谣伎俩只能暴露他用心之险恶。

5月28日，刘宾雁在台湾《中国时报》上抛出一篇《人民公敌的最后赌注》的反动文章，公然给北京的动乱摇旗呐喊，并煽动“中共党内的民主派或反对派”，“断然站立起来，和民间非党政治家一起，形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刘宾雁在这里把他誓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敌的反动本质暴露无遗。

反共反华的吹鼓手

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乱后，刘宾雁气急败坏，拚命地摇唇鼓舌，为西方世界掀起的一股反华浪潮推波助澜，成为国际反共反华大合唱中一只刺耳的高音喇叭。

刘宾雁多次接受美国传播媒介的访问，配合《美国之音》等宣传机器对我国开展的谣言和舆论攻势，竭力渲染“血洗天安门”之类的谣言，煽动一些西方公众和海外华人谴责和反对我国政府。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他6月18日至26日访问香港期间，充当国际反动势力反共反华的急先锋。

6月18日，他一到香港就公开宣布“自我流放”，声称将留在美国过流亡生活。他在香港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和其他公开场合，用极其恶毒的语言疯狂咒骂我党、政府和国家领导人，诅咒：“这个集团如不消灭，中国大陆就无法站立起来”，极力煽动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我国的合法政府。他一再鼓动共产党内的“民主派”公开地“独立出来”，与共产党“抗衡”并取而代之。什么是“民主派”呢？他说：“中国没有一个、也不准许有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以外的政党”，但“在中国有一个比较现实的、可以与共产党

抗衡的力量，就是共产党内的民主派，或者叫健康力量，这在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次上都有，我本人在被开除以前，也曾经是这样一个分子。”真是一语道破，原来他所寄予希望的“反对派”、“反对党”力量，就是那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刘宾雁”们。

刘宾雁明目张胆地煽动分裂祖国，大肆叫嚷：“海外应当支持大陆出现分权自立的情况，以削弱中共统治集团的力量”，“假如有三个省能够自立，中国的民主斗士就有栖身之地，就有地方避难了。”

他还别有用心地挑拨香港和祖国内地的关系。6月22日，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姬鹏飞代表我国政府发表电视谈话，重申我国政府对港澳地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不变。6月25日，刘宾雁在香港公开说：“北京官员日前说‘不允许有人利用港澳作为颠覆中央人民政府的基地’，这就证明香港人做得很好，对他们构成了危险”。第二天，他怀着破坏祖国统一大业的险恶用心，在接受电视采访时又对香港同胞挑拨说：“香港在几个月以前没有成为所谓的反革命基地，难道中国对香港就是友好的吗？九七年后香港就会是安全的吗？”他还劝阻香港商人与大陆做生意，说什么“不要眼光短浅，只顾眼前几条小鱼！”

更有甚者，6月20日，刘宾雁向外国记者呼吁，要求西方各国对中国实行最严厉的经济制裁，停止贷款及贸易往来，并呼吁联合国对中国采取政治制裁措施。22日又公开指责日本政府同某些西方大国的做法有所不同，说日本“可恨”，并警告日本政府：“现在继续与中国做生意，就是继续犯罪，要追究责任。”这就完全暴露了刘宾雁不仅是个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而且是个背叛祖国的民族败类。

刘宾雁在香港十天的表演，博得台湾国民党当局和海外一些反动势力的连声喝彩。6月26日，台湾“内政部”宣布允许“大陆民

运人士”赴台访问，台湾有关方面已拟定一份邀请在海外的“大陆民运人士”的参考名单，刘宾雁当然榜上有名。第二天香港《明报》刊出此条消息，标题是：“台接受民运人士入境，刘宾雁、严家其可优先”。

刘宾雁在香港期间就与当时叛逃到香港、被我公安机关通缉的刑事罪犯严家其、吾尔开希之流勾勾搭搭。7月13日，刘宾雁从美国专程飞往巴黎与严家其、吾尔开希、万润南这伙人会合，经过一番策划，他们于7月20日在巴黎共同发表一项倡议书，发起成立反动组织“民主中国阵线”，鼓吹要推翻中国政府，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刘宾雁在当天接受记者采访时公开叫嚣：“这一次失败了并不等于以后不采取这种方法，还可以用各种不同的形式。”

在国外和海外敌对势力的支持下，“民主中国阵线”的闹剧班子9月23日在巴黎粉墨登场。“成立会”一再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狂妄叫嚣要推翻中国政府，并公开要求台湾国民党向他们提供资助，甚至领导他们的反政府活动。当时正在英国活动的刘宾雁，特地从伦敦捎去一个录音讲话，表示“虽不能参加‘民阵’的领导工作，但仍将以自己的方式协助完成‘民阵’的使命。”

刘宾雁和严家其、吾尔开希之流的继续蹦跳，丝毫也影响不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国外敌对势力妄想把中国变为附庸的任何企图，国内敌对势力妄想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翻案或“卷土重来”的任何图谋，必将彻底破产。

忠于“和平演变”战略的马前卒

刘宾雁是一个颇有“名气”的人，被海外一些报刊称做“明星”、“中国社会的良心”。国内也有人吹捧他为名记者、名作家、思想家……。1985年，他发表《第二种忠诚》一文，宣扬一种所谓“富于批判精神”，敢于“批判”党组织直至党中央和毛泽东，“虽九死而不悔”的“最高忠诚”即“第二种忠诚”，海外曾刮起一阵“刘宾雁旋风”。

香港反动杂志《九十年代》1986年3月号上登过一篇题名《刘宾雁：中国的特异现象》的文章，评论说：“他从《人妖之间》开始到如今的《第二种忠诚》、《古堡今昔》，他‘鸣’了几年。比以前‘鸣’的更深刻、更辛辣、更彻底。……他已经是一个自觉而成熟的战士，很会利用气候和地形，在最有利的时刻，打出最有力的一击。”这两段话像是一面镜子，把刘宾雁的面目照得何等清楚！这些姑且不论，单说刘宾雁在《第二种忠诚》里使用假材料，把上海海运学院一个“文革”中的“造反派”、“四人帮”的残渣余孽，描绘、吹捧为“最坚定地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献身四化和改革”的“最高忠诚”的典型人物。此人名叫倪育贤，1986年初跑到美国，一到那里便发表了大量攻击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言论，以后成为“中国民联”成员，今年又追随王炳章之流搞起了另一个反动组织“中国民主党”。他是臭名昭著的《敦促中国大陆民主改革宣言》的发起人之一和征集签名的联系人。今年2月8日，他又在美国成立了“促进中国民主化联络组”。倪育贤用他的反动言行铁一般地证明了刘宾雁鼓吹的“第二种忠诚”到底是什么货色。

现在轮到刘宾雁本人。他背叛祖国、投靠海外反动势力以及他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种种恶劣行径，给他自己鼓吹的“第二种忠

诚”作了最实际最清楚的注脚。人们对刘宾雁的评价只能是：忠于国际垄断资本“和平演变”战略的一个马前卒，忠于海内外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的一个吹鼓手，是中华民族的败类。

（原载1989年11月3日《人民日报》）

王若望其人其事

栾 保 俊

是作家还是政客？

80年代的上海滩，大概没有人不知道有一位大名鼎鼎的作家王若望的。他的闻名于世，不是因为他写出了什么优秀作品；在这方面，他较之一些普通的作家也有逊色。他的出名，与其说因为他是作家，不如说因为他是政客。特别是80年代后期，他基本上不是在搞创作，而是在搞政治。在这段时间里，他除去出版了一本中短篇小说集《掩不住的光芒》以外，其他作品大都是杂文和政论性文章，此外就是忙于竞选、讲话和作报告，宣扬他的资产阶级的政治观、文艺观。从他的作品和讲话、报告的内容来看，在80年代初期所发表的，基本上还是谈文艺的，即使涉及到党的领导，也还是谈党对文艺的领导问题，没有离开文艺的范畴。及至80年代的后期，王若望的文章、谈话和报告等等，不大谈文艺了，而是大谈政治，谈党的领导，谈社会主义，谈政治体制改革，谈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民主与法制，等等，无所不包。王若望的资产阶级政治立场是很坚定的，爱憎也极为分明，他的文章，看标题就知道其倾向性，而且胆量极大。他不是政治家，却敢于大谈特谈各种政治问题；他不是经济学家，竟然到处谈经济问题。当然他所谈的一切，都是站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立场上的。他与所有的所谓“精英”分子一样，都有一股子狂劲，似乎一切人都应该听他的教训，大有天下舍我其谁

之慨。

80年代后期的王若望在大谈特谈政治的时候，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具有浓厚的媚外色彩。他的讲话、报告和文章，热衷于拿到国外、海外去发表。这是他的一种心态的表现。他与一切动乱“精英”一样，都知道要在中国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没有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支持是不行的。他在国外、海外发表这些东西，就是为了争取外援，争取支持，以国外来压国内，以党外来压党内，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

王若望曾经大言不惭地说：“自由化有什么不好，我就是自由化的老祖宗。”是“祖宗”还要“老”，其气焰之嚣张可见一斑。

个人的历史是以自己的言行写成的，王若望到底是“仗义执言”的作家，还是资产阶级政客，这还是以他自己的言行来证明吧。

跟党的文艺方针格格不入

王若望过去名为“党员作家”，但他并不尊重党在文艺方面的方针政策，尤其痛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79年12月5日，他在一次讲话中说：“对于那本神圣不可侵犯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以实践检验一番，我们的创作思想还得不到解放，手脚还放不开。不要把它当作神化的圣经。……有些提法当时就不适用，有些现在不适用。”凡认真读过《讲话》的人，都会感到王若望太不实事求是了。在这本小册子里，毛泽东同志系统地论述了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并对一些错误论点进行了批驳。尽管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其中有些话不完全适用于今天，但其基本原则并没有过时。然而王若望却没有一句肯定的话，把它说得一钱不值。

在文艺观方面，王若望最反感的是党领导文艺。1979年，他发表了《论文艺的“无为而治”》，说我们党是“常常违反艺术规律瞎指挥”，“对文艺工作干涉太多，管理太细，结果是事与愿违，文艺创作不仅繁荣不起来，百花齐放变成了百花凋零。”对这篇文章的观点，当时就有人提出了批评，说他是为了摆脱党的领导。但王若望死不认帐，说他不反对党的领导。现在这个问题已经用不着争论了，王若望已经用他的行动证实了人们的批评。

其实，就是在当时，人们稍微注意一下王若望的言行，也不难看出“司马昭之心”。1980年12月，王若望在一篇题为《“重视”之忧》的文章中引用了“近人”套作的《新嫁娘》的诗：“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小姑说太淡，加盐复加酱；小姑说太咸，赶快抓把糖，食之难下咽，倒进猪食缸，寄语怀才者，勿做新嫁娘。”这首诗的含义明白如水，就是要“怀才”的作家们别听共产党那一套。这篇文章的发表有其历史背景，当时由于种种原因，电影不景气而电视剧则比较兴旺，报刊认为电视剧所以兴旺，是领导重视的结果。对此，王若望认为是大谬不然。他在文章中对报刊号召“大家都来重视电视剧”表示“担心”，说什么“公公婆婆都来重视，电视剧的创作，势将面临电影那样的命运”。在王若望眼里，党不重视的东西就发展，党一重视它就会像烈日下的幼苗一样枯萎。这是多么可怕的情景！

我们不否认在“左”的指导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党在领导文艺工作方面有失误，其中包括对某些作品的不正确的评价和对某些作家不公正的对待。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党不应该和不能领导文艺。王若望总把创作是个人劳动说得玄而又玄。创作当然是个人劳动。但个人劳动再加上党和群众的帮助是否可以创作得更好呢？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和事都是崭新的，作家要把握人物的性格和事物的规律，深刻、生动地再现人物和事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听听领导的意见，多和各种人物接触，充分占有第一手材料，难道都是多余的么？不从积极的方面考虑问题，始终抓住党在领导文艺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不放，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是对发展文艺创作不利的。

在文艺工作中，我们党历来主张文艺作品要注意社会效果。王若望对此十分反感。文艺作品要注意社会效果，这本来不需要争论，连资本主义国家也知道抵制淫秽或为他们不能容忍的作品，而王若望却不以为然。他翻来覆去地说：强调社会效果就是棍子。王若望反对提社会效果的真实用心是，对文艺谁都不能批评，作家爱怎么写就怎么写，若有批评就是“左”的一套又来了。这种“理论”指导下的后果，人们都已经看到了。

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

对社会主义反感和向往资本主义，是王若望早就流露过的情绪，但用明确的语言反对在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则在80年代后半期。

王若望的反社会主义论点之一是所谓“补课”论。1986年在杭州召开第二届“新技术革命与体制改革”座谈会，王若望也跻身其中。他说：“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概念是模糊的，不清楚的，有些东西是从空想社会主义那里弄来的，很多东西是虚构的模式。我们对中国自己这个国家里怎样一个情况也是模糊的，对它的认识也是错误的。”是“把空洞无物的幻想当作正确目标”，“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这恰恰是我们中国需要的，紧迫需要的。这是我分析长期历史经验所得出的结论。这一步我们一定要走的嘛，我们现在跳了过来，可以回过头来再补课嘛”。“不要羞羞答答硬劲强调社会主义优越性，依讲讲看，依有啥个优越性？”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王若望既缺乏社会主义的基础知识，又没有严肃的治学态度，信口开河，颠倒是非。第一，他把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失误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混为一谈。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我们犯过错误，不断的政治运动，经济建设中的瞎指挥与急躁冒进，特别是“大跃进”与“十年动乱”，使国家损失几千亿。而这段时间里，国际上正是经济腾飞的时期。一进一退，就显得我们与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差距特别大。然而，就是在这种不断的折腾中间，我们仍然有相当大的发展，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以1952年至1986年这34年为例，我国的社会总产值增长了14.7倍；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15.8倍；国民收入增长了7.8倍。在这个时期里，我国的核工业、航天工业、船舶制造业以及一些新兴工业都有巨大发展，这是有目共睹的。可以想见，假若没有这样多次的失误，我们的成就还会大得多。这就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不是像王若望所说的讲不出优越性。第二，王若望不懂得党的领导和正确的理论指导，可以推动社会的飞跃发展。王若望不无讽刺意味地说：“我们打了二十年游击战争，就在天安门宣布不要资本主义了。”“一个领袖，在1949年某一天，带我们进入了社会主义。”谁都知道：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上宣布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他并没有宣布从那天起中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或者建成了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经过了三年经济恢复时期，1953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那个时候叫过渡时期。在经过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以后，才宣布进入了社会主义。尽管在这一段时间里，也有急躁冒进问题，也有“左”倾思想的错误，但却不像王若望所说的由一个领袖宣布某一天进入了社会主义。第三，王若望说资本主义经过了200年，我们不能跳过，应当补课，也不能成立。中国所以不走资本主义道路而选择了走社会主义道

路，这不是什么人的任意选择，而是有其历史与社会的原因。大陆解放的时候，中国是一个社会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国家。在人口众多又急需摆脱任人宰割的困境，唯有把有限的社会资金，包括由人力物力所构成的生产力，从旧的生产关系的羁绊下解放出来，统筹计划，集中使用，重点发展急需的东西，以求在较短的时间里使民富国强，这就非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可。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基本观点：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的变革，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主要和决定的作用。大陆解放以后，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生产资料归全体劳动人民或劳动者集体共同占有，消灭了剥削，劳动者成了国家的主人，并在生产过程中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使生产力得到解放，促进了社会的发展。王若望闭着眼睛不看事实，只能证明他充满了偏见。

王若望反对社会主义的论点之二，是所谓“国营公害”论。1987年，王若望在香港《百姓》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共必须革除“国营公害”的弊病》的文章，集其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之大成，他几乎把一切人间罪孽都归罪于社会主义公有制。此文共分六节，六个小标题是：“渎职官僚主义如今重犯”、“私欲都在‘公’字上动脑筋”、“世风日下模范干部更少”、“国有制使人懒惰”、“大吃大喝白吃白喝”、“‘公’之害罄竹难书”。王若望为什么对公有制如此咬牙切齿？他与其他“精英”们一样都很明白：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主要标志，没有了公有制就称不上社会主义，否定了公有制，就等于去掉了社会主义最后一个阵地。

稍微读一点马列的书的人都知道：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产生了尖锐的矛盾。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说：“竞争和个人经营工业生产已经变成大工业的枷锁”，因此必须“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组织”，“为了公有的利益按照总的计划和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所以共

产主义者提出废除私有制为自己的主要要求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现代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筑在一个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生产和产品占有的最完备的表现。”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经济基础，是消灭剥削的重要步骤。

当然，实行了公有制以后如何经营管理，这是一个极复杂和困难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四十年，虽然积累了许多宝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但我们不能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恰恰相反，还有很多问题和困难需要去解决。但不管怎么说，公有制经济已经显示出它的优越性。中国经过只有四十年的建设，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初步繁荣富强的国家。我们用仅占世界7%的耕地，供养着占世界1/5的人口。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上升到占世界的第8位。如果从主要产品的产量来看，我们的发展是很快的，煤炭、粮食、棉花、布、肉类的产量占世界首位，钢占世界第4位，石油占世界第5位……尽管我们在人均占有量上还落在世界很多国家的后面，这是因为人口太多所致。在这一点上，连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人士也懂得，治理一个11亿人口的大国决非易事。而王若望这种人，却不顾这些客观条件所造成的困难，一味攻击和贬低，这只能说明他毫无实事求是之意。

王若望攻击社会主义的另一个方面，是关于分配问题。分配问题，是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社会主义阶段，我们的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近几年来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这个口号是正确的。但由于缺乏经验，在提出这个口号的时候，有些政策还不配套。比如说什么人先富起来，采取什么手段富，富到什么程度，个人富与集团富是什么关系，等等，开始时都不够明确，加之工作指导中的一些缺点，因而在这段时间里就出现一些人暴发，而另外一些人的收入相对说来提高

不快。这样的问题是应该解决的。否则不利于调动大多数人的积极性。所以邓小平同志在一次与外宾谈话的时候说：“我们的政策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社会主义最终要达到共同致富，所以我们的另一个原则是我们的政策不致于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小平同志这段话，不管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正确的。

然而王若望却认为两极分化是必然趋势。他在题为《“两极分化”之我见》一文中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现在和未来……‘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相形之下另一部分人跌下去，好起来的则富的越富，跌下去的则‘穷者越穷’，是必然的趋势，也是自由竞争合理的结局。”

王若望经常标榜他是代表人民群众讲话的。但在这个问题上彻底暴露了他的本来面目。“两极分化”是人剥削人的结果。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而工人阶级除了劳动力以外就一无所有。资本家靠榨取剩余价值，使资本越来越集中。这种社会产品分配方式的结果，是一个极端出现了亿万富翁，而另一个极端则是生活难以为继的工人阶级，特别是失业群。共产党正是为了消灭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才起来革命的。假若是为了实现王若望为我们描绘的图景，何必抛头颅洒热血革命几十年？蒋介石统治时期就是那个样子嘛。

赤膊上阵，妄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

多年来，王若望一直致力于摆脱党对文艺的领导。开始的时候有些遮遮掩掩，羞羞答答，口头讲话比较露骨，发表文章比较含蓄。当有人批评他是要摆脱党的领导时，他还要辩解，说什么他“没有否定党的领导”。

但伪装总是不能持久的。王若望在八十年代初期所以没有明目张胆地反党，非不为也，不能为也。那时候的大气候迫使他不得不披上一层伪装。到了八十年代后期，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国际资本主义势力千方百计扶植“持不同政见者”，方励之、刘宾雁等人多次出访，在国外大放厥词，这就大大地鼓励了王若望毫不掩饰地公开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及至今年春夏之交发生动乱以后，他认为时机已到，更是赤膊上阵，妄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

4月15日，胡耀邦同志突然逝世，部分大专院校学生上街游行，王若望欣喜若狂，说：“可有好戏看了，我盼望的一天终于到来了。”他在欣喜之余，一语道破天机：“胡耀邦的死为什么会激起这么多人的激情和悼念，其实都是拿他做文章。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次学生运动起来了，是压不下去的。……这场运动的本质是政治运动。”王若望是很敏感的，也是很善于抓取战机的！他要行动了。

5月21日，也就是在李鹏总理宣布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第二天，北京、上海继续有人上街游行，王若望对其同伙说：“形势大好，我特别期待着今天有更大的变化，工人参加了，市民参加了，他们（指党和政府——引者注）日子不会长久了。目前（他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立即对话，这次对话自然不像前两次那么简单，而是有条件的，可能会提出严家其、方励之，以至赵紫阳出台，实际上这是一次圆桌会议；二是如果对方不干，一味坚持军管（原话如此——引者注），与人民为敌到底，那么，法国巴黎革命人民攻打巴士底狱的情景就可能再次出现，他们就将成为中国的‘全斗焕’、‘马科斯’”。

据王若望估计，经过这一场动乱，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垮台，那么以后由谁来当权呢？王若望说：“有人担心，这一来共产党被打倒了，中国没有干部今后怎么办？其实这是多此一举，报纸上日

前不是点过很多人的名字吗？如严家其、方励之等等。这不都是政治家吗？各组织都有这样一些人。再说这次群众运动中，又涌现了多少像王丹这样的年轻的，经过群众运动考验的，群众认为年轻有为的接班人。再说还有赵紫阳。”

王若望在设计了上述的领导班子以后，立即开始行动，他说：“北京事情有了变化，也要在上海成立一个组织，提出工作设想和办法，在此事上不能袖手旁观。”他迫不可待了，立即给人打电话，策划起草一个《给全国作协及人民的通电》，并妄图请更多的知名人士签名。在王若望看来，只要他这么一个“呼吁”，一“通电”，一“签名”，中国共产党就完蛋了，他和他的同伙们就会登上权力的宝座，弹冠相庆了。

如今，由“精英”们发动的动乱与反革命暴乱已被平息，然而事情并没有了结，对于我们的党来说，这里有很多经验教训有待我们总结，而那些当年为王若望帮腔的人，恐怕也应该反思一下自己的言行，从中得出一点有益的教训来。

（原载1990年1月6日《人民日报》）

同青年朋友们谈谈认识 动乱性质的方法论问题

郑 舍

判断历史政治事件要有 科学的方法论原则

在北京发生的历时两月的这次政治事件的性质是什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和邓小平同志已经明确指出：这是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并由政治动乱发展到反革命暴乱。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四个坚持的对立。对于这个论断，目前绝大多数党员、干部、青年学生经过学习是理解的和拥护的。但是，也有不少人对这个问题还认识不清。总觉得广大学生的本意和主流是反腐败的，是支持改革的，是爱国的，别有用心的人只是极少数，怎么能说这是一场政治动乱呢？

把这个问题真正弄清楚，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问题。恩格斯说过：“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

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8页)恩格斯的这个论述,对于我们今天认识这场事件的客观性质和主观动机的关系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它告诉我们,任何历史事件,都不是以参加者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一个历史事件的客观性质,并不是简单地取决于参加这一事件的广大群众的主观愿望,而是要看这一事件的社会历史背景,事件发展的过程实际上为哪一种政治力量所掌握、利用和支配;要看他们的政治纲领和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要看他们的行为方式、策略手段以及事件所造成的后果。

以“文化大革命”为例。我们之所以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政治动乱,当然不是说被卷入的绝大多数群众搞动乱,而主要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实际上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和支配,来达到他们篡党夺权、颠覆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目的;他们的行为方式和策略手段,是搞阴谋、“大民主”、“踢开党委闹革命”以至打、砸、抢,严重地破坏了法制等等;其后果是给党和国家,给全国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这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情况虽然和“文化大革命”不尽相同,但从问题的性质并不取决于被卷入的广大群众的主观愿望为转移这一点来说是相同的。在这次事件中,有相当多的青年学生被卷入了,但我们党从来未说广大青年学生的绝大多数在主观动机上是想搞动乱;相反,党中央一再说广大学生的反对腐败、惩治官倒、推进民主、深化改革等要求同党的主张是一致的,是爱国的。有不少同志总是简单地根据这一点,对动乱这个性质理解不了。其实,这个道理也很简单,这和我们说“文化大革命”是十年动乱,但并不是说被卷入“文化大革命”的亿万群众都在搞动乱的情况一样。所以,我们要深刻地、正确地认识这次事件的性质,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原则,把该事件放在特定的历史联系之中,从该事件发生的社会背景,挑起事端并起支配

作用的政治力量；他们的政治纲领和目的、行为方式、策略手段以及该事件产生的社会后果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客观的分析。

一要看动乱的背景和 起支配作用的政治力量

这场政治动乱的发生不是孤立的、偶然的，而是有着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和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的。

从国际背景来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中的反动势力一直奉行“和平演变”策略，妄图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方向。在这次事件以前和事件中，更加紧了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活动，《美国之音》尤其作了充分的表演。

在国内，由于赵紫阳同志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采取消极、动摇的态度，使得近年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有些人公开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宣扬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主张“政治多元化”、“多党制”、经济“私有化”，鼓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一些报刊和大学的讲台上，无批判、无分析地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各种社会思潮，宣扬资产阶级极端利己主义、无政府主义、拜金主义以及腐朽颓废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造成了思想上的极度混乱，以致在一些青年学生的心目中，值得崇拜的只是萨特、尼采、弗洛伊德、詹姆士，甚至希特勒；至于马克思、列宁，以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集体主义、革命传统等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都成了他们讥笑的对象。这一情况正是很多青年学生所以能被极少数的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煽动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只有放在这样的国内外社会背景来认识，才能理解这场政治事件是国内外、党内外各种反共反华和自由化的思潮交互作用、恶性发展的结果。

在上述的国内外的社会背景下，挑起事端并对事件起支配作用的政治力量是些什么人呢？有人认为，广大学生的爱国行动是事件的主流，广大学生是对事件起支配作用的政治力量。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很表面的。实际上，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策划和组织这次事件的，是以下几种骨干力量，对整个事件起了支配的作用。

第一，非法组织“高自联”的头目王丹、吾尔开希之流（以及后来的“工自联”），是这次事件的直接组织者、指挥者，他们是在前台表演的骨干人物，是对动乱起直接支配作用的政治力量。

第二，这次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挑动者首先是方励之、严家其等党内外长期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怀有政治野心的人。其次，是同海外、国外敌对势力相勾结的人。再次，是党和国家机关内部极少数向非法组织提供核心机密的人。这几种人相互勾结，上下串通，作了长期的思想上舆论上和组织上的准备。由方励之、李淑娴等一手策划的北京大学的“民主沙龙”，就是他们进行思想、组织准备；向党向社会主义发起进攻的重要措施之一。

第三，国外、海外特别是美国、台湾、香港等地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的直接参与，成为挑起和支持这次政治动乱的重要方面军，起了特别恶劣的作用。“美国之音”等国际反动势力的喉舌，横尽煽动、造谣、挑拨离间、推波助澜之能事。台湾、香港反动势力以及在国内的反动组织“中国民主联盟”从一开始就插手学潮。由在美国的“中国之春”成员组成的反动组织“中国民主党”，也写信煽动“促使中共结束其专制统治”。他们与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也早有勾结，狼狈为奸。

第四，国内仇视党和社会主义的社会渣滓。大量的事实已经证明，这次政治动乱中尤其是反革命暴乱中，猖狂进行打、砸、抢、烧、杀等各种犯罪活动的首要分子，相当大的部分是没有改造好的、

曾被劳改的犯罪分子和刑满释放分子，“四人帮”的残渣余孽，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等等。他们对党和社会主义充满了仇恨。这些人成了这次政治动乱的“敢死队”、“飞虎队”。

应当指出，以上几种策划、组织和直接参与动乱的骨干分子的活动，之所以如此猖狂，是与赵紫阳同志的支持纵容分不开的。在北京出现明显的动乱迹象时，他一直采取容忍和放纵的态度，助长了动乱的形成和发展。在动乱已经形成、事态日益严峻时，他回避对事件的性质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讨论，使党和政府丧失及时制止动乱的时机。在动乱接近平息的时候，他在5月4日和亚行代表的讲话中，发表了同中央政治局常委、邓小平同志讲话和《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精神完全对立的意见，使得动乱升级，事态急剧恶化。以后，他又煽动新闻界进行错误的舆论导向，同时又利用会见戈尔巴乔夫的机会，有意识地把斗争矛头引向邓小平同志。致使首都局势越来越严重，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戒严的措施。这时，在赵紫阳身边工作的极少数掌握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人，出于反革命的政治需要，向非法学生组织的头头泄露了戒严的机密，使得事态更加恶化，以致发展到反革命暴乱。

以上这些事实充分说明，这次动乱是极少数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地挑起来的。其中，那些长期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同海外敌对势力相勾结的人以及向非法组织提供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人，是支配这次事件的所谓“运动中坚”。至于广大的青年学生，从表面上看，他们是站在第一线的，实际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不明真相的。他们反对腐败、推进民主的爱国热情一开始就被极少数人利用，他们的爱国要求并没有成为事件的主流。

二要看政治纲领和政治目的

大家知道,判断任何一次政治事件的性质,必须考察事件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即对事件起支配作用的政治力量所提出的纲领、口号,因为这些纲领对于确定事件的性质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这次动乱的幕后策划者、组织者是极其反动的。他们提出了多方面的纲领、要求。方励之早在1986年就提出“全盘西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纲领。1987年受到批评后,不仅不改,反而变本加厉,鼓吹中国“要解散、要解体”,打出了甘当亡国奴的卖国主义纲领。刘晓波也在香港鼓吹中国“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能繁荣起来。并说:“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在他的四条纲领中,就明确提出要用私有制、市场经济代替公有制、计划经济。由此可见,这次动乱的策划者,早就把反党反社会主义作为他们的政治纲领。

学潮从一开始,非法学生组织“高自联”的一些头头如王丹之流就接受了这些策划者的思想。在动乱中,发号施令的“高自联”等非法组织,公开提出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纲领。4月18日,“高自联”的头头王丹在天安门广场抛出了9条纲领,其中最核心的是,“彻底否定‘清理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为在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大家知道,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有其特定的含义,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高自联”的头头把“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作为自己的纲领,就是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作为自己的纲领。

在方励之及“高自联”主要头目的策划和煽动下,一时间,黑云压城,阴霾满天。不少高等学校都出现了肆意攻击和诋毁党和

政府、公然号召推翻共产党领导的大字报。4月份,在北大张贴的“南开大学”《告全国青年学生书》中就提出:“成立修改宪法研究会,除去宪法中为人民所深恶痛绝的‘原则’和‘坚持’”。在北航贴出的《中国的希望——私有制宣言》的大字报,则攻击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祸根”,号召“早日敲响公有制的丧钟”。有的大字报污蔑“马克思主义等于乌托邦”。有的大字报谩骂中国共产党是“一代奸党”,叫嚣“取消共产党,实行多党制”。

这些事实说明,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把我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是这次政治事件策划者、组织者的政治纲领和目的。在这样的反动政治纲领支配下的各种活动,其主流只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而不可能是什么“爱国民主运动”,这是很清楚的。

三要看活动方式、策略手段和社会后果

从活动方式和策略手段来说,是否是动乱,是相对法制而言的。离开法制的标准,就说不清楚什么是动乱,什么不是动乱。因此判断一个历史事件是否是动乱,除了要看支配事件的政治力量的政治纲领以外,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看他们的行动是否按法制的程序进行。如果他们的政治纲领是正确的,又是在法制范围内的活动,当然就不是动乱。相反,如果在政治纲领上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而在行动上又破坏了法制,那就是名副其实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这次学潮发展到政治动乱,不仅是因为事件的策划者、组织者的政治纲领和目的是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而且从一开始就严重违反了社会主义法制。因此,说它是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是恰如其分的。

首先,动乱的策划者、组织者一开始就反对四项基本原则,这

本身就是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我国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其次，他们不顾宪法对“四大”的废除，不听劝阻，在校园内大量张贴大、小字报；他们不遵守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游行的十条规定，不经申请批准，不断地鼓动并组织大游行；他们接连冲击党中央和国务院所在地新华门；他们违反天安门广场的管理规定，多次强行占据广场，影响到国事活动的正常进行；他们不经登记成立非法学生组织，向合法的学生会和研究生会“夺权”；他们不顾法纪和校纪，抢占办公室，抢占广播站，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他们大量制造谣言、蛊惑人心、煽动群众……，这一切的活动方式和策略手段都是严重违法制法的。更为严重的，是在戒严令发布以后，还有不少人，包括一部分学生，无视戒严令的权威，公然抢夺公共车辆，设置路障，拦阻军车，严重影响以至破坏交通秩序。所有这种极端无政府主义的、粗暴践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行为，难道说还不是动乱吗？

这场动乱在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各方面造成了巨大影响和损失。在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不少地方发生了打、砸、抢、烧、杀等恶性事件，在政治上影响了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正常进程，在人民群众的心理上、思想上造成不应有的震荡和混乱，在国际上严重损害了我们国家的形象。

总之，只要我们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上述几个方面进行全面分析，就可以得出以下正确结论：这场风波绝不是如一些人所说是“爱国民主运动”，它的主流也不是什么“反腐败”的斗争，而是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

（原载1989年8月28日《人民日报》）

大学生的误区与社会的误导

——风波过后的回顾、反思与启示

程 元

这是惊心动魄的一幕：

从4月中下旬到6月上旬，全国有80多个城市，600多所高校、280万人次的青年学生上街游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礼仪之门——新华门被多次冲击；

雄伟壮阔的天安门广场被一些学生占据达20余天之久；

全国几乎所有的重点院校学生长时间罢课；

许多校园里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的大小字报四处张贴，“学生自治会”的广播大肆鼓噪，散布谣言，发表攻击性的言论；

……

由学潮到全国性的动乱，发展到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多少善良的人们感到忧虑、震惊、迷惑。在党中央的正确决策下，经过血与火的搏斗，粉碎了动乱制造者们企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阴谋，中国避免了一次历史的大倒退。

风波过后，人们在庆幸之余，不免陷入深沉的反思。为什么这么多的青年学生被卷入学潮和动乱？许多大学生也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惑：“我们是爱国的，我们是想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的，我们要求惩治‘官倒’、根除腐败，我们的出发点是好的，怎么会闹到如此严重的后果呢？”

悲剧不能重演！痛定思痛，我们需要正视已发生的现实，需要痛苦而又诚实的反思，需要面向未来的觉醒。

一、热点与轨迹——一条时起时伏的曲线

1978年，开始了我国高等教育又一个新的纪年。“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批大学生以自己的才华和学识，经过国家严格的考试，登上了大学的殿堂。他们作为胜利者，内心的喜悦抚慰了以往的失落，同时痛惜时光的流失，青春年华的消逝，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成为大家普遍的要求，“成才”成为大家共同的热点。

1978年的意义不仅在于教育，这一年所开展的真理标准的讨论，年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新的转折点。大学生与之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标志着大学生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紧密相融。他们在拥护和欢欣的同时，伴随着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对许多重大的历史的、现实的社会政治问题进行着痛苦而又激烈的反思、辩论。他们抚摸着自己在“左”的影响下的伤痕，对个人迷信、“以阶级斗争为纲”等等表示深恶痛绝，同时也对“四项基本原则”产生了困惑和疑虑，在一些学生中萌发着“信任危机”和“信仰危机”。

此时，社会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乘虚而入。1980年秋冬在一些高等学校发生的“竞选”风潮，可以说是这些潜在思想问题的反映。

1980年春关于“潘晓”一封信的讨论，时隔不久关于“自我设计、自我成才”观点的流行，特别是萨特的“存在主义”进入中国大学的校园，在大学生中引起层层波澜。“人”和“自我”成为大学生议论的热门话题。什么是人的本质？什么是人生的目的？人的本质是不是自私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人生信条对不对？一连

串的问号引起大学生痛苦的思索和激烈争论。他们既有“人生道路越走越窄”的失落，也升起了“自我设计、自我奋斗、自我完善、自我实现”的“雄心”。这是个人与社会、价值愿望与客观现实的撞击。无可否认“自我”的意识在大学生的思想中被大大强化了，成为人生观的主要支点。可喜的是80年代初清华大学化七(2)班的同学首先提出了实现四化“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口号；1982年和1983年又先后涌现出张华、华山抢险英雄群体；这一时期一些有觉悟的大学毕业生志愿到基层、到边疆、到边远山区去工作……

这犹如春天的红杏跃出墙头，表明一部分大学生走出“自我”的误区，把“自我”融入时代与社会之中。然而“自我”的潜流随着西方思潮的涌入和社会上“一切向钱看”的导向，不断侵入越来越多学生的头脑。

改革的兴起，经济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方案的先后出台，使大学生振奋不已。他们以天然的改革者自居，表现出从未有过的振奋。他们对改革寄予无限的希望与热情，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命运与改革联系在一起。1984年3月20日，当中国男排首捧“亚洲”杯时，北京大学的学生欢喜若狂，喊出了具有时代性、历史性的口号：“团结起来、振兴中华”。1984年国庆节，北京大学的国庆游行队伍在走近天安门检阅台时，突然展开“小平您好”的横幅，在国内外激起认同的反响。与世界范围内的新的技术革命的影响相联系，在“改革热”的推动下，大学生因与改革认同，诸多行为受到社会的肯定，自我评价开始升值。他们试图尽快寻找到与改革同步，在振兴中华的事业中一显身手的方式和途径。由此在大学生中迅速兴起的“党章学习小组热”、“社会实践热”、“追求新知热”、“注重能力热”、“要求自立热”。应该说，这是大学生这10年情绪最为热烈、激昂的时期。

进入1985年，政治体制改革提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时起时伏，再加上大学生自我意识的不断强化，他们思想行为的热点已开始转向“参与热”、“参政热”、“文化热”、“民主热”。一些大学生已经开始对改革中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困难、问题表现出焦虑和不理解，对政治体制改革怀有急切的心理，对官僚主义所造成的在科技引进、外贸工作中引起的失误和问题不满。这种不满情绪和对改革期望值过高的能量积聚，终于酿成了1985年“9·18”学潮。虽然党和政府在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的同时，对学生上街游行、贴大字报的行为方式持批评和否定态度，但这并未被更多的大学生所理解和接受。

1986年，当社会上热烈议论政治体制改革时，大学生们兴奋不已。他们中的不少人把经济体制改革中所反映出的种种矛盾和弊端，归结为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对“政治民主”、“新闻自由”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就在这时，社会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再度泛滥，在大学生们的思想上产生了种种混乱。当年底到次年初，从合肥、上海等地首先发生了1986年学潮，随后迅疾波及北京以至不少大中城市。就在此时，邓小平同志再次号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自此，社会开始对大学生投来怀疑的眼光，报刊也不约而同地讨论大学生的弱点。

1987年以后，许多大学生遁入了心灵的孤岛。他们觉得政府不理解他们爱国的热情，感到委屈。1987年底，署名“郎郎”的大学生写信给《中国青年》杂志，大声呐喊“我们究竟出了什么毛病？！”“郎郎”一度成为大学生的代称。他们陷入了双重的失落：政治失落，人生价值的失落。前者表现出对社会、对政治的冷漠和孤独，发出了“家事、国事、天下事，不关我事”的艾怨。大学生对待“两个基本点”的冷漠态度，确实到了最低点。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巨大影响下，大学生们的思想异常混乱，对党和政府，对社

会主义和改革的模糊认识越来越多，信心逐渐下降。不妨看看有关部门1986年6月和1988年6月对首都大学生思想状况的调查数据：认为“靠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富强没有希望，主张多党制”的，1986年为20.5%，1988年为21.1%；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优劣之分，主张搞资本主义”的，1986年为16.8%，1988年为34.5%。

大学生对人生价值的失落，一方面对“通货膨胀”、“知识贬值”、“脑体倒挂”发出种种议论和不满。另一方面，新的“读书无用论”、“经商热”、“跳舞热”、“麻将热”、“恋爱热”充斥校园。

作为两种失落情绪的折射，1988年发生了两件具有代表性的事件。1988年4月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期间，部分高校贴出大字报，强调“教育危机”，认为“知识分子境遇每况愈下”。北京大学的10多个研究生则跑到天安门广场要为人民代表擦皮鞋，其中用意更是显而易见。1988年6月北京大学一名学生因被流氓殴打致死引发了小规模学潮，因处理及时、果断，才未酿成更大范围的学潮，但学生们的情绪是炙手可热的。

1988年下半年，大学生的思想行为状况不仅没有得到明显矫正，反而更加趋于消极和冷漠。首都某重点大学1988年底一项调查表明，大学生对改革的失望情绪已上升到各种不满情绪的首位。厌学情绪仍然在滋长蔓延，不少学生以“托派”（考“托福”出国）、“麻派”（打麻将）自居。

大学生是不甘寂寞的一群，他们决不会把消极、冷漠、失望作为自己思想行为的终结点，他们以往的热情只是暂时的凝固，他们参与的欲望仅仅只是一时找不到适当的机会，一旦爆发出来，必然会更加强烈。

1988年的“《河殇》热”、“东欧、苏联的政治体制改革讨论热”在大学生中悄悄地滚动，发展到冬天，一些高校政治性讲座、讨论、

“民主沙龙”开始活跃起来。有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面人物跑到高校发表演讲，鼓吹“政治多元化”、“经济私有化”。同时，“新权威主义”也在高校成为一个新鲜的话题。随之引起的是学生中盲目的政治情绪在升温。

面对学生的思想状况，人们在焦虑，学生的冷漠与失望情绪的积淀与离心倾向的聚焦，不知触及哪一个断裂点上，将会发生一场难以收拾的学潮。出于不同的目的，人们都把目光投向“五·四”。作为党、政、教育部门、共青团组织，力图通过纪念“五·四”70周年，把青年学生的情绪通过正常的途径引导到“爱国、奋进、改革、创业”的主题上。而那些心怀叵测的人，则想利用青年学生的情绪和幼稚，借“五·四”发难，掀起大规模的学潮。

这既是历史的巧合，更是事物发展的必然。正如小平同志指出的，这场风波迟早要来，是由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决定的。一些人利用胡耀邦同志的逝世，制造了一次建国以来参与人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内容和形式最为激烈的学潮，并演变成全国性的动乱，最后在北京导致反革命暴乱。就连许多学生在一阵狂热之后，也感到愕然。尽管如此，有相当多的学生还在为自己善良的动机辩解，对社会给予的责难表示出委屈和不满。值得思考的是，几次学潮过后，相当多的学生都未能因此觉悟、警醒，相反，学潮愈演愈烈。学潮果真像有的人所鼓吹的那样代表着时代发展的方向吗？是天然合理的吗？难道不应该对其自身有一点深刻而又真实的剖析？！

二、主观愿望与自身素质—— 处于分离或错位的状态

十年动乱对知识的践踏，对人才的摧残，造成了人才的青黄不

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时尚。当代大学生，作为青年中的佼佼者和幸运儿，生而逢时，被誉为“天之骄子”、“时代的宠儿”。改革开放成就的激发，社会对大学生的肯定评价，加上个别别有用心的人的吹捧，尤其是“知识分子应该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逐渐成为一种思潮，极大地强化了大学生的优越感和主体意识，突出地表现在他们与一般青年不同的几种主观意识，如精英意识、超越意识、参与意识，形成了一种大学生特有的文化心态。

精英意识。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学业竞争与拼搏，进入了大学，自此大学生就为胸前闪光的校徽而骄傲，似乎成了共和国的“高等公民”。在校园里或是公共场合，什么“北大人”、“清华人”、“南开人”，谁都认为自己是人群中的佼佼者。在一个还有近2.5亿文盲、半文盲，一万人中才13个大学生的国度里，大学生无疑是宝贝。特别是人们越来越感到未来世纪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大学生作为人才的预备队，自然会迎来羡慕的眼光。这些都潜移默化地使大学生产生了一种优越感，滋长着一种自高自大的情绪，似乎改革也好、建设也好、惩治弊端也好，舍我其谁？有的学生直言不讳地说，10年之后我们就是部长、省长了，至于总理的位置，同样可以问津。正是这种精英意识，把自己摆在一种不适当的位置，不是放在社会之中，而是凌驾于社会之上，其结果只能脱离人民群众，走向与社会现实和人民群众要求相反的方向。

超越意识。当代大学生思想活跃，批判意识较强，求新的欲望强烈，不满足也不愿意接受现成的结论，对传统的东西表现出天然的反感。当打开中国大门，看到中国落后于发达国家甚远的时候，当看到党和政府在工作中还存在某些失误的时候，当官僚主义、腐败现象蔓延滋长，社会上种种丑恶现象死灰复燃的时候，大学生表现出特有的敏感和不满情绪。他们有着一种强烈的超越意识，由

此对西方的“民主”、“自由”、“三权分立”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对西方发达的物质文明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极为赞赏；对《河殇》拍手称好，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表示厌恶。他们恨不得一夜之间就把社会上的种种落后和丑恶铲除干净，他们想一夜之间就使中国成为发达的国家。他们不能容忍现实，意欲超越现实。可是，他们不懂得中国的国情，他们忘记了任何超越只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背离了一切从实际出发，以现实为起点的基本道理。所以，他们往往“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设计着中国的改革蓝图”，不能不产生揠苗助长的天方夜谭式的狂想，甚至有时举动有点如同抓着自己的头发要离开地球一般的可笑。只是不少大学生不愿意承认这一点而已。

参与意识。与精英意识和超越意识相联系，大学生还具有强烈的参与意识。他们不满足于对时政的评论，而总想在实际中去表现自己，显示自己。在他们的心目中，社会的发展，民族的兴旺，改革的成功，弊端的铲除，非有大学生的参与不可。他们想通过自己的呐喊，唤起民众的所谓“麻木”；想通过自己的热情点燃所谓的“民主”、“自由”之火；想通过自己的呼唤，推进他们臆想的中国改革进程。由此，他们对把大学生还看成“孩子”表示厌恶，对告诫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上表示反感。他们就像鼓满了风帆的航船，不待启锚就要冲向大海；他们就像拉满了弓的箭，还未校准目标就要发射。由此可见，他们的热情不免包含着浮躁，他们的参与难免夹杂着盲动。

值得认真总结和反思的是，在大学生中所具有的精英意识、超越意识和参与意识，使他们自以为是，往往在指责社会和他人的过失时，却回避了自己的不足。正是他们主观愿望和自身素质之间的差距，使他们的行为效果与他们的主观动机相去甚远，甚至背离。

客观地对大学生的主观意识与自身素质作一番认真分析和比较，我们或许触及到和把握一些大学生的毛病出在哪里。他们对某些干部中的腐败现象疾恶如仇，但以偏概全，因此对四项基本原则产生怀疑和动摇。他们对改革充满了热情，但不了解国情，对改革的期望值过高，对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认识不足，缺少对改革中所遇到的困难和出现的矛盾的承受能力。他们对中外各种思潮表示关注和兴趣，但对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所知甚少，表现出对马列主义的偏见和冷漠，甚至认为已经过时了。

他们对民族文化采取一种鄙视的态度，对西方的思想文化有一种“饥不择食”的兴趣，导致有的学生把资产阶级的哲学奉为经典，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不觉地成为观察问题的方法。他们要求民主，但弄不清民主为何物，往往以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作为参照系，割裂民主与法制的联系，甚至在要求民主的过程中采取了反民主的方式。

他们强调个人的主体意识，但割裂了个人与集体、与社会的关系，以“自我”作为人生的支点。

他们对与商品经济相联系的竞争意识、时效观念、效率观念表示欣赏，但又同时萌生着狭隘功利主义、拜金主义、实用主义思想。

他们要求参与，但参与的热情和要求，与参与的能力和主导思想，表现得极不相称，有时难免成为一种无政府主义的狂热。可见，大学生自身素质的严重缺陷，导致了与其主观愿望所形成的强烈反差，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必然要乘虚侵袭他们。事实是在去年大学生中已普遍产生了一种跟着感觉走的心态，所以一遇风浪就发生问题。在这次学潮和动乱中，不少同学由跟着感觉走到跟着情绪走，以致发展到听信“美国之音”，跟着谣言走，卷入动乱的泥沼不能自拔。

三、教育与导向——缺乏旗帜鲜明的主旋律

风波之后，痛定思痛，这么多学生卷入学潮和动乱，决非偶然。究其根本原因，是长期以来削弱思想政治工作、放松马克思主义教育、放松对学生的政治要求，以致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其它错误思想侵染学生。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近些年国内的小气候问题和社会上对青年学生的一些错误导向，包括对学生的政治导向、思想文化导向、社会价值导向、新闻舆论导向上的一些突出问题，以图引起我们深刻的反省，吸取一些有益的启示。

政治导向：突出表现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根本问题上，不鲜明，不理直气壮，往往只是被作为一种“标准语言”引用在文件中，甚至被视为“套话”、“空话”。赵紫阳同志作为党的总书记竟说什么社会主义道路现在谁也讲不清。这既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壮了胆，也造成了人们极大的思想混乱。在思想理论界，什么社会主义“早产论”、“失败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趋同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党的领导“淡化论”等等，十分流行。除此之外，长期以来很少讲阶级分析的方法和阶级斗争，只强调宽容、宽松。当和平和发展逐渐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时，对国内和平生产和生活看得多，对国际资本主义对我搞“和平演变”的卑劣用心分析揭露少。这些都淡化了人们的阶级意识。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面人物因赵紫阳同志的包庇和纵容，大肆宣传政治上的“多元化”、“多党制”，经济上的“私有化”，鼓吹“全盘西化”，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造成了不少人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淡漠、怀疑甚至动摇。

思想文化导向：随着开放，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潮和形形色色

的理论纷纷涌入我国，而我们缺少认真严肃的分析和扬弃，致使这些东西很快在大学生中流行，冲击着马克思主义的阵地。相反，我们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十分薄弱，而且往往采取挑剔的态度，使马克思主义在人们的心目中失去了应有的光辉。据首都大学生思想状况调查组的抽样调查，有22.7%的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一门科学，与其它科学是平权的，不能指导其他科学。在有的学校持这种看法的人达53.1%。某院对研究生一次调查，认为科技人员“不必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人占11.7%，认为“略知一二即可”的占24.9%。相反，在校园内出现了“萨特热”、“弗洛伊德热”、“尼采热”、“《河殇》热”。什么《自我论》、《首脑论》、《稿——一种新的世界观》、《人性的优点》、《人性的弱点》、《丑陋的中国人》成为大学生的流行书目。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个人主义的思想、唯心历史观、民族虚无主义侵入到学生的头脑中。

社会价值导向：价值观是人生观的核心。我们所崇尚的社会价值观是集体主义，是为人民服务，是奉献精神，是把自己的理想、前途、命运和国家、民族、人民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这种共产主义的道德观、价值观与资产阶级的道德观、价值观的对立，最根本的是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对立，是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的对立。而个人主义和个人本位的基本特征是以个人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我就是一切。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很少宣传集体主义、奉献精神、为人民服务。相反，有人还攻击“雷锋精神”是“左”的产物。更有甚者，打着“观念更新”的招牌，大肆鼓吹“一切向钱看”的“实惠论”，鼓噪要突出“自我”，进行“人性复归”。这种唯我主义的渲染，使一些大学生把“我就是目的、我就是一切”、“我最崇尚我自己”作为人生的格言。正是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观，必然成为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和利益上的利己主义的思想基础，其结果势必在利益要求上只求索取，不讲奉献；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唯利是图；

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凌驾于国家和社会之上。

新闻舆论导向：现代社会，信息传播媒介趋向大众化、社会化。新闻舆论的导向直接影响着群众的情绪和思想走向，它既是群众情绪的指示剂，也是群众情绪的催化剂。良好的新闻舆论能形成健康向上的舆论环境，产生凝聚向上的力量，错误的新闻舆论则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回顾这些年来新闻舆论导向，青年学生中形成的诸多“热点”，与新闻舆论导向有着重要的关系。如：“潘晓讨论”的结果，无疑使一些个人主义的观点理论化、系统化。报刊关于“T”型人才、开拓型人才、尖子人才的宣传，使人们对人才的理解产生了片面性，产生了重智轻德的倾向。学生中形成的“西方哲学思潮热”、“政治体制改革热”、“中西文化比较热”、“《河殇》热”等等，都与新闻舆论的渲染不无关系。至于人们当时疑惑不解的“蛇口风波”，则被某些报刊极力渲染，有人借机否定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工作，导致了思想政治工作领域和群众思想的极度混乱。回想这次风波的骤然升级，无疑与新闻舆论的错误导向以及推波助澜有关，这个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四、出路与途径——四项基本原则是育人之本

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十年来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思想工作薄弱。反思这次风波所暴露出的我们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最根本的是放松了对青年学生的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忽视了学生的政治方向的培养和引导，导致许多学生受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在政治方向上发生了偏离。要清醒地认识到，现在的青年学生是跨世纪的一代，历史将要把他们推到接班者的位置。

为国家计，为民族计，为社会主义前途计，从学校到社会到家庭，从思想理论意识形态到教育、新闻、出版，都应全面贯彻党的教

育方针，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教育之本，渗透到学生成长的各个环节，当前要特别注意抓好几个方面的教育。即坚持不懈地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坚持爱国主义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教育；坚持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教育；加强对学生进行国情教育和社会实践的教育。有党的领导，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中国的青年一代是完全有希望有作为的。

今天的大学生一定会从正反两方面的教训中清醒起来，成熟起来，同我们伟大的共和国一起成长，肩负起建设 21 世纪的伟大历史使命。

（原载 1989 年 9 月 6 日《人民日报》）

关于动乱和暴乱的反思

袁 木

观察我们国家的当前形势，离不开对三个月前发生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看法。因此，我就以对动乱和暴乱的反思作为题目来讲一讲。只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决不代表任何其他人。反思这个词再加上再认识等等，一个时期以来很时髦，但它往往同对过去的一切彻底否定连在一起，对此我是不赞成的。我希望我的反思不要犯这样的毛病，希望能够实事求是，该肯定的肯定，该否定的否定，从反思中真正得出一些确实符合实际情况的结论。但要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

从这个题目讲起，我想先提出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就是，尽管我们已经取得了制止动乱、平息暴乱的决定性胜利，但是，在我们这个国家还有没有发生新的动乱的危险？我们还有没有要做这样的思想准备？我们的工作还要不要立足于防止新的动乱？

我的看法是两点论：第一，我们制止了动乱，平息了暴乱，这以后三个月来的形势发展说明，全国总的情况越来越好。当然还不能说一片大好，莺歌燕舞，但是总是比以前好得多了。社会秩序在恢复，人心逐步稳定，政治局面稳住了，经济也在治理整顿中平稳发展。回想一下三个月前北京那样惊心动魄的局面，再对比一下这短短三个月的进展，我认为是很不容易的。它说明了一点，就是经过建国以来四十多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毕竟在我国的土地上深深地扎下了根，谁要想动摇共产党的领

导，动摇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得人心的。否则，只靠解放军实行戒严，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局势不可能迅速稳定。当然，在关键时刻解放军不出手，很难设想中国会怎么样。尽管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还有这样那样的不满，但无论如何总是觉得中国还是要有共产党的领导，还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人民解放军捍卫党的领导，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个根本点上的所作所为是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的，因此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如果在现在还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那就不属于人民内部这个范畴的问题了。这是第一点。第二，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搞政治阴谋的人，动乱、暴乱的组织者、指挥者、策划者、惨无人道的极少数暴徒，是不是已经甘心失败，就此罢休了？我看还不会。从一般人们的认识来说，是不是对发生动乱、暴乱的原因都弄清楚了？对党和政府平息暴乱的措施是不是都觉得对？我看也不见得，不得估计过高。当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还想不通，也不奇怪。从更深一点的层次来讲，动乱、暴乱长时间难以平息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平暴胜利的意义如何评价？从这场风波中应该吸取哪些必要的经验教训？解决这样的问题还需要时间。正是从这点出发，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还有没有必要警惕和防止新的动乱。

也许有同志说，你这是危言耸听。动乱制止了，暴乱平息了，问题解决了，形势好转了，怎么还提出警惕和防止新的动乱的问题呢？下面，我再把提出这个问题的根据稍微展开来讲一讲。

第一，国际大气候还没有大的变化，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仍然是亡我之心不死，现在它们还在采取种种措施对我们进行制裁。当然这方面的情况近来也有些变化，制裁有缓和的趋势，但还远没有过去。对此，我们中国人决不怕，将坚决顶住，同时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第二，就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情况而言，可以说这

方面的气候有了较大的变化。过去那一段有那么一些人成天鼓噪经济私有化、政治多元化、文化全盘西化。现在气氛为之一转，很少有人再公开讲了，错误的舆论导向转过来了。但是，长期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泛滥在人们思想上所造成的恶果，以至于种种不正确的认识，是不是都解决了？我看也决不能作过高的估计。它给人们思想造成的混乱，它在实际工作中带来的种种干扰，还远远没有肃清。而且有些问题深入讨论下去，分歧还会不少。对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有足够的估计。

第三，反革命暴乱分子并没有全部缉拿归案，还有些被通缉的罪犯没有抓到，有些逃跑到国外去了。这些人还在国外进行各种各样的反革命鼓噪，拼凑反动组织，拼凑所谓的反对派、反对党。我不相信他们搞的那些叛国活动会在国内产生多么严重的影响，但也不能说一点影响也不会发生。还有通过种种渠道传播的种种反动谣言，种种流言蜚语，有的见诸文字，有的不见诸文字，在人们思想上会毫无影响？恐怕也不会的。对于犯有种种罪行的反革命暴乱分子，该抓的抓，该判的判，必须除恶务尽，不留隐患。

第四，广大党员、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思想状况如何，他们对这场动乱、暴乱是不是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这个问题很重要。听说有的领导干部卷入进去，陷得比较深，至今，尚未认真作自我批评。有些领导干部当时含含糊糊，立场不坚定，旗帜不鲜明。本单位下面的同志要去游行，他也不制止，不劝阻，或者担心不说学生搞的是爱国民主运动，不支持会成了保守派，怕站错队将来领导不好当，因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要去就去，反正我不管。这样的领导如果不首先作点检查，不作自我批评，现在往台上一坐，只强调一般干部要深刻反思，要提高认识，明辨是非，这怎么能够使人心服呢？我认为各级领导同志要首先提高认识，旗帜鲜明地引导大家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对极少数坏人该抓的抓，毫

不含糊，毫不手软，除恶务尽。对人民内部的思想认识问题要由领导带头，大家来共同提高认识，我看这样问题就好解决。否则，就会带来一大堆后遗症。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工作是不是已经做到家了呢？当然还没有，现在刚过去三个月，要求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把各方面的工作都做得很好也不切合实际。所以我认为，我们不能丧失警惕性，不能有太平观念，好象一切问题都已经过去了。否则，说得不客气一点，或者把问题提得尖锐一点，在平息暴乱当中牺牲了的人民解放军烈士的血就会白流！我们当然不能让烈士的鲜血白流，一定要千方百计巩固平暴斗争的胜利成果；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告慰解放军烈士的在天之灵！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首先必须彻底查清一切反革命的阴谋活动，决不甘心手软。要做到彻底查清，当然一要决心大，二要方法对，做大量艰苦的工作。其次，还要认真做好细致的思想工作，提高和统一人们的认识。这一点同前者相比，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能难度还要大一些。为此，我们必须进一步深入宣传和解释动乱、暴乱产生的根源，使大家都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这次发生的风波，是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相结合的产物。就是说，国际反对势力妄图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处心积虑，通过种种渠道，对我国进行了大量渗透、颠覆、和平演变。国内一部分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搞政治阴谋的人，极少数动乱、暴乱的组织者、策划者、指挥者，叛国卖国者和国外反动势力相勾结，制造了这场风波。对这个结论，是不是大家都接受了？据我看，还没有。对极少数顽固的反革命阴谋分子来讲，当然是不用说的了；即使在人民内部，在干部、群众包括在学生当中，恐怕模糊认识还不少。前不久，我就听说还有人把动乱、暴乱的原因概括为三句话，即所谓“腐败引起学潮，社论引起动乱，戒严引起暴乱”。这恰恰和我们党的结论是完全相对立的。对坏人宣扬这种论调，

必须坚决批驳,对好人受骗上当,必须作深入细致的解释。国际上有人要对我们进行颠覆,国内又有人适应这种颠覆,同他们勾结,想搞垮社会主义,这是动乱的根源。极少数坏人,极少数搞反革命阴谋的人,极少数在背后摇羽毛扇出谋划策挑动学生进行种种动乱活动的人,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包括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坚强支柱的人民解放军怀有刻骨的仇恨,否则怎么会把人民解放军战士打死了还浇上汽油烧,还挑肠破肚,还要暴尸示众呢?这难道是什么帮助克服腐败吗?他们只不过是把反腐败当作陪衬的口号,其真实目的是推翻党,颠覆社会主义,但他们的阴谋手法在群众中起了很大的欺骗作用。从学潮一开始,就有人别有用心地加以利用,从而使学潮与动乱伴随而生。打砸抢烧种种违法活动早就发生了;几千人冲击新华门的严重事件早已经出现了;在几万人面前跪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的所谓的递请愿书,明显地是一种用心恶毒的斗争策略,是坏人在后边出的主意。连这样的阴谋活动都明目张胆地搞出来了。一开头悼念胡耀邦,许多人就公开喊出了“悼念胡耀邦,打倒邓小平”的反动口号。咒骂共产党是“一代奸党”,是“封建专制”,是“独裁统治”,甚至公然叫嚷要“把国民党从台湾请回到大陆执政”,这一套极其反动、极其露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东西,这一类的大小字报,早就在许多高等学校当中广为散布和张贴。冲击新华门,几千人赖在那里起哄,连文化大革命期间都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严重事件。学生被一个不少地动员离开以后,又有人制造出所谓的“四·二〇”血案,污蔑军警镇压他们,死了多少多少人,进行造谣煽动。一个大学生去看戏,散场回校,自己骑车不慎,被无轨公共电车撞死,又造出了一个什么“血案”,造谣说是被军车压死的。这一套都是有人蓄意制造的!这一切的一切,这些严重的动乱,早在《人民日报》发表“四·二六”社论之前就已经发生了,怎么能说是“社论引起动乱”呢!社论只不过是揭露了真相,指出了问

题的实质。至于说到解放军奉命实行戒严，这是在动乱已经越来越扩大，越来越严重，反革命暴乱迫在眉睫的情况下，被迫不得不采取的必要的正确措施。部队进城，极少数暴徒裹挟不明真相的部分群众大打出手，以惨无人道的手段残害解放军，大量焚烧军车，抢夺枪支弹药，人民战士伤亡惨重，这才被迫采取断然措施，自卫还击，怎么能说是戒严引起暴乱呢！希望我们一切有良心的、正直的同志们，都能采取最起码的面对事实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否则，怎么统一认识呢？首先把这场斗争所以产生的原因弄清楚，其他认识问题才好解决，否则什么也说不清。

我们一定要进一步说明这场斗争的性质。第一，它是国际范围内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长期矛盾斗争在中国的尖锐反映。西方帝国主义的意图很清楚，它们总是想改变我国的社会制度，把我们的国家拉入到资本主义体系当中去。这种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过去一直存在，今后还将是长期的。人家一直都没有死心，我们却和平麻痹了。第二，它是国内四项基本原则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尖锐对立的反映。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坚持这四条就不会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过去不坚持这四条，就没有我们国家的独立、富强，没有我们祖国的尊严，没有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就没有四十年来社会主义建设和十年来改革开放的成果。今天不坚持这四条，中国就要重新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附庸，重新沦为国际资本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的双重奴隶。有些年轻同志不了解我们国家的国情，以为一搞资本主义，明天的中国就会成为今天的美国。他们就不知道，人家那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经过几百年发展起来的。我们11亿人口，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才三百多美元，在全世界处于很低的水平。因为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以按劳分配

为主体，不是贫富悬殊，这才能够做到全国人民温饱问题的基本解决。如果在人均三百多个美元，社会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条件下，倒退回去，搞资本主义，那将意味着什么？这必然意味着全国大多数人重新回到基本生活都不能保障的绝对贫困线以下，要用劳动人民的血汗重新培植和养肥一个资产阶级来统治自己。中国搞资本主义，必然要重新进行原始的资本积累，必然是最野蛮、最落后、最残酷的资本主义。中国人能够象现代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因为生产力高度发达，蛋糕做得比较大了，可以切一小块来缓解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搞相当多的社会福利吗？我们认为完全不可能做到。从国际条件来看，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不可能让出那么多的市场，来让中国发展自由资本主义。中国退回去搞资本主义，就只能是买办式的资本主义。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和深入宣传这场斗争胜利的意义。什么意义？第一，它保卫了一百多年来无数革命先烈、仁人志士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前赴后继、流血牺牲为人民解放进行斗争所取得的成果；第二，它保卫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所取得的胜利成果；第三，它保卫了四十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特别是这十年来改革开放的成果。如果不是我们取得了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这场斗争的胜利，这一切都将统统化为乌有，中国将重新陷入四分五裂，陷入严重内乱，导致历史的大倒退，劳动人民会重新受奴役、受压迫。国家会重新陷入长期分裂，或者打内战。打内战大概是可能性最大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广大真正的共产党人、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他们会容许极少数反革命分子推翻共产党、颠覆几千万烈士用鲜血换来的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吗？我看决不会答应。他们同那些硬要把中国变成帝国主义国家的附庸，变成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人们之

间，必然要打一场内战。内战的结果，我肯定胜利的只能是前者而决不是后者。但是，由于重开内战，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将因此而倒退许多年。

在这次动乱暴乱之前，我曾给北京市一部分大学生作过一次报告，跟他们讲过这样几点：第一，我们进行以社会主义为前途的人民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究竟是中国人民的幸福还是祸害？他们当然无法说这是祸害，只能承认是人民的幸福。第二，尽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有过不少挫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无论是纵比还是横比，我们毕竟取得了在过去剥削制度下根本不可能取得的巨大成就。同世界上许多国家同期的发展情况相比也并不逊色。在四十年巨大变化面前，他们的亲身感受虽然要比上了年纪的人差得多，但怎么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第三，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如果象有人主张的那样，倒退回去搞资本主义，会是什么状况？对中国国情和各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了解不多的年轻同志，可能很难想象。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历史的大倒退，只能给人民带来灾难，不会是幸福。最后我说，如果认为这些是僵化观点，我相信会有广大的同志包括我在内，愿为这种僵化观点而奋斗一辈子。当时我还说，你们要是不赞成，就把我轰下台，结果呢？全场长时间热烈鼓掌。可见年轻人有很大的可塑性，他们也并不那么迷信资本主义。而且那次讲话还有个背景，在我去给他们作报告之前，听说金观涛跑到北大发表了一篇演讲，胡说什么二十世纪最大的遗产之一就是社会主义尝试和实践的破产。戈扬还站出来说，她是一个老共产党员，经过多少年的实践体会到，金观涛的观点还不是说得很尖锐，而是说得很客气。都宣布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彻底破产了，还认为客气，再不客气，该说到什么程度呢！真是骇人听闻。我了解到了这些情况，所以我对大学生们说，今天我讲的同金观涛他们讲的完全相对立，如果你们不想听，不要听，

就把我轰下台。但他们不仅让我讲完了，而且还报以热烈的掌声。所以说，讲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讲坚持社会主义，还是应该理直气壮。

我们党内的同志们，一切热爱祖国的公民们，尤其是党员干部，都要有防止新的动乱的思想准备。而要防止新的动乱，巩固和发展平暴斗争的胜利成果，让人民解放军烈士的血不白流，关键的关键，就在于我们对这次动乱、暴乱，进行正确的反思，并从中吸取深刻的经验教训。反思什么？我想讲若干意见，供同志们思考。

一、要在正确认识当前国际总形势、总格局的前提下，充分估计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亡我之心不死。总的看来，当前国际形势正由紧张趋向缓和，由对抗趋向对话。超级大国任意摆布世界人民命运的时代已经过去，霸权主义到处碰壁，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和平和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经过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努力，新的世界战争有可能避免。维护世界和平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在这种条件下，我们有可能争取到一个比较长时期的有利于我国建设的和平国际环境。我们对这种国际总趋势、总格局的估计，并没有因为中国发生动乱、暴乱以及西方国家掀起反共、反华浪潮而改变。这是观察国际问题的总前提。不要一下子神经紧张，一说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亡我之心不死，和平共处也不敢讲了，对外开放也不敢讲了，和平国际环境也认为争取不到了，又回到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样天天讲阶级斗争，天天讲苏修亡我之心不死了。同外国人还要打交道，还要做买卖，外国商人来了还要笑脸相迎，只要平等互利就干，这是前提。但是，在这个前提下，必须看到，从社会主义诞生那天开始，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特别是他们当中一贯坚持反共立场的最反动的那一部分，从来没有放弃过敌视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立场。尽管他们嘴上讲要帮助你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但他们有他们的

用心。他们对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自己的想法的，就是希望你搞经济私有化，搞完全的市场经济。如果走到了私有化的路子上去，就必然要搞政治多元化，要搞多党制，乃至最终迫使共产党下台。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不是你想不想搞的问题。经济既然已经以私有化为基础了，当然会有代表私有利益的资产阶级政党，可能先是要求同共产党轮流执政，或者联合执政，分庭抗礼，接着就要把共产党挤下台，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西方世界所期望我们走的“改革”的路就是这条路。他们总是表示支持我们搞“改革”，恐怕看到了我们的改革中确有他们所喜欢的那种倾向，这不能不是一条重要原因。以前有人写文章，总喜欢引用西方某个政治家、某个大公司、某个董事长等等之类的人怎么怎么赞扬我们的“改革”，由此来论证我们的“改革”如何对，成就如何巨大。我认为这种引证恰恰混淆了人们的是非。当前我们强调中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进行改革的时候，西方有些人，西方的舆论界，马上就会说这不是改革而是后退，是保守倾向抬头，是保守派掌了权。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资本主义垄断统治之下，纳入资本主义体系，他们这种图谋从来没有改变过，改变的只是他们要实现这种战略的策略和手段。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他们把大规模的军事入侵、武装挑衅转成以和平演变的策略为重点。什么叫和平演变？就是采取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思想的、文化的种种渠道，对我们进行政治、思想渗透，从我们的内部进行种种颠覆活动。他们支持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宣扬对西方的盲目崇拜，推销西方的一套政治模式、经济模式、思想模式、文化模式和价值观念，以此来培植为他们所用的一批人，乃至在这次动乱和暴乱中大量制造谣言，挑起事端，扩大事态，激化我们国内反党反社会主义势力同共产党之间的斗争，颠覆社

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这难道还不是很明显的吗！据讲当时占领天安门广场一天要花十多万元人民币。钱从哪里来的？还有那么漂亮的帐篷，还有种种电台，还有现代的交通工具和联络工具，都是哪来的？无非是美国的，英国的，还有香港的，台湾的。美国从反共老手杜勒斯一直到历届当权者，从来没有改变过要对我们实行和平演变战略。特别是七、八十年代，尤其是八十年代以来，一方面我们存在一些失误，碰到一些暂时困难，另一方面实行改革开放，他们认为时机对他们更为有利，于是更加紧了战略的实施。我们这次制止动乱、平息暴乱的胜利，也是他们实行这种战略所遭到的一次严重失败。

为什么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如此顽固地坚持要对我们进行制裁？最近西方一个主要国家的总理曾在议会发表过一篇讲话，公然宣称他们之所以非对中国进行制裁不可，就是因为他们“从中国的改革”中再也看不到他们所希望的完全市场经济和政治多元化倾向了。这种材料，很可以从反面使我们大家变得更加清醒一点。西方国家认为现在是向社会主义国家推行西方模式的最有利时机。他们认为公开侵略代价太昂贵，也搞不起来，因此要借助于经济的和意识形态的力量来实现他们和平演变的意图。他们大肆宣传资本主义世界的非凡“活力”，公开鼓吹现在已经可以目睹共产主义的自我埋葬，胡说什么二十一世纪是共产主义自我灭亡的时代。最近他们又提出要以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掀起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个仗是要打的，但它是没有硝烟的，是不流血的，目的是“不战而胜”，手段就是和平演变，从内部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在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尖锐斗争的问题上，国际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们，包括为垄断资产阶级出谋划策的一些反共专家们，他们的头脑是清醒的，反动立场是坚定的，从来没有糊涂过。而我们无产阶级的有些政治家，包括我们党内有的负责

干部，却是不清醒的，滋生了盲目的和平观念和麻痹思想，眼前看到的国际世界一片歌舞升平，到处和平友好，对外交往就是喝酒碰杯。在外交上，要有两点论，不能只讲经济，不讲政治；只讲和平友好，不讲斗争；只讲策略，不讲原则。在警惕和平演变这一点上，一个时期以来我们注意不够，确实是吃了大亏。起码是我们在对动乱、暴乱进行反思时，必须从大量的事实中引出必要的教训，提高广大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警觉性。

我们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决不改变，争取一个较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的努力不改变。我们要使自己成为执行对外开放政策的模范，同时又要警惕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蚀，坚决维护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尊严。

二、我们必须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恰当地认识在国内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的阶级斗争。这也是一个时期以来很少讲或者根本不讲了的问题。

本来，对这个问题我们党是有过正确论述的。同志们可以把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重新翻出来看一看。基本的观点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战略转移，确定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完全正确的。只要不发生大规模的外敌入侵，这个中心绝不动摇。在我国现阶段，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由于仍然存在着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这种情况必然反映为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这场动乱和暴乱是一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政治斗争，也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我们决不能再搞“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错误路线必须彻底否定。同时又必须看到现阶段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的阶级斗争，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还会激化，这次的动乱和暴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有同志讲，现阶段的阶级斗争有这样几点值

得我们注意。一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尖锐对立；首先是政治领域的政治斗争，激化的结果也会表现为新时期的阶级斗争；二是国内敌对分子包括那些搞打、砸、抢、烧的刑事犯罪分子，包括那些顽固坚持自由化并且搞政治阴谋的人，他们同国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内外配合，是新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特点。这很符合这次动乱、暴乱的情况。三是极少数坏人利用党和政府机关某些腐败现象以及工作中的失误，煽风点火，制造事端，激化矛盾，是社会主义敌对分子向党和政府猖狂进攻和进行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手法。这一点也符合现实情况。当然要着重说明一下，这样讲决不是说反腐败不要反了，共产党不反腐败就是走向自我毁灭之路。以上几点看法是否准确，是否有点道理，说出来供大家参考。我们不仅不能忘记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还要认真研究新时期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和特点，这样才能提高自觉性，减少盲目性。

不久前，策划动乱和暴乱的四通公司经理、已被我们通缉的罪犯万润南，在逃到法国以后，曾经发表过一篇讲话，中心思想就是说，这次中国之所以发生动乱，是由于中国已经开始出现中产阶级；而这次动乱之所以没有搞成功，是由于中国的中产阶级还不够强大。他的这篇自白再也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他很明确地说出了这次动乱、暴乱的阶级根源。他的这种分析究竟对不对，我们可以先不去管它，起码他很明白地告诉了我们，他是有很鲜明的阶级观点的。他自己是以中产阶级的代表自居的。这就暴露了他的目的。他们就是要在我国用劳动人民的血汗，重新培植和养肥一个资产阶级来统治我们的国家。这也就从反面告诉了我们，我们的同志决不能太天真了。经过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和发展，我国的阶级和阶层状况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认真地研究这个课题，对于我们深入地观察和解决现在中国社会的

各种政治、经济问题，是很必要和很重要的。最近看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我国农村阶层变化状况的一个分析材料，他们认为现在中国农村已经出现了八个阶层：第一，农业劳动者阶层。这主要是指承包集体耕地，从事种植业、养殖业劳动的一批人。第二，农民工业劳动者。这些人常年大部分时间是在厂矿、商店第二第三产业劳动，但他们的户口仍在农村，身份还是农民。第三，雇工阶层。就是现阶段农村的工人阶级，他们受雇于私营企业或个体工商户，这是过去没有的。过去有个别的零散的雇工，但作为一个阶层出现，是很值得注意的问题。第四，农民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是在农村从事教育、科技、医药、文化、艺术等等从事智力型职业的知识分子。第五，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阶层。其中有的从事种植业，也有从事二、三产业，从事工业、商业的。第六，私营企业主阶层。这是和雇工相对应相对立的一个阶层。第七，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这算不算一个阶层，大家可以研究。不过现在管理者和劳动者的利益虽然不能说完全对立，但不完全一致，有矛盾，存在相当多的问题。作为一个阶层来研究也未尝不可。第八，农村管理者阶层。这是属于政权范围内的。他们认为起码有这么八个阶层。他们的分析和判断，对不对，是否准确，或者说哪些对哪些不对，当然还需要和可以研究。那么城市的居民状况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现在恐怕还很缺乏这方面的研究。我们说现在要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决不是说象过去那样强调用阶级观点去观察一切和分析一切。决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很少甚至不去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恐怕也不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如何调动各个阶层的积极性，以及怎样看待和处理不可避免地会在一定范围产生的阶级斗争，毕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

三、要充分认识到四项基本原则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对立，将

在我国长期存在。是不是自觉地认识到这一点，是不是真心真意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充分有效地反对自由化，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要从这样的高度，充分认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要意义，要把它当作一个重大任务抓下去。第一要长期不懈，第二要始终一贯，不能再象过去那样，抓一阵子，放一阵子；紧一阵子，松一阵子；硬一阵子，软一阵子。多年来，邓小平同志一直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直在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几乎年年讲，有时一年讲几次，但有些人，主要是党的两位前任总书记就是听不进去，不认真贯彻执行。这次动乱和暴乱使我们因此而吃了大亏，但也提高了觉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绝不是一个一般的思想认识问题，而是一个根本性的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问题；不是可有可无的套话、空话，而是同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坚持得好，重视了，我们就可以保持社会主义方向，搞不好，社会主义就会被颠覆，党的领导就会被推翻。因此，这也是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息息相关的。在反自由化的问题上，主要是防止两条。一条是防止象过去那样一阵风。小平同志指出反精神污染，只反了28天，就中途夭折了。八六年重新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耀邦同志辞职后，赵紫阳同志刚上来，抓过一阵子，但很快又消声敛迹了，甚至还变本加厉地纵容、支持自由化。这是很大的教训。再也不能搞一阵风了。第二，要切实防止简单化、扩大化。简单化就是把这些东西只当作口号，讲起来和思想实际、工作实际、当前形势、各项工作挂不上钩。讲得不生动，不深刻，讲得苍白无力，人家不愿听或听起来不起劲。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分清政治问题和学术理论问题的界限，绝不能因为反对自由化，而禁锢人们的思想，禁锢对理论和学术问题的探索。有同志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我觉得同志们可以研究。他说不要说政治和学术分开，而讲政治行为和学术行为分开，这个概念可能比较好掌握，

我认为这有一定的道理。他举了一个例子，比如方励之他是搞天文物理的，他可以讲这方面的各种各样的学术观点，可以跟传统的或别人的观点都不同，这不应该干预，完全可以发表。但是方励之披着科学家的外衣，大讲政治问题，从主张“全盘西化”，一直讲到中国要解散。中国作为一个国家不应在地球上存在，应该叫别人都把它分割掉。这反动和荒唐透顶的行为，就根本不是什么学术行为，而是属于政治行为了。对政治行为，就要按一定的政治标准来衡量。符合四项基本原则，我们就赞成，不符合，就反对。学术上应大力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政治问题也可以讨论，但是，决不能容许公开宣传反动的政治观点，触犯了刑律，以颠覆人民共和国为目的，就要按反革命宣传犯治罪。方励之夫妇现在已经钻进了美国大使馆，这一下他自己就把他所谓的“科学家”、“民主斗士”等等之类的外衣通通剥光了，成了被全国人民所唾弃的民族败类。另外我还想特别强调一句，反自由化决不是以知识分子为对象，不是整知识分子，相反地是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全体人民的历史任务和根本利益所在，应该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样才能把反自由化的教育和斗争长期坚持下去。

四、要明确划清两种不同改革开放思路的界限。这是件大事，关系到我们改革开放将被引向何方。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十年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总体上是好的。这些都应该首先在我们的思想上明确起来。但是，回顾十年改革开放，的确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路，或者在实际上截然不同的思路。一种思路，就是党中央和我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一贯主张的，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改革开放。这种改革开放，

也就是我们党经常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自我改进、自我发展。这是我们党所一贯主张和正在实行的改革开放。另一种就是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主张中国全盘西化的人，这种人党内党外都有，他们所主张的改革开放是同四项基本原则相割裂、相背离、相对立的改革开放。这种改革开放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化。是要通过所谓的改革开放，把中国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甘愿充当西方帝国主义的附庸。是不是尖锐地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回顾一下十年来，特别是赵紫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来，是不是在有些重大问题上偏离了我们党的正确的改革开放路线？举几个例子来说一说。比如讲，决定中国经济运行机制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计划和市场关系问题，正确的原则应该是实行计划经济同市场调节相结合。一个时期以来，赵紫阳同志是不是有把中国经济引导到主要地甚至完全地实行市场经济的轨道上去的倾向？我看是有的。再比如说，现阶段我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应该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在这个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建立符合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所有制结构。这是我们党的正确主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就是这样做的。但是，在实行这样的方针上，在建立符合我国现阶段生产力水平的所有制结构的改革过程中，有没有出现过或存在着某些损害公有制经济，过于向发展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倾斜的现象？有没有或是否存在着对国营大中型企业在某种程度上给予不适当的压力，使它们难以发展，不给它们提供和创造必要的发展条件的状况？类似的问题还有没有，表现是什么，请同志们考虑考虑。就计划经济同市场调节的关系来讲，应该使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中国搞完全的市场经济根本行不通，必将导致经济生活乃至社会生活的严重混乱，这一点必须明确。就所有制结构而言，目前我国生产力水平低，发展一定的私营经济、个体经济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这是天经地义，完全

正确。但它不能损害公有制经济，不能忽视甚至削弱公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和骨干作用。与此相适应，必须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允许其它分配形式存在的方针。既然主体是公有制，就应以按劳分配为主；既然存在其他经济成分，当然就要有多种分配形式，允许非劳动收入存在。但是收入要是合法的，不合法的要取缔，过高收入要通过税收加以调节，这是我们早就讲过的原则。可是一个时期来，我们国家的分配领域中存在很多问题，企业内部不公，社会分配不公，既有平均主义，又有新的不公，分配关系又糟又乱。这种状况已经严重挫伤我国基本劳动群众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助长了超前消费和消费基金的恶性膨胀，助长了盲目攀比和种种不正之风，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这些问题是不是同改革偏离正确的路线和主张有关系，请同志们考虑一下。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经过认真的思索，采取某些措施纠正偏差，调整具体政策，是必要的。但决不要在报刊上去公开争论，更不要搞什么大鸣大放、大批判，这样一搞就乱，对稳定局势的全局不利。

五、必须充分认识当前经济困难的严重性，进一步坚定治理整顿的决心和信念。对我们面临的~~经济困难~~，估计得足一点，比估计不足好，要主动得多。实事求是地讲，现在的困难是很严重的，短期是缓解不过来的。讲清这种情况，才有利于统一全党的认识，做好过几年紧日子的准备。没有这种准备，而企求在任何既得利益都不触动的前提下治理整顿，搞好经济调整，是根本办不到的。拖下去，不治理整顿，不调整，那也不行，再拖就要垮了。现在的困难，不是这一两年内发生的问题，而是过去多年，起码是从一九八四年下半年开始积累起来的。比如加工工业发展过多过快，基础产业跟不上，农业被严重忽视，用相当多的外汇进口化妆品、饮料、香烟，豪华的小汽车进口那么多，宝贵的外汇没有用到基础产业的

建设上等等,这些问题确实很多,都是多年积累下来的。财政赤字现在越来越多,银行货币还控制不住。这类问题不花很大气力,全党思想不统一,怎么能调整过来呢!要解决这类问题,就要吸取过去的教训。进一步巩固平息暴乱的胜利成果,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最终还是为了把经济搞上去,因此就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治理整顿的方针。同时要认识到,治理整顿不是不要改革,是为了给进一步深化改革和保证改革的健康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治理整顿本身也需要改革的配合,不能单纯依靠行政措施。现在这样的经济环境,各方面关系紧张,经济秩序特别是流通秩序混乱,许多改革措施难以推进,硬行推进只能更增加困难。经济环境治理了,秩序整顿了,就能更好地加快改革。因此,对治理整顿不积极也就是对改革不积极,这两者不应该对立起来。我们必须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把这个思想认识统一起来,千方百计地争取用三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实现治理整顿的目标,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这是从根本上巩固制止动乱、平息暴乱胜利的极为重要的一条。

六、要充分认识当前我们党脱离群众的严重性。这个问题不能不高度重视。从某种意义上说,要重建党和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从这次动乱、暴乱中看,主要是知识界卷入的人多一点,总体上说工人农民没有动,人民解放军是捍卫我们人民共和国的坚强力量,经受住了严峻的政治考验。但是,有那么多的人卷入,一些党组织,特别是一些学校的党组织,一些舆论单位、文化单位、教育单位的党组织,对群众的脉搏摸清楚的程度究竟怎样呢?有的机关也有成百上千的人卷进去了,上街游行、示威、声援去了。有些单位在那样做的时候,有多少人曾经事先向党组织透了气,通了信,报告了情况?有些行动群众已经采取,我们的党组织还被蒙在鼓里头?为什么?从思想影响来讲,这几年我们有些党

领导的舆论阵地可以说拱手让给了别人，或者是名为党员、党组织领导的，实际上思想变了，成了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同盟者。前一时期出现过这样的现象，国内一些鼓吹自由化的所谓“精英”，在这样那样的场合，包括一些大学，包括一些什么协会搞的讲座，找机会发表种种最尖锐的话，把共产党骂得越臭，把社会主义否定得越彻底，过不久就会从香港或美国等西方国家发来邀请信，请他去讲学，实际上他就是去骂我们，回来以后就成了“名人”，成了所谓“持不同政见者”，成了所谓“民主斗士”。这样的人“名利双收”，越来越自我恶性膨胀，他们在部分群众，首先是青年学生中的影响也在扩大。而我们的党组织在群众中尤其是青年学生中的影响和凝聚力，也相应地受到了严重的削弱。这种情况，在这次动乱、暴乱中反映得很明显。动乱、暴乱的发生和发展，制止动乱、平息暴乱的斗争，巩固这场斗争的胜利成果，从实质上看，也可以说是党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同所谓“持不同政见者”争夺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一场斗争。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很值得我们深思。我们不能不认真地考虑，如何通过自己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来重新恢复、发展乃至重建党同群众之间的联系。如果党的思想工作很深入人心，不是象前段时期那样软弱无力，干部深入群众的工作做得比较好，基本上能够摸住群众思想的脉搏，针对他们的思想，解决他们的问题，恐怕前不久的那场风波不至于搞到那样严重的程度。因此我就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党从这次动乱暴乱的反思中，一定要非常深切地考虑一下如何恢复和发展党联系群众的传统，以及在新的形势下，如何以新的有效的方式和生动活泼的思想工作，重建党同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我们的党离开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一天也不能存在。这个真理应该牢牢记在我们的心里。

七、一定要把反对党和政府机构中存在的某些腐败现象，和

解决当前社会中存在的某些分配不公问题，当做两件十分突出的大事情抓紧解决好。在反腐败的问题上，我们要有非常鲜明的态度。第一，以讲反腐败为名，全盘否定我们党，否定社会主义，我们坚决反对，决不容许。学潮开始，我跟学生对话时，就很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你们说反腐败，有腐败我们跟你们一起反，但借口全盘否定我们党，这不可能，也办不到。第二，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之后，的确滋长和蔓延了某种程度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腐化堕落等等脱离群众的现象。尤其在这几年，由于赵紫阳同志主张淡化党的领导，削弱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宣扬腐败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难以避免的错误论调，更加重了我们党的思想、组织、作风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的严重性。对这一点，在肯定我们党总体是好的前提下，对我们存在的问题估计重一点比估计轻一点对我们有利。估计得重一点，才能下狠心、下决心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应该说情况正在好转。就拿中央宣布的当前要抓好的七件事来说吧，清理整顿公司，党政干部不经商，领导干部子女不经商，主要领导干部坐国产车，不准用公款请客送礼等这些问题，在解决过程中确实有了进展。最近，我们机关有位同志刚从家乡回来，我问他下面情况究竟怎么样，他说省里、县里、乡镇企业原来请客送礼相当厉害，现在迅速扭转，出乎他的预料。他那个乡，当年请客的时候，几十块钱一斤的甲鱼，上百块钱一斤的鲟鱼，三、四百块钱一斤的河豚鱼都上了桌子。抽烟都是中华牌、三五牌什么的，牡丹烟扔在旁边没人抽。这两三个月来变了，吃的人少了，时鲜食物开始降价了，一些饭馆的生意也清淡了。可见，还是有些变化，当然还不尽如人意，不能估计过高。不反腐败，共产党是站不住的。从外部推翻共产党，看来现在中国还没有这样的政治力量，也不会得人心。但共产党内部的腐败导致党的蜕化变质，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我们不能不提高警惕。

当前的社会分配不公问题，已经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和广大劳动群众的严重不满。这个问题主要表现在哪里？在企业、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内部靠工资收入的职工之间，平均主义的现象还是主要的，同时也出现了某种分配不公，这比较集中地表现在某些企业事业单位承包之后，少数负责人、管理人员同广大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得过大。这个问题应该说还比较好解决。另外，在社会范围内，广大职工、干部和知识分子同少数兼有第二职业者之间，同某些领域的公司职工之间，同某些“三资”企业职工之间，特别是同一部分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主之间，发生了收入上的过分悬殊。这个情况不能不引起党的高度重视。这种情况已经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严重的政治问题，引起了全国上下的关注。如果不高度重视并且逐步加以解决，会使广大劳动群众，使工人特别是产业工人，使相当多的知识分子，产生严重的不满情绪，挫伤他们的劳动积极性。现在已经引起了这样的后果。解决的原则当然是合法收入要保护，非法收入必须取缔，同时必须通过税收，调节和控制过高收入。这些原则都有了，但具体政策还不完善。对这件事，思想上决不能忽视。坚持在共同富裕的前提下，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致富必须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决不能非法经营，非法的必须取缔。这个问题现在中央正在逐步研究解决。需要把这个问题提到相当的高度来认识，不然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难以发挥，社会也难以安定。

八、我们党还要高举民主的旗帜，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这个论断还是对的。共产党代表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以及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怎么能拒绝甚至害怕民主呢？不民主怎么能调动广大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呢？因此，我们还是要致力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建设一个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我们长期奋斗的

目标。在这个问题上，要划清几个界限。第一，要划清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从本质上说，社会主义民主更能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资本主义民主归根结底是为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服务的，但是资本主义民主的种种具体做法和形式及至某种制度，是具体的制度而不是它的根本制度，我们可以借鉴。因为民主也是人类有继承性的财富。我举一个通俗的例子，解释一下这个概念。比如说，我们实行民主，少数服从多数，开会表决，这并不是无产阶级发明的，而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就有的。封建社会大概不举手表决，你看过什么文件上记载过，皇帝召见大臣议事，举手民主表决过？大概没有，皇帝是金口玉言。但是到了资产阶级执政的时候，表决制的运用就很普遍了。在这样的问题上，过去有同志就说过一句话，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民主本质上代表资产阶级利益，并不代表广大劳动人民利益，是虚假的，但资产阶级民主往往搞得认认真真。社会主义民主本质上代表广大劳动人民利益，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可以吸收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代表参政议政的制度，但社会主义民主在许多具体做法上往往搞得马马虎虎。对这个说法，仔细捉摸一下，可能对我们会有启发，值得深思。第二，同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特征相联系的那一套西方民主制度我们不能照搬。我们不能搞多党执政，不能搞西方式的民主议会制度，也就是三权鼎立的那一套。现在有人鼓吹所谓的“精英”政策，鼓吹政治多元化，鼓吹多党制，其实质就是要把广大劳动人民排除在外，否定乃至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其结果必然是对社会主义民主的极大破坏，导致社会秩序的严重混乱。我们决不能容许这样做。第三，我们要划清社会主义民主与绝对民主化、无政府主义的界限。闹绝对民主化，闹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那一套绝对不行，其结果是既破坏民主，又破坏法制。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有相当深厚的社

会基础，我们多次吃过它们的亏，前有“文化大革命”，这次又来了。为此，要向人民群众进行长期的思想教育。一方面要保证人民的民主权利，一方面要使人民自觉地不要采取那种破坏民主法制的无法无天的行为。最后一点，要把民主建设同法制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民主没有法制的保证，不可能真正体现人民的民主。要做到行使个人的民主权利而不妨碍国家、集体和其他公民的民主权利，没有法律的保障是不可能的。没有法制，就会既没有民主又没有必要的集中，任何问题都不能解决，只能导致一片混乱。我们共产党应该把社会主义民主的旗帜举得高高的，领导着全党和全国人民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九、要依靠工人阶级，巩固工农联盟。制止动乱、平息暴乱之后，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江泽民同志有一篇讲话，其中专门讲到了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问题。这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特别是广大工人非常高兴。这里我想讲几个基本观点。第一，我们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三支最基本的力量，因此，要加强他们之间的团结。这三支力量的积极性都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并且同心协力，团结奋斗，我们的国家就有希望了。第二，我们这个国家的性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特别是依靠产业工人。工人阶级特别是产业工人和大生产紧密联系，具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过去他们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这次动乱、暴乱再次证明他们是完全可以依赖的，是国家的中流砥柱，不愧为我国的领导阶级。第三，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军。因此，过去的革命依靠工农联盟，工人派了自己最优秀的队伍到农村，把农民组织起来，变成人民的武装力量，先是八路军、新四军，后来是人民解放军，打下了天下。解放后依靠工农联盟，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

设,使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巨大的深刻的变化。今后,我们还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实行工人支援农民,城市支援农村,以及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来支援农村,帮助农民,在新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工农联盟的巩固是我国政策、经济、社会巩固的基础。第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个概念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确立下来的。这个基本观念不应当也决不会改变。绝不能因为动乱中知识界卷入的人稍多一点,就动摇了这个基本观念。说什么知识分子不可靠了,这是完全错误的。当然也不能象资产阶级自由化鼓吹者们所说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当中最先进的最优秀的一部分,什么都要首先依靠知识分子,这个观念不正确。这样做的结果并不利于知识分子本身,把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相脱离,乃至相对立,这不利于我们的国家,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因此,我们还要坚持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个基本观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能变,对他们的基本估计不能变,对他们的地位和作用的想法不能变,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不能变。党和政府还会想方设法,尽可能地逐步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同时,也应该作为一种希望,作为一种要求向知识分子提出,特别是对青年知识分子,要强调他们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和工农相结合,希望他们在人民群众的创造性的历史实践中吸取营养,以便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更好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这样,才能站稳脚跟。这次动乱、暴乱也暴露了一些知识分子立场不那么坚定,在风浪当中动摇了。这是事实。为什么?我想,一个重要的因素可能就是由于知识分子本身劳动的特点,决定了他们往往同社会的结合不那么紧密,同工人农民的结合不那么紧密。采取和执行正确的政策,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这三支基本力量的积极性都能发挥出来,而不要使哪一个方面在我们的社会感到受压抑,这样我们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就一定能够更好更快地向前发展。

十、最后一点，一切的一切，归根到底在于把我们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真正能够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具有凝聚力、感召力、能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的党，能够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坚强核心的党。这样我们就有希望了。前面所说的一切都 and 这一点相联系。应该看到，四十年的实践乃至中国近代一百多年的实践证明，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来领导自己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翻天覆地的历史变化的开始，是人民从长期的历史实践中作出的正确选择。这四十年来，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是在党的领导下依靠人民团结奋斗取得的。我们党可以说是在克服困难、纠正错误、总结经验教训中逐步发展、壮大、成熟起来的。这次的动乱暴乱所以酿成这样一场大祸，主要的问题也出在党内。我们党正是纠正了赵紫阳同志所犯的支持动乱、分裂党的严重错误之后，才取得了制止动乱、平息暴乱这场斗争的胜利的。问题的发生主要在党内，问题之所以能够解决，主要的力量也在党内。因此，党的状况如何，决定着中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前途，决定着中国国家、民族的前途，党担负着不可推卸的极其重大的历史责任。对这一点，我觉得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应该不是由此而产生任何自满，而是应该感到自己所肩负的责任重大，不要辜负人民的期望。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希望我们的所有同志，在当前巩固平息暴乱胜利成果的斗争当中，在巩固安定团结政治局面和实现经济稳定发展当中，在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当中，都能进一步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提高自觉性，作出自己的新贡献。经过对动乱、暴乱的反思，认真吸取经验教训，我们大家在这一点上做得越好，就越能够巩固和发展平息暴乱斗争的胜利成果，越能够告慰于牺牲了的人民解放军烈士的在天之灵！

（原载 1989 年第 10 期《学习》）